

目 录

文 献

关于在农村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一个问题

.....张闻天(1)

回 忆 录

解放战争中参加华东、中原战场支前后勤工作

.....刘瑞龙(5)

西安办事处工作片断的回忆.....孔石泉(42)

张闻天同志领导牡丹江军区剿匪.....刘贤权(48)

人 物 介 绍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在潮汕等地

的革命活动.....蔡超 刘纪铭 陈汉初(56)

周恩来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潘合定(105)

专 题 资 料

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创建根据地的

前前后后.....田西如(125)

厦门劫狱.....中共厦门市委党史办公室(159)

闽南国共和谈与“漳浦事件”

-中共漳州市委党史办公室 (170)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委员会征集处
- 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史料丛书综述写作组 (184)
- 一九五八年八大二次会议.....裴 棣 (236)

关于在农村发展新民主主义 经济的一个问题*

(1942年10月7日)

张 闻 天

据调查，兴县二区14个村战前共872户，内富农41户，占5%。现在共897户，内富农50户，占6%。战前雇农53户，占全户口6%，现在37户，占全户口4%。富农雇农合计，战前占全户口11%，现在占10%。若按一户雇农出一个雇工计，战前每户富农平均雇佣不到一个半雇工，现在平均不到一个。可见资本主义生产成份在农村是

-
- * 1942年1月和2月，中共中央先后作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和《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分别指出：党的政策是“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以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为主，但同时保存地主的若干权利，可以说是一个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政策”。对于这一政策，张闻天同志1942年在陕北和晋西北农村调查中作了进一步研究。本文为张闻天同志在山西兴县农村调查之后所作。论述了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落后农村如何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体现了作者以生产力为根本标准考察经济发展的思想。文稿由《张闻天选集》编辑组提供并加标题。

很微弱的，封建的成份，即地主与农民的成份，还占优势。

但农民已起分化。除富农、雇农外，农村人口的大多数，是中农、贫农小资产阶级成份，这已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园地。

我们有些干部，不懂得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全部方向和内容，也是将来社会主义的前提。不会运用新民主主义政治力量，推进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发展。甚至机械了解“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而以为，晋西北今天的抗日民主政权是新民主主义政权，晋西北今天的经济，也一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了。

应当知道：什么是发展新式资本主义？为什么要发展它？

晋西北封建势力还强大，农村资本主义只是萌芽，工商业资本家根本没有。封建剥削制度是落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现时比较进步的，可使社会进化的。封建剥削制度下，地主出租土地，农民租进土地，土地使用很分散。地主以高额地租盘剥农民，而农民缺乏生产工具和资本，生产情绪不高。所以农业生产力是低下的，农民生活是痛苦的，社会也是贫穷的。

在资本主义方式的经营下，首先是富农经营自己土地，并雇长工。土地集中使用，而又合理分工。富农饲养牲畜猪羊，经营工商业（油房、粉房、磨房、染房、商店等），自己有工具，有肥料，有资本，可以把土地耕种好，多打粮食和棉花。土地产量越高，对富农和资本家越

有利（所以他们不象地主那样对生产漠不关心，当寄生虫），对全社会更有利。资本主义经营，可使商品经济园艺业等发展，因工业需要原料，商业需要货物，富农和资本家又需要货币支付工资和投资工商业。我们在晋西北发展新式资本主义，一定要靠农业积累资本。将来社会主义，又要靠新式资本主义发展做基础。

为要发展新式资本主义，第一，不要怕晋西北资本家多。现时，不要怕富农。因为今天的富农，每户平均剥削不到一个雇工，垄断不到一百垧山地，这有什么不得了呢？倒是应该限制地主，奖励农民，才合我们的政策。有些农民出身的干部，体贴农民疾苦，这是对的。但把改善农民生活完全放在合理分配别人的财富上，则是不对的。应主要从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来求民生之改善，才是比较妥当的。

为要发展新式资本主义，第二，不要怕农民受苦，就是说，不要怕雇农多，没法安插，失业、工资低，生活恶化。今天雇农、贫农的生活，都是很苦的。说贫农永远比雇农生活好，贫农不要丢失土地当雇农，这是落后的想法。欧美各国资本主义发达，工人生活比今天中国小地主好得多，可见落后国家的地主，日子过的不如先进国家的工人。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只要资本主义发展了，工人生活一定会改善。因为革命政府颁布劳动法令，限制富农资本家随意剥削工人，政府将有计划从农村征调工人，不会造成农村无政府状态，造成农村破产。

所以，我们所提倡的新式资本主义，与欧美的旧资本

主义不同。我们有革命政权和革命政策，调节社会各阶级关系。凡可以操纵国民生计的工商业，均握在国家手中。

中国社会将来才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今天则要实行新民主主义，就是新式资本主义。因为中国太落后，只有走过新式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才能走社会主义的第二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理想。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我们现时的任务，也是我们当前的具体工作。若把理想当现实，乱来一阵，会弄糟糕的。

解放战争中参加华东、 中原战场支前后勤工作

刘 瑞 龙

在四年人民解放战争的不同时期中，在党中央、中央军委、总前委和华东局、中原局、华北局领导下，我参加了负责组织华东、中原战场部分地区的支前后勤工作。毛泽东同志说：“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在战争规模巨大的华东战场上，在党的领导下，我军指战员英勇作战，数百万民工和数十万民兵踊跃支前，取得了一个个战役的胜利，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了这一真理。

华东我军由内线到外线作战，由解放区打到蒋管区，在长达数年的战争中，有近后方，有远后方，也有一个短期暂时无后方（狭义说）。战争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是多方面努力的结果。其中党领导的人民支前后勤工作，是胜利因素之一。在整个战争中，支前后勤工作经历了从被动到主动，从小规模到大规模，从单个地区负担到几个地区共同负担，最后到全国统筹支援的规模。

战争中，华东、中原的主战场有五个变化：战争开始在华中；第二阶段移到山东；第三阶段在中原；第四阶段

是淮海战役，肃清长江以北的敌人；第五阶段是渡江进军江南。

第一个阶段，粉碎敌人的全面进攻（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

这一时期战场基本在华中。先在淮南打响，尔后是淮北、苏中，以后是两淮、涟水、宿北和山东临枣线。这时华中野战部队已有42000人，山东野战部队有50000人，连在胶济线的部队共14万人。当时后勤供应对象是按一兵三伙计算。这个时期主要作了三件大事：

（一）进行土地改革，充分发动群众，及时有力地支援战争。战争爆发之初，中共中央华中分局遵照党中央《五四土改指示》，发出了加速进行土改的指示。各地县委坚决执行了这个指示。1946年6月至9月，盐阜、淮海、苏中一、二、九分区土改全部完成。淮南三分区只在仪征、甘泉及盱眙一部分地区分配了土地。淮北七分区只在泗南、泗宿、泗阳有些地区进行，其余大部分地区未动。所有分配过土地的地区，群众情绪高涨，都充分发动起来了。当时完成土改地区的人口有1400万，这对支援战争，是一个极其有利的条件。征粮、扩军、敌后游击战争都能迅速、热烈地开展。当时有些地区单纯进行战争动员，放松进行土地改革，事实证明这样做不行。农民精神很紧张，愈动员，工作愈不好做。后来改为抓紧土改，结合进行战争动员。这样，土改进行得热火朝天，农民为保卫土改果实、保卫解放区，战争动员进行得也很迅速、扎实。战争暴发，苏中泰兴农民提出：一手拿枪，一手拿算盘，

白天支前，晚上算帐、分田；一部分人上前线，一部分人在村里分田。所以他们的土改、支前工作进行得既快又好。在土改中组织了农民协会，吸收先进分子入党，普遍发展了民兵。假若没有土改、支前，坚持斗争将流于空谈。

（二）把支前后勤工作由被动转变为主动。战争开始，苏中比较有准备，领导态度坚决，土改支前同时进行，相互促进，做到不丢伤员，不缺粮食，不缺弹药。所以部队对苏中群众全力支援战争，印象很好。在淮北，部队遭到困难较多。战局转到两淮、涟水，山东野战军东渡，华中野战军北移，这一个时期华中后勤支前工作曾一度发生某些混乱现象。部队要求很急，地方准备不够，供不应求，也不及时。当时要从苏中、山东运粮来，赶不上；部队到底怎么打法，地方不清楚，显得比较被动。涟水战役是一个转折。此后，建立了支前后勤机构北线后勤司令部；建立了基层支前组织，全面组织了人力、财力、物力，事先集中适当数量的民工听候调用，做到有计划有组织地供应；地方与部队密切协同，统一支前后勤工作计划。采取了这些措施以后，华东的后勤工作，才由被动转变为主动。

（三）协助分局组织了敌后军民就地坚持斗争。顽军占领华中地区的城镇，野战军北移以后，华中解放区大部分变为敌后。苏中、苏北因为事先有准备，所以能够坚持，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淮北、淮南的地方部队和领导机构一度撤出，后来根据分局指示，又派部队打回去，在极其

艰苦的环境中，英勇奋战，恢复和坚持了这些地区的斗争，直到全国解放。

在战争大部分时间里，我是在陈毅同志和华东野战军前委领导下进行支前后勤工作的。陈毅同志坚定地执行党中央的战略方针，卓越地贯彻了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他在统率华东野战军、地方武装和广大民兵痛歼蒋军的紧张战斗中，及时指导我们坚决依靠、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完成支前后勤任务、满足前线供应。认真教育部队爱惜解放区的人力和物力，配合全国解放军，去夺取全局的胜利。

1946年5月，华中分局派我去苏中地区参加土地改革运动。6月，蒋介石悍然发动全面内战，开始向我解放区大举进犯。7月，全面进攻华中苏皖解放区。自卫战争开始，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同志、政治委员谭震林同志，指挥华中野战军进行了“七战七捷”的苏中战役，歼敌六个半旅，约5万余人，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树立了自卫战争必胜的信心。当时苏中地区正在进行土地改革，广大农民为了保田保家，一面坚持生产、土改，一面出兵、出粮，组织十多万民工，运送粮、弹，转运伤员，全力支援前线，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供应前方，保证了战役的胜利进行，创造了土改、支前、生产三不误的经验。粟裕和谭震林同志指示我及时传播这个经验，从而大大加快了苏中土地改革的步伐。

当时，野战部队可能随战局发展转移，根据这一情况，粟裕同志和谭震林同志指示地方上要在蒋军可能侵占

的地区，结合土地改革，进行调查研究，有计划地镇压敌特和暗藏的地主还乡团分子，主动扑灭蒋军推行“顽化”于未发之前。这样就使解放区军民在主力转移后能够比较顺利地敌后坚持游击战争。以后苏中各级党委在华中分局领导下，总结推广了在敌人进攻中加速土地改革，结合生产、支前、武装群众坚持地区斗争的经验，对华中全区的工作推动很大。

8月底，陈毅同志率领山东野战军由淮北泗县东移休整。华中分局通知我北返两淮，负责组织北线后勤工作。我当即赶到驻在淮阴、泗阳间的山东野战军司令部陈毅司令员处领受任务。这是陈毅同志1945年10月从延安回来后我们第一次见面。他看到我很高兴，作了许多重要指示，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除了对我说明泗县战斗情况和当时敌情以外，特别强调加快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战争。他说，人民的支援是战争取胜的重要环节。他谈到淮北部分地区土改运动中由于缺乏经验，曾出现机械阶段论和拖延土改的缺点。我向他汇报了苏中加速土改、组织生产、支援前线的情况。他说，象苏中这样办就好。他还谈到土地改革中，必须团结中农。说邓子恢同志所提“中间不动，两头平”的方针是正确的，对贯彻执行中央“五四指示”，加快土地改革是有利的。他要我们建立强有力的支前后勤机构，要求地方党政领导搞好土改，发动群众；迅速将人力、财力、物力组织起来，这是首先要做好的。接着，他让山东野战军参谋长宋时轮同志谈了部队需要供应的若干事项。

我向华中分局邓子恢同志汇报了陈毅同志的指示，华中分局作了加速土改，加强支前工作和接近敌人地区坚持斗争准备的部署，并由我主持召开了北线后勤工作会议，按陈毅同志指示作了具体安排。

这时正是蒋介石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初期，作战规模比抗日战争时期大多了，参战的部队也比以前多。过去通常是若干个团联合作战，现在是几十个团协同作战。加之战线不固定，战况紧张多变，保证我军战争需要是多方面的，工作也是复杂的。当时我们在思想上、组织上、工作上准备都很不足，缺乏经验，因而在战争初期，前线供应比较被动。无论在弹药前运、伤员后送或部队交通运输方面，都不能及时地满足部队需要，使我军遇到了一定程度的困难。

为了扭转华中战场初期供应上这种被动局面，陈毅同志给了有力的指导。他十分注意了解我们的工作情况。他认为要抓住华中各地土地改革普遍展开的有利形势，进一步把人力、物力、财力组织起来，按战争需要进行有计划的调度。应选派较强的干部充实后勤机构，组织和带领民工，做好支前工作。为了便于我军机动作战，陈毅同志还派人送手令给我们，要我们迅速完成盐河架桥任务。陈毅同志的指示，华中分局的及时督促，是使我们工作由被动逐步转向主动的关键。这时，华中党政工作，在华中分局领导下，迅速地转入了战时轨道。

9月中旬，我军主动放弃淮阴。10月初，华中野战军在完成苏中歼敌任务后，开始北上与山东野战军会师。11

月，我军在涟水重创敌七十四师后，在涟水西北陈师庵召开了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的干部会。会上，陈毅同志作了《华中三个月自卫战争总结和今后任务》的报告。报告充分体现了陈毅同志远大敏锐的战略眼光，灵活求实的策略思想和满怀信心的革命乐观主义。陈毅同志号召全军认真学习毛主席制定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原则，树立高度集中统一的思想，消除由于主动放弃淮阴所产生的埋怨、怀疑情绪。这时，战争逐步向山东解放区中心推移，战线逐步缩短，华中、山东野战军逐步统一于陈毅、粟裕、谭震林同志的指挥之下。为了适应更大规模的作战，我们按照陈毅同志的指示，整顿了支前后勤工作，健全了华中北线后勤司令部，建立各种工作制度，统一调度淮海、盐阜地区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线。山东支前机构也给我们支援了部分粮草和民工，增强了我们的供应力量。这就使我们能够在1946年冬和1947年初比较充分地供应了参加宿北战役、鲁南战役部队的需要。

第二个阶段，粉碎敌人重点进攻(1947年3月至8月)

1947年1月下旬，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组为华东野战军。陈毅同志为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东野战军前委书记。张云逸、粟裕同志为野战军副司令员，谭震林同志为副政委。

从莱芜战役到南麻、临朐战役，战争在山东老解放区进行。回旋地带比华中大，部队也增加一倍多，达到35万人。据1947年7月份统计，前后吃粮人数达100多万人。华

东局根据前一个时期的经验，在部队转移到山东以后，立即成立了山东省支前委员会，以郭子化同志为主任，以刘瑞龙、冯平、朱则民等为副主任；建立了前方办事处，委任我为省支委前方办事处主任，随野战军司令部行动。在民工方面组织了常备民工和预备民工。粮食作了三线部署。部队有兵站，民工建立了民站。民兵在支前中发挥了更大作用，莱芜战役出动了40多个团。孟良崮战役使用40多万民兵，沂水坦埠一线由民兵警卫。在几个战役中，民工都起了极大作用。这时陈毅军长写了一篇《如何爱护民工》的文章，对部队、地方，特别是支前后勤工作，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1947年初，我军集中优势兵力，在山东临沂以西地区，发起鲁南战役。首歼蒋军整编第二十六师及第一快速纵队于峯县以东。第二阶段又在枣庄全歼蒋军整编第五十一师。战役期间，山东几十万民工奋勇支前，但对“民伕”这个旧社会因袭下来的称呼，群众很不满意。陈毅同志知道后，立即电示：“民伕”是剥削阶级、旧军队奴役人民的称呼，以后要改称“民工”。从此，就没有人再称“民伕”了。

鲁南大捷后，我山东及华中野战军在临沂地区集中休整。华东主要战场转移到山东境内，这时蒋介石误认我军续战能力不强，匆忙制定所谓“鲁南会战计划”。在陇海线和胶济线调来29个旅（师）的兵力，南北对进，妄图逼我在临沂附近决战。

经过七个月的战争锻炼，华东党政军各个方面的工作

都取得了显著进步，同时由于教育不够，在部分干部中也滋长了骄傲情绪和部分部队中出现纪律松懈现象。因战场扩大，华东解放区缩小一半，山东人民负担相应加重。鉴于这些情况，华东局领导党政军采取一系列措施，向干部传达了党中央指示，动员全党全军为迎接中国革命新高潮的到来，为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而斗争。号召山东人民再接再厉全力进行土改、生产和支前，发展和加强民兵，保卫解放区和土改成果。

华东野战军前委在临沂附近召开了干部会议，陈毅同志在会上作了《一面打仗、一面建设》的报告。报告强调指出，必须建立整体观念，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指挥，要贯彻人民军队的建军路线，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强调提高全军的群众观点和纪律观念，积极参加农村土改斗争，进一步加强军民团结；实行以战养战，明确树立我们的兵员、武器、弹药取之于敌的思想，反对任意损坏缴获物资的倾向；实行以战养战，以战教战，打一仗，进一步。

针对敌人进攻临沂的部署，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作了相应指示。华野前委决定诱敌进到适当地点，选其突出的一路聚而歼之。全军为此进行了各项准备。

1月底，徐州以东陇海线之敌北犯，李仙洲集团自胶济线南犯，企图在沂蒙山区与我主力决战。毛泽东同志指示，敌人愈深入愈好，我们打的愈迟愈好，不求急效。必要时可放弃临沂。华东野战军前委建议，甩开陇海之敌，置蒋军重兵于无用之地，我军迅速挥戈北上，求歼南下之李仙洲集团。经毛主席同意，华东野战军除以两个纵队在

临沂附近阻击南线之敌外，主力于2月中旬冒严寒兼程北上，日行百里，全速前进。山东省支前委员会，一面电示鲁中区党委动员广大群众全力支援部队，一面急调已向临沂地区集中的支前队伍，掉头北上。一路上，广大群众情绪热烈高涨，保证了我军在长途行军中的供应。地方武装、民兵协助侦察敌情，封锁消息，保证了野战军的隐蔽开进。由于人民群众的支援和警戒，当时几十万人的大部队向北移动，敌人一点都不知道。蒋介石错误地判断我军将要西进，急令北线敌军迅速南下。等到北线敌人发觉时，我大军已到了他们面前。

2月19日，我主力部队合围李仙洲集团于莱芜地区，20日全线进攻，23日全歼该敌，共56000多人，活捉了李仙洲。

莱芜战役中，山东解放区人民在战区紧急多变的情况下，经受了考验。在前线服务的民工达60多万，鲁中的党政军民更全力以赴，迅速为我军几十万人组织了粮草供应，出动了40多个子弟兵团参战，有力地配合野战军作战，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部队每到一地，老乡们纷纷送粮、做鞋，家家户户为战士们烙做各种各样的煎饼。有山东老百姓喜欢吃的大裹煎饼、小米煎饼、玉米煎饼、小麦煎饼和高粱酸煎饼。当时人民群众热烈支援前线的情景，至今仍令人难忘。

莱芜战役后，蒋介石已无力进行全面进攻，被迫对陕北、山东实行重点进攻。自我军主力北移山东，华中地区暂成敌后，整个华东解放区缩小了一半。解放战争的规模

愈来愈大，山东人民负担加重了，这样，战争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长期坚持的问题。

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前委于3月中旬在淄川大矿地召开了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和华东局的指示，总结莱芜战役的经验。在此期间，还分别召开了政治工作、参谋工作、后勤工作会议。全军进行了紧张的整训。会议上研究了山东战场我军作战的需要和山东解放区人力、物力、财力长期供应的可能性，以及我军如何继续贯彻“一面打仗、一面建设”的方针。当时我军高度集中，已有大兵团作战经验，装备有了改善，战斗力显著提高。按照当时我军战时的口粮标准（每人1个月45斤）和战时的民工需要（一兵三工）计算，山东解放区支前的人力和物力仍然是比较充裕的。虽然解放区还存在困难，只要做好工作，坚持长期斗争，粉碎敌人进攻是可能的。陈毅同志嘱我按照前委讨论决定的精神，以陈、粟、谭的名义起草了向党中央毛主席反映情况的电稿。

当时代表华东局主持和领导后方动员、组织和调度解放区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前线工作的是饶漱石、张云逸、邓子恢、张鼎丞、曾山等人。华东局从多方面为我军战胜敌人创造了物质条件。山东解放区当时最重要的是加强战争动员和组织工作，在全党、全军、全解放区人民中确立自力更生，长期打算，以战养战，增产节约，全力支前的观点，加速土改进程，不失时机地发展生产，使土改、生产、支前紧密结合。在广大农民获得土地和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科学地组织支前力量，就能够做到支前人

力、物力不枯竭，源源不断地供应战争的需要，改善解放区大多数人民的生活。

根据华东局和华东野战军前委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指示，我们及时地改变了前一时期单靠就地取给，就地供应的办法。决定在全解放区范围内统一计划，统一调度，把分散的人力、物力组织起来使用。为适应战争情况和任务多变的特点，我们实行了常备民工、二线民工和三线临时民工相结合的完整体制。粮食补给也按照战局的可能发展作了三线部署。野战军各部队按需要配备一定数量的随军民工。军队打到哪里，常备民工就跟到哪里，机动灵活，在战场上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在地方上，准备了二线民工。战区组织临时民工就近服务。陈毅同志为此曾专门写了文章推广常备民工制的经验。

在支前力量使用上，实行合理负担和厉行节约的政策。有计划地动员民工，组织支前工合理负担，充分动员男女整半劳动力参加生产。给缺乏劳动力的军属、工属代耕代种，做到生产、支前两不误。这对于部队在前线安心打仗，减少前线民工的后顾之忧关系很大。我们还注意了在不努力增加粮食生产的同时，做到严格制度，按照实际需要要民工，领粮食，领物资，反对浮报冒领。能够少要就少要，保持一定的机动数量，保证战争的正常供应。

陈毅、粟裕、谭震林同志和前委的其他领导同志都强调整顿和加强部队纪律。地方上发动拥军优属运动，部队同时开展了拥政爱民运动。号召全军爱护解放区的一草一木，爱惜人力物力，适当减轻人民负担，加强军民团结，

坚决贯彻以战养战的方针。

5月中旬，蒋军以自诩为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张灵甫部为骨干，猖狂进犯鲁中山区，其中七十四师突出于左右友邻之前，直逼我坦埠前沿阵地。当时，陈毅同志和华东野战军司令部驻在坦埠东北之西王庄。那时王庄山沟中桃花盛开如海，陈毅同志非常高兴地与张茜同志、陈士渠同志和我一起，在桃花丛中照了相。他非常风趣地把七十四师比作“喂肥了的猪自己送上门来”。提出了“活捉张灵甫”的口号，发起了孟良崮战役。粟裕同志辅助陈毅同志指挥了这个战役，孟良崮战役于5月13日开始，到16日结束，一举全歼七十四师3万多人。战役期间，鲁中及其他各地的支前力量，共有7万随军民工、15万二线民工、69万临时民工，组成了一支庞大的支前队伍。他们不顾敌机、敌炮的袭击，日夜不停地抢运伤员，赶运粮食、弹药，保证了战役的胜利。在七十四师进犯时，我解放区实行了彻底的空室清野。敌军每到一处，找不到吃的，找不到人，一筹莫展，进退两难。当敌人被我军层层包围起来时，战区人民迅速赶回来，参加支前后勤工作。

1947年6月，华东野战军前委任命我为华东野战军第二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

1947年8月，华东野战军在基本上粉碎蒋军在山东的重点进攻后，主力组成外线兵团，转入外线作战。9月，刘邓大军（即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中原野战军）渡过黄河，跨越陇海路挺进大别山区，揭开了我军大反攻的序

幕。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由陈毅、粟裕同志率领挺进鲁西南，南下豫皖苏，配合刘邓大军作战。

为了解决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远离后方所产生的难以保证正常供应的困难，我们按照陈毅同志和前委的指示，动员和组织全军人人都做后勤保障工作。每人携带1天至3天的口粮，携带一定基数的弹药。认真搜集战利品，坚决贯彻以战养战的方针，“一切缴获要归公”。做到在一般情况下不缺口粮，不缺弹药。各级部队都组织工作队（小组）自己筹粮筹草。发动群众参加解放区建设。毛泽东同志指示：“把战争后方放在广大人民群众之中，依靠群众解决困难。”

在部队遇到难以保证正常供应的情况时，华东局在陈毅、张云逸、邓子恢、曾山同志倡导下，曾经及时地采取紧急措施，度过了难关。1947年8月，我军转入战略进攻，南下豫皖苏边区。南下途中，有两件事粟裕同志给我印象很深。

一是关于精简野战军直属单位给夏光、王德、刘先胜同志和我的信，信中说：

野直太庞大，昨晚常备行军，即混乱不堪，如将来战略行军或战斗转移就更麻烦，甚至有危险。兹特提出如下意见以供整理参考：

1. 继续精简，充实战斗连队。但精简要能收效，必须精简干部，才能精简杂务人员，以充实连队。

2. 各部门工作杂务人员，应首先定出其每人每日应服务多少时间来定数额，不能先定数额就去工作，否则

人多事少，并应尽量提高其工作效率。

3. 供给部无东西可供。除少数会计人员外，其余可分散到当地各分区埋伏，既可减少庞杂，又可使他们与地方联系，而进行一些购制补给品工作。

4. 卫生部之医院，亦可分散设于各分区接收伤员，仅要其负责人及转运站随队行动即可。

5. 政治部人员除分到各分区外，可抽出一批组织民运队，准备随各分遣队（拟派一，四纵出去任分遣）行动，以便进行群众工作。

6. 以后直属队以及各纵队出发，应严密地定路线及分梯队出发（如一大队7时出发至8时走完，二大队8时出发至8时半走完），以人数多寡定时间长短，以免拥挤与疲劳。

以上各点供参考，如同意，请计划行之。

粟裕 17日上午

这是粟裕同志在战争中考虑问题周密细致、从严治军的一个范例。

另一件事是同年9月7日，粟裕同志关于沙土集战役给我的信。沙土集战役是我华野外线兵团转入战略进攻后的第一仗。经两天战斗，全歼蒋军五十七师，打开了南下的通路。

粟裕同志给我的信上说：

刘参谋长瑞龙同志：

我们正包围攻击五十七师于沙土集、双庙及其以北地区，但参战部队除六纵有迫炮弹外（十纵任钳制），

其余均无炮弹，对作战影响甚大。而此战又关系我军今后之能否在鲁西南站脚的重大关键。因此，请尽一切努力，迅速将迫炮及山炮、六〇炮弹往前送，越快越好，越能往前送越好，望切实办到，万勿延误，至盼至盼。

并致

敬礼

粟 裕 9月7日晨

信后又附具体指示说：

“迫炮弹不必全部发光。给一、三、四、八纵每门炮配40发至50发即可，多余的炮弹暂留河北。手榴弹每人发四枚，余数亦存河北岸。各色子弹则可全部发完。炸药如到得多，则每纵可发5000斤，否则按已到数平均分发。小炮弹每炮限30发，余数暂存。六〇炮弹可全部发出。

我接指示后，立即调用一切运输力量，如数将弹药运到前线，满足了战役的需要。

这件事，给我很大教育。使我感到粟裕同志不仅从战略上部署战役，而且切实从事战役的组织和指导，随时了解战役的补给情况，发现问题及时采取有力措施，迅速给以解决。

由于华东党政军系统坚决实行了精简编制，调整供给标准，清理资财三大方案，在全党全民中开展了生产救灾运动，战胜蒋灾、天灾，保证了前线的需要。

第三个阶段，进军中原（1947年9月至1948年7月）

我军转入进攻，内线外线协同作战，配合友邻创建了中原解放区。这时主要战场在中原，其次在胶东、苏北和江淮地区。

我军进入豫皖苏地区时，当地已有中共豫皖苏区党委、军区、行署。吴芝圃同志任区党委书记、军区政委、行署主任，张国华同志任军区司令员。豫皖苏区当时有三个专区的人民政权和25000人的武装力量。这里大部分地区长期处于敌人的统治下，反动势力较强，豫皖苏的部队和人民曾经顽强地坚持了敌后游击战争。我军遵照党中央关于首先肃清敌地方武装，摧毁反动政权，大力发动群众，发展人民武装的指示，以纵队为单位，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扫荡敌保安团以及其他土杂部队。到10月中旬止，攻克县城24座，解放了广大乡村，歼敌1万多人。基本上摧毁了敌人的统治，与刘邓、陈谢两支战略部队在中原构成了“品”字形的有利势态。

此后，我军除继续分兵清剿敌土杂武装，开展地方工作外，还辗转破击平汉、陇海、津浦三条铁路，剥夺敌依托铁路机动的有利条件，将敌注意力吸引到铁路上来，减弱其黄河防御，以利我军与华北、山东后方建立联系。

华东野战军前委为了在豫皖苏大量歼敌准备战场，在豫皖苏区党委内组织财经办事处，指定我兼任财经办事处主任，解决了几个问题：

1. 建立独立自主的金融阵地，只用我们自己银行的票子；
2. 恢复和发展解放区经济；

3. 精简节约；

4. 全党当家，克服无组织无纪律现象；

5. 组织供应战争的勤务，组织支前队伍、粮食供应等，强调将战争观念与群众观念结合起来。

1948年5月，党中央决定陈毅同志到中原局、中原军区工作；粟裕同志任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同年6月，粟裕同志指挥了豫东战役，在中原野战军密切协同下，攻克河南省会开封，接着围歼援敌于睢杞地区。在紧张的战斗中，我军处境异常艰苦，粟裕同志和前委向全军指战员发出“咬紧牙关，坚持下去，为争取此次战役圆满胜利而战”的号召，在前委的坚强领导和战时政治工作的有力保证下，我军指战员发扬不怕疲劳、不怕伤亡、连续作战的光荣传统，克服种种困难，终于取得了豫东战役的胜利。共歼敌9万余人，俘敌兵团司令区寿年。

豫东战役是我军在外线战场上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攻城打援之战。这次战役中，我军大大发展了攻防作战能力：歼敌数量由过去一次战役歼敌一个整编师增加到两个整编师以上的集团；对被围歼的敌人已可形成火力优势；协同作战的范围和规模，持续作战的时间和能力，战斗剧烈的程度，都超过华野以往进行的各次战役，显示了我强大野战兵团的威力。豫东战役是一场大仗、硬仗、恶仗。这次战役的胜利来之不易，它是全体指战员坚决执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英明决策，英勇奋战，以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主力以及冀鲁豫军区和豫皖苏军区参战部队，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下协力

作战的结果，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

豫东战役的胜利，使中原、华东战场形势出现了新的有利于我军的转折。以后，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同山东、苏北兵团会师，粟裕同志和谭震林同志一起，指挥了济南战役，歼敌10万余人，攻克山东省会济南，使华东、华北两大解放区联成一片。

第四个阶段，淮海战役（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

淮海战役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史上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总前委的具体指挥，参战部队的英勇奋战，是取得这次战役胜利的根本因素。在战役中我深深体会到，中原、华东、华北三大解放区人民的全力支前，是我军取得这次决战胜利的重要保证。

淮海战役是逐步发展形成的。先是消灭了黄伯韬兵团，以后随着情况的变化，逐步发展成横跨中原、华东两大战略区的南线战略决战。战役共分三个阶段，即首歼黄伯韬兵团，次歼黄维兵团，再歼杜聿明集团，直至取得战役全胜。把敌人主力消灭于长江以北。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胜利，为我军渡江作战，推翻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8年秋，我在中共豫皖苏分局担任财务办事处主任。10月，奉命调回华东野战军工作。10月29日，我到了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所在地曲阜。粟裕代司令员向我传达了中央军委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和刚结束的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精神。张震副参谋长介绍了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派军委后勤部长杨立三来曲阜研究部署淮海战役后勤工作

和支前工作后的准备情况，我即和喻纒云同志参加了华东野战军后勤司令部的领导工作，分任正副司令。

那时，前线捷报频传。济南、锦州、长春、郑州、开封相继解放。辽沈战役结束以后，全国军事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我军不仅在质量上占有优势，在数量上也已占了优势。在华东和中原战场，豫东、济南战役以后，山东全境基本解放，中原、华东和华北解放区联成一片，我军战力和解放区人力、财力、物力都大为增强，创造了南下歼敌的基本条件。连同华北、西北我军的胜利，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说：“只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以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在胜利的形势下，人们无不欢欣鼓舞。

淮海战役是敌我在江北的重兵决战。我军参战兵力、装备、物力、财力均不占优势，加之，徐州之敌是三大战役中唯一能够得到敌后方直接补给的力量，这就决定了战役中我支前后勤任务的艰巨和繁重。

党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十分重视淮海战役的人民支前和部队后勤工作。战役发起前就一再指示做好充分准备，战役发起后又要求“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全力保证我军的供应。”

11月中旬，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5位同志组成淮海前线总前委，以邓小平同志为书记，统一领导指挥华东、中原两野战军；以徐州为中心，与蒋介石最大的战略集团进行大规模的决战。总前委正确、适时地指导了淮海大战的支前后勤工

作。

战役第一阶段结束以后，军委、毛主席立即指示：

“必须准备全军部队及民工130万左右，3个月至5个月的粮食、弹药、草料，10万至20万伤员的医治”。“对于人民，必须实行耕战互助的方针”。以后，中央军委又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全军后勤工作会议。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关怀和正确领导，是推动战役后勤保障工作的关键。

淮海战役规模空前，支前后勤任务异常繁重。总前委、中原局、华东局、华北局加强了战役支前后勤工作的领导，统筹动员组织人力、物力、财力，一切服从前线需要。中原、豫皖苏、豫西、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和华东、华中、江淮、鲁中、渤海、胶东、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以及华北冀鲁豫，都抽调大批得力干部，建立和健全了支前后勤领导机构，制定了各项政策措施，发出紧急动员令，号召全体军民，集中一切力量，支援淮海大战。

各地对民工的组织、管理、调配、服务、轮换、供给以及政治工作，都作了部署。各地民工队伍的组成，一般照顾到地区情况，由村、乡、区、县、专区分别组成小队、分队、中队、大队（团）、支队不等。各级民工队伍，由党政主要干部带领。民工队伍按任务区分为归属部队领导调度使用的3个月以上的随军民工（一般每个纵队配备担架、挑子各500副，约3600人的一至两个随军担运团），归属支前机关直接掌握的服务一个月以上的二线转运民工，归各地政府领导在当地完成各项临时运输任务

和修桥、筑路的后方临时民工。

为了加强运输供应，我军后勤部门和各地支前领导机关，选定了十几条水陆交通运输干线，根据战役的需要和发展，设立了兵站、粮站、民站、油盐供应站、伤员转运站、野战医院和后方医院，组成了一个庞大的运输供应网。

为保证前后方运输和通信联络畅通无阻，发动后方人民大力抢修运输线。解放军打到哪里，就把公路、铁路修复到哪里。随着战役的发展，各地迅速修通了道路、桥梁，从四面八方延伸到前方，津浦、陇海、平汉、胶济铁道逐段提前通车，架设长途电话线路1000多公里。

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性支前运动，在苏、鲁、豫、皖、冀五省，东起黄海之滨，西至豫西地区，北自山东渤海，南达江苏长江北岸的纵横两三千公里，人口9000多万、面积35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区内，轰轰烈烈地展开了。这一地区包括当时中原的豫西、豫皖苏，华东的胶东、渤海、鲁中南、苏北、江淮，华北的冀鲁豫共八个战略区，和济南、潍坊、郑州、开封、洛阳，以及在战役中解放的徐州、商丘、连云港等大中城市。在这块辽阔的土地上，从后方到前方，从农村到城镇，男女老幼齐动员，家家户户忙支前，一切为了胜利，已成为千百万人民的自觉行动。许多党员、干部、劳模带头报名，父子、兄弟争着上前线。丈夫奋勇支前，妻子在后方努力生产，保证支前、生产两不误。各地的模范事迹层出不穷。人人都在为争取这次决战的胜利，奉献自己的力量。规模空前的淮海大战，展现出

一幅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的宏伟图景。

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这是战役的第一阶段。华东野战军粟裕代司令员原设想歼灭淮阴到海州之间的敌军，攻占两淮（淮阴、淮安）和海州、连云港，所以称为“淮海战役”。这一设想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和中原野战军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李先念等同志的支持。毛主席亲自制定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提出了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的任务。华东野战军执行这一作战方针，获取大胜。至22日，经15天激战，在徐州以东的碾庄地区，全歼敌第七兵团黄伯韬等部17万余人。

当时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驻临沂。这是我第二次来临沂。第一次是1947年1月，由华中转移到山东。这次重返临沂，我军已以排山倒海之势，威逼徐州，发起了巨大的淮海决战。革命形势的发展，使我心情十分激动。9日，我与鲁中南负责同志研究了该区支前工作。后经郯城、新安镇于16日到达宿迁。宿迁原属淮北根据地，我曾在此工作多年，此次随大军凯旋，倍感亲切。在这里，与华中工委书记陈丕显、江淮区党委书记曹获秋，共同研究了我军在追歼黄伯韬兵团作战中急需从华中地区筹措粮草、增调民工、延伸交通运输干线、增设供应线和健全支前机构等工作，取得了一致意见。

中原人民全力支援中原野战军，解放了商丘，攻克了宿县。迟滞了敌黄维兵团的东援，阻击了蚌埠北援之敌，有力地协同华东野战军完成了对徐州敌人的战略包围，切断了敌人的补给线。

战役的第一阶段，由于战前准备充分，粮食、弹药、被服等军需物资比较充裕，部队的后勤供应和伤员转运，初期均未遇到太大困难。只是在战役发起后，我军进展的顺利出乎预料，预设的粮站、兵站、医院被远远地甩在后面。小车、挑子、担架队赶不上急行军的部队，一时粮食供应的问题十分突出。后经过迅速调整，到11日黄伯韬兵团被包围在碾庄地区时，各方面的供应都跟上来了。此役，十余万支前民兵，数十万二线转运民工和广大后方临时民工，历尽艰辛，克服困难，担负繁重的战勤任务，保证了战役第一阶段作战的胜利。

黄伯韬兵团被全歼以后，由豫南赶来增援的黄维兵团，在安徽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陷入我中原野战军的包围。蚌埠、徐州之敌南北对进，妄图解黄维之围，都遭我华东野战军的顽强阻击。徐州杜聿明集团南援不成，放弃徐州向西南逃窜，又被我华野包围于河南永城和江苏肖县（现属安徽）之间的陈官庄、青龙集地区。遵照中央军委指示，采取消灭黄维兵团、围住杜聿明集团、阻住蚌埠北援之李延年、刘汝明兵团的方针，对敌实施作战。从12月3日夜至15日，中原野战军浴血奋战12天，全歼敌黄维兵团和由徐州西逃的孙元良兵团共12万余人，生俘黄维。这就是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

在战役第二阶段中，由于战线迅速西移，战役规模扩大，两大野战军集中在豫皖苏三分区一个地区作战，军需供应物资陡增。山东、华中所筹粮食离战区很远，一时难以运到。华北局立即要冀鲁豫调拨粮食一亿斤，中原局也

要豫皖苏大力筹粮供应前方。同时豫西、渤海也很快起运军粮，华北、华东调来大批弹药。中原局邓子恢、李达同志得知徐州敌人西逃，立即给华东野战军送来中州市两亿元，并在郑州、开封搜集现粮，车运碭山。战役在豫皖苏地区进行，他们动员全区人民，不惜倾家荡产，支援淮海大战，及时向前运送粮草、油盐、服装。我军后勤部门迅速组织济南、徐州、开封、郑州等地的人民群众赶制大批被服送往前方。同时赶修交通干线，组织了火车、汽车、民船送输。增设了兵站、粮站、民站、医院和转运站。经过各地紧急动员，一齐努力，前方供应紧张的情况才有所缓和。

百万民工从四面八方汇集战场，他们来自不同地区，穿着不同服装，操着不同口音，但大家都怀着一个共同信念：保证供应，全歼敌人。当时我们缺乏现代化交通工具，主要靠人背，肩挑，担架抬，小车推，牛车拉，骡马驮。民工们冒着枪林弹雨，风雪严寒，日夜奋战在运输线上。那伟大的场面，十分感人。陈毅同志《记淮海前线见闻》的诗词，再现了当年人民支援前线的壮丽情景：

几十万，民工走不通，
骏马高车送粮食，
随军旋转逐西东，
前线争立功。
担架队，几夜不曾睡，
稳步轻行问伤病，
同志带花最高贵，

疼痛可减退。

部队连续作战，伤亡不断增加，急需兵源补充。解放区人民响应党提出的“到前线去，到主力去！”的伟大号召，鲁中南、渤海、胶东14个地方基干团（25000人）开赴前线。各地掀起参军热潮，渤海16000名青壮年入伍，胶东万余名子弟兵待命出征，豫西6000名新战士参加主力。新兵源源补充前线，我军愈战愈强，战役前后，仅山东省就动员168000名青壮年入伍。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山东解放区共动员58万人入伍。

各地民兵积极配合部队作战，在后方保卫生产，肃清土顽，保护交通，维护社会治安；在前方押解俘虏，捕捉散兵，成了野战军的有力助手。豫皖苏夏邑县王楼乡200余人的民兵担架队，一天夜晚发现一股逃敌，他们机智勇敢，一拥而上，全歼逃敌。俘敌团长以下400余名，缴小炮1门，机枪5挺，长短枪200余支。敌四十一军中将军长胡临聪，在全军覆灭时化装成商人潜逃，被我豫皖苏民工俘获。敌人完全陷入了我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12月1日，我军解放战略要地徐州。缴获敌人的170门火炮和大批弹药、被服装具，立即供应前线。广大工人、市民动员起来，组织100多辆私营汽车，数以千计的平车、马车，投入支前行列。铁路员工和铁路沿线农民不到20天就修复了线路，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陇海铁路干线，东到新安镇，西迄洛阳，南抵宿县，北达济南，很快通车。大大加快了支前物资的运输。徐州的公私医院，迅速担负起接受伤员的任务。解放了的徐州，很快成了支援我军作

战的重要枢纽和基地。

在前后方人民的全力支援下，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胜利圆满结束。

全歼黄维兵团以后，战役进入第三阶段。我军对被包围在陈官庄地区的杜聿明集团（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暂缓攻击，转入战场休整。

当时，雨雪交加，部队需要筹足过冬粮草。道路泥泞，运输方法落后，粮食供应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各地区统一筹划。我和华东支前委员会主任傅秋涛同志向粟裕同志报告了这一情况。粟裕同志12月15日报告中央军委，建议召开一次包括华东、中原、冀鲁豫、华中四方面代表参加的联合支前会议。中央军委12月20日指示总前委，同意召开这次会议，解决支前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总前委派我具体负责筹备。会议于12月26日至29日在徐州召开，总前委指定我出席，会议由我和傅秋涛同志轮流主持。

经过四次讨论，会议协商了共同支前方案，明确了四个地区的分工。决定战场的东南两面归华中区负责供应；战场的北面由山东供应；战场的西南面由豫皖苏供应；此外，冀鲁豫区调小米一亿斤作为后备，由华东支前委员会统一调度。会议对粮食、民工问题，交通问题，战场六种流通货币的币值统一问题，部队元旦、春节的供应问题，以及部队南进时支前领导机构的组织形式等问题，都交换了意见，提出了建议。

1949年1月3日，我返回华东野战军指挥机关所在地

蔡洼，向华东野战军前委汇报了会议情况，向总前委写了书面报告。10日，接到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同志给我的复信：

送来联合支前会议各件，均已阅悉。我们完全同意该会所作各项决定，请即依照执行。

淮海决战，数百万民工踊跃支前，英雄事迹感人至深。宿迁县大兴区千余民工，推着907辆粮车，在风雪中跋涉。木轮车陷在半尺深的泥土里，他们四五个人一辆车，连扛带拉，棉衣被汗水雪水湿透，连续过几个淤泥荡，有时一天只吃上一顿饭。奋战四昼夜，行程400里，把9万斤大米，全部运到部队。风雪中粮车上没有防雨用具，许多民工脱下蓑衣、棉袄盖上，自己穿着单衣，顶风冒雪推车前进。冀鲁豫区东明县担架队转运伤员时，遇敌机轰炸，四名民工扑到伤员身上掩护。他们宁愿牺牲自己，也不让伤员二次负伤。结果一个民工受伤，保护了伤员安全。济南战役时，奖励某地民工每人两包饼干，他们都不舍得尝，带到淮海战场，留给伤员吃。伤员不能动，民工们就用自己的茶缸、水瓢给伤员接大小便。这些可歌可泣的事迹，至今念及，仍令人感动不已。

各地民工、民兵组织，贯彻了党的“把支前民工队当成学校办”的方针，建立了党的支部和政治、文化学习制度。民工们提高了政治觉悟，许多先进分子被吸收入党，提拔成干部。胶东、渤海在6万常备民工中，发展党员7259人，提拔干部2046人。许多民工队伍中建立的党支部，形成了团结战斗的坚强堡垒。民工队伍中，还开展了立功创

模活动，渤海一专区担架团随军服务8个月，征战1万余里，全团90%以上的人立了功。荣获奖旗66面，华东支前委员会授予“模范担架团”的称号。人民支援了战争，战争教育锻炼了人民，又赢得了战争的胜利。

12月下旬，连降大雪。我军阵地上粮弹充裕，兵强马壮，士气高昂。元旦，战士们每人收到一份经中央批准慰劳的年礼：一斤猪肉，五盒纸烟。同时每个战士都得了—个后方人民送来的慰问袋，有的装有军鞋，有的装有花生、红枣、慰问信。而近在咫尺的敌人，却是士气颓丧，粮尽弹缺，已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军对敌展开强大的攻心战，向敌喊话：“国民党军兄弟们，过来吧，解放军宽待俘虏，大米饭、白馒头尽你们吃”。这样，人民支援的大米、白面、热包子、肥猪肉，也成了直接打击敌人的武器。饥寒待毙的蒋军官兵，舍命逃出活地狱，20天内自动来降者达14000余人，相当于敌人两个师的兵力。

战役最后阶段，前方我有60万大军作战，百万常备民工支前，加上6万多起义、投诚人员，32万多俘虏和被收容的10余万敌军伤兵，前方吃饭人数总计200多万。我参战部队与前后方支前民工比例，接近一兵十民，大大超过了战役初期一兵三民的概算。由于后方的全力支援，民工们的日夜赶运，到战役结束时，前方尚剩有粮食1亿4千多万斤。

从1949年1月6日到10日，华东野战军在中原野战军的配合下，在永城东北青龙集、陈官庄地区，全歼杜聿明集团，生俘杜聿明。至此，经过66天激战，歼敌555000

余人，淮海决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解放了长江以北华东、中原广大地区，加速了蒋家王朝的覆灭。

战役期间，有关行政区前后方共动员民工约计500多万人（其中随军民工约22万，二线转运民工约131万，后方临时民工约391万人），担架23万副，大小车85万辆，转运伤员11万人，送达前方粮食5.7亿斤，弹药物资330万吨。

10日晚上，我随粟裕代司令员、张震副参谋长，驱车去陈官庄战场。月光普照大地，打扫战场的汽车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战士们还忙着搬运胜利品。一群群的俘虏被押出战场，三三两两的敌伤兵正等待我军收容。战场上一片胜利的喜悦。

从战场归来，心情激荡，赋诗一首《庆淮海战役全胜》：

徐宿肖永大战场，自古兵家决兴亡。

蒋帮陈兵八十万，妄图顽抗逞强梁。

主客攻守时已变，解放军威势大张。

百万军民齐协力，长围猛击力如钢。

敌军饥寒交迫日，我师赳赳气昂扬。

四晚总攻同捣蒜，蒋军穷蹙终败亡。

一战全胜定江北，整装待发渡长江。

第五个阶段 进军江南（1949年2月至1949年6月）

淮海战役胜利以后，华东野战军于1949年2月在贾汪召开前委扩大会议，总结淮海战役经验。陈毅同志指出，淮海战役的胜利是毛主席战略方针和指挥艺术的胜利，是在总前委统一指挥下，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紧密协同，英勇战斗的成果。陈毅同志着重赞扬了人民支前的作用，

他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子推出来的。”

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这时进行了整训。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全军实施统一整编，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称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前委改称第三野战军前委，陈毅同志任书记。

辽沈、淮海、平津战役后，国民党军残部退守江南。为把革命进行到底，加速解放全中国的进程，党中央、毛主席命令总前委指挥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及第四野战军一部渡江南进，解放京沪杭地区。总前委依据中央指示，拟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为了胜利实现渡江南进的战略任务，总前委、华东局和三野前委除按照中央二中全会的精神，领导全军进行了思想、政策、军事各项准备外，还领导华东支前组织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对渡江作战以及南京、上海等城市解放后各种支前供应问题作了统一的部署和安排。组织了东西兵团后勤分部，动员了广大人民大力修筑道路、桥梁，疏通河道，架设长途电话线，筹集和运送粮草军需品等。

淮海战役为渡江作战实施京沪杭战役提供了极为良好的条件，华北、中原、山东、华中四个战略区连成一片，我军有了辽阔可靠的后方，有亿万人民的支援。部队装备、机动能力较前增强，交通条件显著改善，有铁路、公路，淮河、运河、涡河。更重要的是有了支援大规模战争的经验。这时长江以北广大新区已发动群众，支援前线，老区民工大批复员。经过连年战争以后，老解放区人民可以休养

生息了。

百万雄师强渡长江，解放京沪杭，是一个规模巨大的战役。兵马未动，粮草先筹。充分的后勤供应是前方作战胜利的重要保证。

战役的规模是空前巨大的，支前的规模也是空前巨大的。部队和地方都作了充分准备。华东支前委员会对战役需要作了详细计算，作出具体计划，重点是粮食供应和渡江船只问题。

粮食：部队与随军民兵、民工，178万人，粮食供应量很大。分配：江淮准备9000万斤，苏北准备1亿斤，皖北准备1.1亿斤，共3亿斤。预计吃到渡江以后，还余下1.5亿斤供应江南。

过江以后，部队、民工及解放战士约计200万，5个月需粮5.3亿斤。上海市500多万人口，每月需9200万斤，南京市每月需3500万斤，每月共需1.2亿斤，5个月要6亿斤，共需11.3亿斤。计划在江南征借9亿斤，江北调运3.5亿斤。

渡江船只：苏北抽调8000只（渡江船2600只，运粮船1200只，随军弹药船1100只，渡江前内河运输船2300只，机动800只），皖北内河抽调10039条，淮河抽调3131条，共21170条。

随军南下民兵：用于维持秩序，解押俘虏，需18个团、两万余人。

船只和水手是渡江作战的先决条件。部队团以上都建立了船只管理机构。在各级支前机构和人民的支援下，到

4月初，第三野战军搜集到的各类木船，每个军大约可分到500到600只，加上部队自己制造的运送火炮、车辆、骡马的竹筏、木排，基本上解决了第一梯队乘载的需要。船只问题解决以后，做好船工工作就十分重要了。各部队采用的办法是：把首批渡江夺取对岸阵地的部队和船工组织在一起，共同生活、操作；动员上万名船工，训练部队选派的数千名水手；在船工中展开诉苦教育，在部队中展开团结船工的运动；制定船只损坏赔偿办法，船工伤亡优抚条例，妥善安排船工家属生活。因为做了这些工作，促进了船工、部队指战员的亲密团结，树立了强渡长江天堑，打倒国民打倒国民党反动派的胜利信心。

在党中央《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指引下，我军在4月20日开始渡江。当时长江风平浪静，我们万船齐发，直取对岸。人民解放军好似摧枯拉朽，一举突破国民党反动派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敌人军无斗志，纷纷溃退。我百万大军渡过长江，4月23日解放南京，5月3日解放杭州，5月27日解放上海。京沪杭战役胜利结束。

在四年解放战争中，除参加土改工作外，我主要是随军参加支前后勤工作。先在华中、华东，后在中原参加淮海战役，直到渡江，经历了在这些地区进行的诸大战役。回顾四年的支前后勤工作，其基本经验是：

（一）四年支前后勤工作，解决了分散落后的农村如何支持高度集中大规模的现代化的战争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很多矛盾的：第一个矛盾，作战部队是

集中的，但供应战争的人力，粮食是分散的；第二个矛盾，战争是现代化的，部队需要高度机动，而我们的交通运输工具是落后的；挑子、小车子、老牛拉破车，每人只能挑两发大炮弹；第三个矛盾，战争情况极端复杂，变化多端，不一定在什么时候打。由于战线不固定，不一定在准备好了的地方打，因此，既要保证需要，又要适应战线不固定的情况。大批物资运到，部队一转移，马上又出现了因搬运不及而产生的粮食物资安全的矛盾。但是，在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支持下，这些矛盾都陆续解决了。人民不仅支持了战争，而且赢得了战争的胜利。问题就在全面认识战争，认识战争的条件和特点，这样，我们就能够找到解决矛盾的方法。我们进行的是人民战争，得到人民的拥护。在人民群众中，人力物力丰富，经过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阶级觉悟提高了，只要加以科学组织和调度，就能供应战争。防御阶段在内线作战时，战场是在解放区包围之中。这是解放了的农村，党领导的农民和党有血肉关系：“听毛主席的话，走共产党的路”，这就能使分散的人力、物力、财力，组织成集中的人力、物力、财力供应战争。战线虽然不固定，变化多端，但只要科学计算，计划调剂，合理使用，严格管理，就可使组织起来的人力、物力、财力适应战争的需要。

抗日战争中，只有战斗供应和部分战役供应。四年解放战争经验告诉我们：只有战役供应还不够，还必须有战略准备。战争向哪里打？如何打？规模怎样？也要早有预计，在战略准备中，考虑战役准备。还要考虑战场波及地

带。要把战争需要和人民供应能力同时计算清楚（包括前方和后方，部队与地方）。孙子说：“多算胜少算”。毛主席说：“心中要有数”。我们就是首先心中要有数。

（二）“一面打仗，一面建设，以战养战，以战教战”。既保证战争需要，又坚持自力更生，不断培养民力，供应前方和爱惜民力结合起来；战争观念和群众观念统一起来。最具体的表现是土改、生产、支前密切结合，全面照顾。有五个环节要注意：

1. 领导上把三方面任务统一起来，实行“耕战互助”，统一部署工作，丢了一条都不行；
2. 全面组织人力，实现出工合理化，实行合理负担；
3. 支前工与后方生产工合理交换；
4. 发动妇女儿童半劳动力参加生产；
5. 不断进行生产救灾，及时医治战争创伤。

（三）满足战争需要和长期打算相结合。一切为了战争胜利，克服片面群众观点，确保战争需要，保证供给。另外，要掌握战区、近战区、后方之间负担相对平衡的原则，不要畸重。不要好征的地方就拼命地多征，“竭泽而渔”，否则会妨碍生产，不能持久地支持战争。

要根据实际情况分配任务。在作战情况下，不管远近，粮弹都要确保供应。部队休整时则要靠近粮区，以节省民力。

一钱一粮都不要浪费，力求节约。

（四）取之于民、取之于己、取之于敌三结合。取之于民上面讲了许多。取之于敌，即以缴获敌人的东西，改

善部队装备；将战争引向蒋管区，在新区迅速组织人力、物力支援战争。取之于己，即组织后方生产。在粮食供应上，后方前运、就地筹借这两者是主要的，部队自带粮食和缴获敌人的粮食是辅助的。

（五）把广大后方分散农村的粮食集中起来供应前方，增加部队的机动力，关键是运输问题。我们是凡能用的方法都用上了：肩挑、背背、小车推、牛车拉、牲口驮、担架抬。战争前期是以落后工具为主，后来逐渐发展到利用缴获的现代化的运输工具建立适合新的战争条件的运输制度。

（六）部队需要有统一的、坚强的、系统的后勤机构。随着战争的变化，随时采取机动灵活的科学的供应方法：

1. 先期周密准备，掌握机动数字，节约使用；
2. 部队携带和地方准备相结合。

（七）部队后勤和地方支前相结合，密切协同。地方上也要有系统的、统一的、强有力的支前后勤机构，华东支前委员会和各战略区的支前机构，做了极其出色的工作。

（八）支前后勤是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群众运动。党的领导是决定一切的。战争中党中央、中央军委、中原局、华东局、华北局、华中分局及各级党委对此都是积极领导、全力支持的。没有这一条将无法供应大规模的战争。整个工作的过程，都贯串着不间断地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不断地鼓舞干劲，表扬先进，树立榜样，把供应战争需要变成人民群众自觉行动。同时，还要加强政策纪律教育，搞

好同友邻的与群众的关系，坚决走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

(杨居仁 整理)

西安办事处工作片断的回忆

孔石泉

西安办事处是我党1936年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为了适应统战工作的需要而设立的一个公开办事机构。在红军改编前叫红军联络处，红军改编后，改名为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它既是为了便于和国民党当局联系，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机构，也是我党在西安的一个秘密据点，是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联系党中央的桥梁。全体工作人员上下一心，艰苦奋斗，紧密联系群众，给群众以良好的影响。办事处在当时国民党统治的地区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尤如一座明亮的灯塔，使人们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在西安办事处工作过的有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等中央领导同志。

西安办事处的机构和人员情况如下：

处长（主任）：李克农、李涛、伍云甫（先后任职）。

秘书科：童小鹏、孔石泉、何侠、王宇等。

总务科：莫钧涛。

机要电台：吴振英、赖奎、刘成青、范希贤、林青、罗树芬等。

会计科：曹根全。

延安总部供给部派驻西安采购委员会的人员有：叶季壮、吴习智、张元培、殷承祯、喻杰、王政、邱南章、吕继才、阙桂兰等。

保卫：陈有才、王辉、曾广梅、张耀祠、颜泰隆、古远兴、吴志坚等。

当时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有以下几个方面：

转送地下党给党中央的报告。常常是地下党将给中央的报告用米汤密写在一部小说的背面，再原样装订成册。我们接到后就拆开用碘酒涂抹，密写的字就显出来了。抄好后再送往延安。为了便于联系地下党，西安地方党还介绍了两名青年来办事处工作。一方面他们可做些文字的书写工作，另一方面他们熟悉本地情况，便于联系群众，也是在实际工作中培养干部。这两位同志就是何遇辅同志（即何侠同志）和王宇同志。

招收青年学生，介绍去抗大、陕公学习。抗战爆发后，日寇疯狂向我华北、华东大举进攻。而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充分表现了国民党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丑态。亡国论的各种谬论充满了国民党内。在大敌当前的紧急关头，国民党却仍在高唱“读书救国”，不准学生参加抗日救亡活动，镇压各地的学生运动。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另一方面，人民看到了共产党坚决抗日的主张，八路军纷纷开往抗日前线，深入敌后打击日本侵略者不断取得胜利。民族危机深重，人民不愿坐等亡国当亡国奴。为了寻求抗日救亡的真理，国民党统治区的许多青年学生不畏国民党的阻挠和恫吓来到西安办

办事处要求去延安学习。办事处就成为招收青年学生的基地。经过谈话和初步的考试就介绍他们去陕公和抗大学习。他们热情很高，不怕艰难困苦，没有车辆就步行数百里去延安。抗大、陕公培养了大批的干部。他们经过战争烽火锻炼，许多同志成为我党的高级干部。

接待西路军我军被俘人员。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经过浴血苦战，最后弹尽粮绝，失败了。他们有的分散跑回边区根据地，有的被国民党俘虏了押解去南京，有的被送到西安。西安监狱关着40多个营以上干部。他们在监狱里向看守人员宣传我党我军的主张，得到卫兵的同情。卫兵帮助他们送信给办事处并说明我被俘干部的情况。我们知道后立即报告了周恩来副主席。经过交涉，国民党才不得不把他们放回。在放回来的人当中，有当年和我一起红军总部一局工作过的黄鹄显同志，还有一些是女战士。他们受尽了国民党的种种虐待，衣服破烂不堪，面黄饥瘦。组织上给他们换发衣物，治疗疾病，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以后，又将他们送回了延安。

采购运输各种军用物资器材和买大米等生活物资，领军饷，定做服装，接收华侨和各地进步人士捐献的物品和医疗药品。这些都是由供给部派驻西安的同志办理的。他们住在西安七贤庄四号，经常来往于延安、西安之间。他们的工作是既重要又艰苦的。西安到延安的公路那时很坏，汽车跑一趟得三天时间。遇上阴雨大雪，路途十分难走，有时就被阻在荒岭或途中。他们深知这些物资来之不易，沿途非常小心谨慎，千方百计保证把这些物资器材安全迅

速的送到延安。到了延安还未歇息，就又开车返回西安，准备第二个往返了。

和特务作斗争。办事处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心脏——西安，国民党反动派对办事处恨之入骨。迫于舆论的压力，不敢公开取缔和明目张胆的破坏，就采取各种卑鄙的手段进行捣乱和破坏。他们在办事处的周围布满了特务。有的伪装成拉车的，有的伪装成卖纸烟、糖果的小贩。在周围房屋上设置瞭望点。他们常派特务伪装检修水电的工人，到我驻地刺探我内部情况。用各种办法对我进行盯梢，监视我进出人员。他们还故意制造困难，对我办事处的供给多方刁难，对办事处人员无端纠缠，设置种种障碍。特务对宣侠父同志的秘密杀害更是一起严重的事件。宣侠父同志是黄埔军校一期学员、我党党员。他有不少同学、同事在国民党内工作。为了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调来西安办事处以八路军高级参议名义进行工作：宣传我党我军的抗日主张，积极进行抗日的统战工作；揭露国民党反共、摧残抗日爱国进步力量的罪行；为我采购和劝募军用物资。国民党反动派把宣侠父同志看作是眼中钉，于1938年秋，乘宣侠父同志外出工作时，秘密地逮捕了他。我们党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指出：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国民党统治的地方，我方高级将领竟然失踪！要他们立即交出人来，并要保证宣侠父同志的安全。但国民党反动成性，对此置之不理。以后了解到宣侠父同志受尽了各种刑罚。国民党反动派对他进行威逼利诱，他义正词严的宣传我党团结抗日的主张，毫不为之所动。国民党反动派就把他秘密杀害

了。我们在舆论上揭露国民党这一罪行。这是国民党特务欠下的一笔血债。

党中央对西安办事处的工作是极为关心的。周恩来副主席，叶剑英总参谋长当时就住在办事处内。他们日夜操劳，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多次出入国民党军政要人的官邸，接待社会名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经常教育办事处的工作人员，要为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力。不仅口头宣传，还要以实际行动扩大办事处的影响。要大家研究如何把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很好地结合，如何接待从全国各地来的青年学生和各界知名人士；想方设法打开门路争取多送一些物资药品到延安去。他们常常教育我们，西安与延安不同，情况复杂，要防止国民党特务和其他坏人的破坏和捣乱，要站稳立场，提高警惕，注意安全保卫工作，保持我军的光荣传统。要把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建设成为矗立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红色堡垒。

西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在周副主席等中央首长的关怀教育下，日以继夜、兢兢业业地工作着。他们坚持党的光荣传统，积极努力，艰苦朴素，谦虚谨慎，诚恳待人，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的方针和政策，给大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全国抗日战争全面展开，许多工作都开展起来了，西安办事处的任务更繁重了。它又成了一个从延安到前方和敌人后方，以及国民党统治区的中转站。

1938年春，我离开了西安办事处转到了八路军驻武汉

办事处，新的任务又开始了。

张闻天同志领导牡丹江军区剿匪

刘贤权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了独占东北，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从陆地、海上、空中向东北运兵，并收编了大批的伪军和土匪。这些汉奸、走狗、野胡子（土匪），经国民党封官委任后，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的“地下军”、“先遣军”，继续残害人民，无恶不作。党中央毛主席针对当时东北的形势，发出了“肃清反动武装，发动群众，收集武器资财，发展部队，接管城市”的指示，并从关内向东北调去了一大批干部和相当数量的主力部队，以充实我党在东北的武装力量和加强政权建设。山东渤海军区接到上级指示后，新组建了两个师，并决定由刘其仁和我及陈德、王兆相同志率一个师从陆路向东北挺进。1945年10月上旬，我们由山东惠民出发。部队到达古北口后，立即构筑工事，勘察地形，区分任务。部队安置好后，我于11月15日动身，22日到沈阳，向东北民主联军罗荣桓副政委汇报工作。四五天后，在总部听我汇报的还有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伍修权 and 纵队司令员陈光。罗副政委听完汇报后说：“你不要回部队了，去合江军区当司令……张闻天兼任政委。下午你来见见高岗（北满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同志和张闻天同志，同他们一道去哈尔滨。北满地区土匪猖

獾，你到那里以后，主要任务是组织剿匪。”

听了这个决定，我想，张闻天同志是中央委员，又曾在中央负过总责，担心自己水平低，同他一起工作怕配合不好。但又一想，既然组织上决定了，我只有服从命令。下午在罗副政委那里会合。高岗也在场。张闻天同志谈话非常和气，他说，咱们今晚坐飞机去哈尔滨，了解清楚铁路通车情况，再去合江。还问我有什么困难没有……罗副政委的秘书给我办了委任状。因我的警卫员外出未归，而改乘火车，第二天（29日）到达哈市。我按约定地点多次联系都没有联系上，第三天才遇上他们。张闻天见我就说：“等了你几天，以为你不来了，就让方强去合江当司令了。你改行做政治工作吧。”我说：“我不想改行。按罗副政委指示，跟你剿匪去，有仗打就行。”他高兴地说：“好！咱们一同去合江剿匪。”两次见面时间都不长，但给我的印象很深。张闻天同志热情诚恳，决定问题果断。打消了我怕配合不好的顾虑。

12月3日，我随张闻天同志从哈市乘苏联红军的火车（闷罐）第二天到达牡丹江。稍事休息，他便找当地干部谈话，调查研究。了解牡丹江至佳木斯（合江军区所在地）铁路通车情况。14日我们又乘苏军闷罐车去佳木斯，途中因交通受阻，我们在林口停下住了几天，仍不能前进。又因牡丹江地区土匪嚣张，形势紧迫，急需剿匪，所以我们跟随张闻天同志于21日返回牡丹江。

当时，牡丹江地区的形势很紧张。日本投降后，土匪纷起，经国民党收编、委任的土匪谢文东、马喜山等部，

从南北两个方向逼近牡丹江市。我军在牡丹江地区收编、委任的部队，有的战斗力不强，有的叛变从匪。铁路干线常被土匪截击，社会秩序混乱，夜间常有土匪窜到市郊骚扰抢劫，广大群众惶惶不安。对此，张闻天同志以中共东北局代表的身份一面调查研究牡丹江地区的情况，一面发动群众，指挥布置军队剿匪，并着手研究牡丹江地区党、政、军的建设问题。他要我到当地简岛区帮助工作，主要任务是调查研究。我到简岛区后，很快了解到：这个区朝鲜族多；驻有我收编的部队但大部叛变……接着，我去调查了十五团的情况。该团领导力量薄弱，需要调整。团长马培峰闹独立，不听地区司令部的指挥（后来，调红军干部宋维藩任团长，三营营长赵金发任团参谋长，团部参谋孙平任三营营长。团领导成员调整后，情况有了好转）。张闻天同志摸清了牡丹江地区的情况后，决定去宁安县蹲点。他对我说：“东京城是牡丹江的南大门，形势很紧张。那里有个民团与土匪马喜山对峙，时间长了怕顶不住。你去那里当地区司令，负责剿匪，民团归你指挥。只要不让马匪打进东京城，牡丹江就安全多了。”我听了很高兴，当天（12月30日）就随他赶到宁安城。没顾得休息，张闻天同志就向宁安县的干部讲了发动群众问题。他说：“宁安是牡丹江的经济文化中心，物产丰富，社会秩序较好，驻有苏联红军。政权是我们的，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要开展群众运动，放手发动群众……”接着，张闻天同志对今后的工作提出了要求，指出：“现在工作中有两个缺点：一是手工业方式，二是秘密工作方式。采取正规化的方式不

行，用根据地的老经验也不行。要进行调查研究，根据当地情况进行工作。我们要大胆地干，制造革命空气，启发群众的积极性。”第二天（31日），张闻天同志又在干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指出了牡丹江地区今后的中心任务是剿匪，建立政权、建军，整顿部队，广泛地开展群众工作。

遵照张闻天同志的指示，上级委任我为东京城地区司令。我1946年1月4日到东京城。在张闻天同志直接领导下指挥剿匪，整顿四团，放手发动群众同盘踞在马莲河的马喜山土匪作斗争。

随我去东京城的有从延安来的团政委邹世环，团政治处主任阎玉森，还有一位营长、警卫员、马夫等六个人。我们到四团了解编制、干部和部队思想及战斗力情况。这个团当时有1800余人，下辖4个营，2个警卫连。三营全由朝鲜族的同志组成，受抗联影响较大，政治上拥护共产党，作战勇敢，对土匪斗争坚决。二营较差，营长姓刁，是国民党打入民团的奸细，国民党委任他为东北先遣军第四团上校团长。他在干部中挑拨离间，制造混乱，妄图伺机把民团拉出去，向国民党邀功请赏。有一次他夜间摸到司令部企图干掉我们，被发现没敢下手。根据干部战士揭发的他的一些罪恶，我到宁安向张闻天同志汇报后，经批准镇压了这个坏家伙。经过教育训练、整顿、调整基层干部，纯洁了内部，提高了民团的战斗力。在战术上，从过去的死守城池改变为积极防御与主动进攻相结合。我们多次抓住有利战机主动出击，消灭土匪的有生力量，稳定了东

京城局势。最后，我们配合海军二支队主力部队攻克了马莲河，消灭马喜山匪部300余人，俘虏百余人，马喜山及残敌南逃。马莲河战斗胜利后，四团在群众中的威信日益提高，当地的青年、学生踊跃参军，四团的部队扩大到3000余人。

打了马莲河后，经张闻天同志提议，上级批准，调我任牡丹江军区副司令员，仍然负责剿匪。2月中旬，张闻天同志指示：军区剿匪部队，分为南北两路，同时进剿，打开牡丹江的局面。李荆璞司令在军区召开会议，讨论了南讨郑云峰、马喜山等匪部，北伐土匪谢文东、李开江、张德林的作战部署。会后，南路由田松支队长率领一团和二团大部，奇袭鹿道成功后向镜泊湖方向进剿，歼敌2000余人，解放了30多个村庄，取得了讨伐郑、马战役的胜利。由我带领的北路剿匪部队由二支队二团一营（欠一连、配七连）、团机炮连一部和十四团二营组成。从牡丹江出发，攻下草甸子、柴河、五林等地，歼灭土匪李开江、张德林各一部。3月初，方强同志率合江部队向南进剿，到林口与我们会合，研究配合剿匪的方案。因合江告急，他当天返回合江。我部即向铁路以东方向急进。3月21日晨突袭板院后，部队乘胜前进，准备强攻杏树村时，杨子荣机智勇敢独闯敌营，说服400余名土匪投降。接着部队又拿下柞木台和双河屯等土匪据点，毙、伤、俘匪千余人，缴枪炮数百支。我们与合江部队紧密配合，全部肃清了北路土匪，解放了牡丹江以北100多平方公里的地方和近百个村庄，打通了牡丹江至佳木斯的铁路交通线。

5月上旬，根据张闻天同志指示，军区部署东路剿匪任务，确定我带领以二支队二团为主，配一团一部，炮团一个连，坦克二辆组成的一支部队，5月16日攻打穆陵的马桥河车站。这里盘踞谢文东所属700余人，经两个多小时激战，全歼顽匪，解放了穆陵城。29日追击到永安，俘敌30余人，毙、伤敌10余人，我无一伤亡。6月4日解放口岸重镇绥芬河。这期间，位于牡丹江东北方向的鸡西，仍常常遭到土匪的袭击。根据鸡西军分区提供的敌情，我带二团一个营、十四团一部，绕到鸡西侧后，与鸡西军分区司令肖荣华，政委谭文邦指挥的部队相互配合，插向密山方向，而后又从密山打回鸡西，消灭了密山至鸡西一带的400余名土匪，解了鸡西之围。部队进驻绥阳，作短暂休息，补充弹药。我们拟定了对东宁县城的作战方案。东宁县城已经解放。建立了政权。后被国民党特务头子王枝林、贯匪吴三虎（吴家三兄弟）占据。他们丧心病狂地杀害和关押了一批我们的革命干部和群众。我们6月11日晨4时，兵分两路，我和二团团团长王敬之，副政委曲波，炮团团团长黄东保带炮兵一个连和二辆坦克从绥芬河向西南绕过东宁，断敌南逃之路。一举攻克东宁城，救出了被囚的干部和群众。第二天上午，约700多匪徒向我反扑，被我击溃。至6月底，东线剿匪部队将王、吴匪部全部肃清。歼敌2000余人，受到总部的通令嘉奖。

6月27日，我回牡丹江，向李大章同志和军区党委汇报剿匪工作，安排下半年工作任务。这时，上级已经批准，调整了牡丹江军区的领导干部。政委仍由李大章同志兼

任，司令员李荆璞调合江军区工作。由我任司令员，田松同志任副司令员，新领导班子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剿匪。

回顾牡丹江剿匪的斗争，每个战役张闻天都亲自领导研究部署，有的战斗是他直接参加指挥的。牡丹江剿匪的全面胜利与张闻天同志的领导是分不开的。他不仅剿匪有功，对打开牡丹江的局面，开辟牡丹江地区的工作，整顿部队和党、政、军等方面的建设，都做出了积极贡献。他的功绩将永远载入牡丹江和我党的史册。

张闻天同志给我的印象很深，记得在江西第五次反“围剿”战斗中，我在红一军团二师卫生部工作。当时流传一个谜语：“听见全世界”，打一位名人名字。这样，我对张闻天同志的名字记忆很深。部队到遵义，张闻天同志给红一军团连以上干部传达遵义会议决定，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第二次就是这次牡丹江剿匪了。在整个剿匪过程中，我经常向他请示汇报工作，也谈思想，谈生活，有啥说啥，无拘无束，亲密无间。他知识广，谈问题透彻，作风老练、耐心，使我受到很大启发和教育。记得我们从哈尔滨乘火车（闷罐）去牡丹江时，苏联红军把张闻天同志和他爱人刘英及我们随行人员都赶到一个角角里。我和工作人员都很气愤，要找苏军讲不该这样对待我们的领导同志。张闻天再三阻止说，不要讲，能把我们拉到牡丹江就感谢他们了。他不愿公开身份。这样，我们都只好挤在一个角落里。有一次我与驻东京城的苏军联系，有个苏联军人看中了我的警卫员的手枪，给卸去了。我向张闻天同志反映，要苏军把枪还给我们，他劝阻说，算了吧，剿匪再缴

一支。就这样，张闻天同志处处以大局为重，宽宏大量，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

张闻天同志对干部一视同仁，作风民主，善于听取部属的意见。记得我们在林口受阻返回牡丹江后，他派我去简岛区搞调查研究，我向他提了两点意见：一是，牡丹江地区土匪如此猖獗，军区收编的部队战斗力不强，成份复杂，有的逃跑，有的叛变从匪，光靠现有力量剿匪是不行的；二是，叫我去简岛搞调查研究，我马上动身。回来后，我还是要求带部队去剿匪。土匪这么嚣张，烧、杀、抢劫，我忍不住了。当时，我说的很急，可张闻天同志很耐心地听完了我的话。后来，听说他向上面建议后不久，总部调来了从山东挺进东北的海军二支队。我从简岛回来的第二天，也参加了剿匪。通过这件事，我感到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心情舒畅。他待人可亲。每次汇报工作他总要留我同他一起用餐，有时同住一栋房子。他谈工作认真严肃，可对同志的生活很关心，想的很细。他关心我的婚事，常劝我说：你爱人是北京协和医院的高才生，自愿放弃舒适生活到抗日前线救死扶伤，后来英勇牺牲，值得怀念。可你30多岁了，不能老当单身汉，该找个对象了。要找个老实忠厚的，不一定非要找大学生不可，文化程度可以提高。他讲得很实在，使我很受启发。我对他说，消灭土匪再成家。我和张闻天同志在一起工作感到很温暖，心情舒畅。虽然时间不长，可感情很深，他的一举一动和他的高尚品质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值得我永远学习和敬佩的。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 在潮汕等地的革命活动

蔡 超 刘纪铭 陈汉初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国民革命有了新的生机。但广东根据地还是不统一、不巩固的。国民政府的势力所及只有广州市及其附近地区，而且外受帝国主义的威胁压迫，内受国民党右派的包围和南方军阀的挟持，不仅北方军阀企图消灭广东革命势力，更有粤系军阀陈炯明盘踞东江（包括惠阳、汕头、梅县地区）、邓本殷肆虐南路（包括湛江、海南地区），时刻图谋推翻广州革命政府。广东是第一次国共合作进行国民革命的唯一根据地，是把革命推向全国的中枢。它的统一和巩固，关系到国共两党共同的反帝反封建革命事业——国民革命的成败。中共中央把统一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作为当时的首要任务。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实际参与统一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主要代表之一。1924年9月初，周恩来奉中共中央调派从法国回到广州，随后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1925年1月出发东征前改任常委、军事部长）。11月，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参与建设革命军。1925年2月，他以黄埔校军政治部主任、10月以国民革命军东征军总指挥部总

政治部主任身份，参与领导两次东征到潮汕（5、6月间回师广州平定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叛乱）。11月，在汕头担任东江各属行政委员。1926年3月中旬回到广东区委工作后，仍继续关心着潮汕人民的革命斗争。这段时间，周恩来主要在潮汕进行革命活动，为统一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奠定北伐基础，做出了特殊的重大贡献。

一、参与领导两次东征

两次东征是在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下，为肃清陈炯明军阀势力，统一和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而进行的革命战争。没有两次东征的胜利，就没有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巩固，也就没有后来北伐战争的胜利。

两次东征中，周恩来在黄埔校军党代表廖仲恺、国民革命军东征军党代表汪精卫都没有随军出发的情况下，周恩来作为政治部主任，是东征军政治工作实际的最高负责人。他坚决支持国民党左派，积极推动东征；运筹帷幄，亲临前线，参与作战决策和指挥；充分发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骨干作用和模范作用，使之成为东征战斗中的中流砥柱；特别是他创造的政治工作，建设了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并使东征的目的意义为广大军民所了解，赢得了军心民心，从根本上保证了统一广东战争的胜利。

推 动 东 征

东征前，广东革命政府常常在右派势力的裹胁和滇、

桂军阀等的挟持下，被迫向帝国主义和反革命派退让。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等给予国民党左派以坚决有力的支持，促成东征。

早在英帝国主义支持的商团叛乱事件中，陈炯明就与商团勾结，准备进袭虎门，“会师广州”。当时，中共广东区委就曾向国民党提出革命军事计划：第一步，解散反动商团；第二步，讨伐陈炯明；第三步，北伐。孙中山和廖仲恺等人接受了这个意见。

1924年10月10日，中共广东区委在广州召开警告反动商团示威运动大会。会上，周恩来以“民族解放协会”代表名义发表演讲，揭露陈炯明和商团等反革命派勾结英帝国主义危害广东革命政府的罪行，并指出：“我们有工人可以武装，有农民可以自卫，有兵士可以作先驱，有学生可以作宣传，有商人可以作后盾，我们的实力便在此处。”号召工农兵学商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南北军阀，打倒一切反革命派。当时驻广州的中共中央委员谭平山也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要打倒陈炯明》的演讲。这极大地增强了国民党左派的革命勇气。随后，周恩来、谭平山等参加了孙中山指定的革命委员会，镇压了商团叛乱，使广东革命政权初步得到稳定。

紧接着，周恩来于10月30日发表了《最近二月广州政象之概观》。指出：广东政府是在右派的包围和受南方军阀的挟持，“政府号令不得他们同意，虽令亦不能行。反之，他们的主张虽违政府号令，政府亦必须屈从。”而且“英帝国主义决不会停止援助陈炯明等反革命势力推翻中

山政府的阴谋。”强调指出：“国民党右派是永不革命的”，“革命的只有左派，只有工农学生群众”。庄严告诫中派分子必须打破妥协心理，断然离开不革命的右派，听中山指挥与革命的左派联成一气，实行国民革命。警醒国民党左派：“当前急务是肃清内部”。

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13日从广州启程北上。

11月15日，陈炯明与林虎、洪兆麟等在汕头召开军事会议，自任“救粤军总司令”，再次策划进犯广州，推翻革命政府。而此时，在广东的右派却“乘着中山北上无人监督的机会，群起攘夺广东的权利地位”，久困在广东的各军阀，“群思向外谋更大的发展”。

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以“伍豪”的笔名在《向导》上发表了《中山北上后之广东》一文，一面揭露右派和各军阀猎官谋私的黑幕，一面指出“陈炯明与林虎在另一方面已商定各向其目的地——广州与江西进发”的危险局势。并预见到：广东政府下的各武人有可能联合攻陈，但却时时隐藏着破裂的朕兆。敦促国民党左派认清右派和军阀的面目，实行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

周恩来的战斗檄文在人民群众和国民党革命左派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表明中国共产党人把挽救广东政府的危亡，巩固革命根据地，实行国民革命，作为自己的事业。

在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等的推动下，1925年1月15日，革命政府决定将所辖的粤、滇、桂、湘、鄂等军组成东征

联军，发布东征命令，讨伐陈炯明。30日，决定分左、中、右三路进兵。周恩来同蒋介石及苏联顾问加伦将军等率黄埔校军3000多人，参加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的右路军东征潮汕。由于左路的滇军杨希闵、中路的桂军刘震寰暗中与林虎勾结，进至惠州附近即按兵不动，第一次东征克复潮梅的只有右路军。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黄埔校军和以叶剑英为参谋长的粤军第二师（师长张明达）是两支主力部队，尤以黄埔校军是这次东征军队的中坚力量。到3月下旬，即把陈炯明势力逐出潮梅，取得了第一次东征的胜利。

领导政治部工作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但是革命尚未成功。原因之一，就是手中没有一支革命的、为人民所用的军队。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决心建设一支革命军，实现国民革命。

经过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克服重重困难，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开学。

1924年11月，中共中央应孙中山和廖仲恺之请，选派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此后，在两次东征，直到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前，一直主持革命军政治工作。他效法苏联红军，参照列宁的建军原则，结合实际，创造了革命的政治工作，以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建设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支新型的革命军，从根本上保证了统一广东战争的胜利，并对尔后北伐的胜利

进军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也为我党直接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1. 健全、充实政治部工作机构，建立政治工作制度。黄埔军校原来的政治部形同虚设。初以戴季陶为主任，他因反对国共合作，接事不久即离职，没有做什么工作。几个月后由邵元冲继任，搞了一、两个月，“工作与前无异”。周恩来接任后，才真正把政治部组建起来，政治工作得到全面展开。他首先从第一期学生中抽调杨其纲、洪剑雄、王逸常等一批共产党员到政治部工作，设立了指导、编纂、秘书三股，把机构健全充实起来。在研究政治工作计划时，周恩来指出：过去军校的政治部是个空架子，也没有多少真正进步的政治工作可言，校长办公室门前挂的是“登高望远海，立马定中原”的对联，学生手中留传的是曾（国藩）左（宗棠）治军语录，这怎能训练出革命的军事干部呢？“要改变这种情况，真正推行列宁创造红军的经验”，必须建立正常的工作秩序和制度。

随后，周恩来按照孙中山建设革命军队的宗旨，制定了工作细则。规定政治部对全校官生、士兵、工人负责政治训练和指导；对外负责对民众的宣传组织及政治指导；并对政治工作的内容、方法、权责分工、检查、指导等作出具体规定，尤其要求政治部工作人员要成为“革命军人与党员之模范”。这样，政治工作就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后来，又推广到校军和国民革命军中去。

2. 实施革命化的政治教育。为了使革命军真正成为自觉的反帝反封建战士，周恩来亲自制订政治训练计划，以

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为最主要内容,要求官长、学生“努力研究主义,在党的指挥之下”,做“革命的先锋”。在课程安排上,三民主义、国民革命概论、社会发展史、帝国主义侵略史、社会主义运动、苏联研究、工农群众运动等,都是必修课。马列主义、共产党的书刊,学生均可自由阅读;同时,也很重视革命纪律和军民关系教育。正如周恩来所说:这种政治教育,就是“告以中国如何受到列强压迫、军阀压迫以及农工商各界的痛苦,告以解除压迫痛苦之途径。”使之了解革命军打仗“是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是为人民而打的”。中国共产党还派了聂荣臻、恽代英、肖楚女、熊雄等一批共产党人担任政治教官,同周恩来一起建设革命军。

除授课外,周恩来根据军情紧逼,训练时间缩短的实际情况,很重视组织好政治讨论会,指导政治部编纂各种辅助教材和通俗读物,出版《士兵之友》、《中国军人》等刊物及画报、壁报,建立书报室和“血花剧社”等,加强了政治教育的效果。官生革命觉悟迅速提高,成为作战中的巨大精神力量。

周恩来享有很高的威望,受到广大官生、士兵的爱戴。他经常亲自讲课、做报告,分析形势,讲革命军人责任,结合实际,深入浅出,生动易懂,听众无不聚精会神听讲,“就象有一种不可思议的魅力吸引着人们”。他被称为“最好的教官”。很多官生都说:“军校教育我们成为军人,周主任教育我们成为革命军人。”

3.实行党代表制。孙中山黄埔建军时,参照苏联红军

制度，实行党代表制，使军队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规定党代表同军事长官具有同等权力，一切命令法规必须党代表副署始生效，并对军事长官负有“监督节制之责”。当时，党代表的实际工作，是由周恩来主持实施的。蒋介石和右派军官很害怕这个制度，周恩来则非常重视这个制度的贯彻实施。

周恩来到军校时，正是教导团成立的时候，需要设置党代表。政治部有权委派连级党代表和推荐团、营党代表。周恩来对此很重视，积极选派共产党员担任。11月上旬，他在黄埔军校亲自主持开办政治训练班，挑选30人参加，使他们明确党代表的职责、任务和工作方法。当时担任教导团党代表的有2/3以上是共产党员，连党代表几乎全部都是。1925年7月成立国民革命军时，经过周恩来积极建议和选派，第一军3个师的党代表有两个是共产党员，在9个团中则占了7个，营连以下更多。使政治工作充分发挥作用，保证了共产党对军队的政治领导。

周恩来当时作为中共广东区委和军委的主要负责人，直接领导军校和军队中的中共党组织。在军校官生和第一军官佐中，共产党员约占2/10，在连、排长下级军官中占半数。此外，还有不少共青团员。周恩来十分注意加强党、团员教育，经常给他们作报告，组织过好小组生活，要求他们认真执行国共合作政策，认清自己在国民革命中的使命，在各方面发挥模范和骨干作用。这是东征过程战无不胜的又一决定因素。此间，周恩来还指导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火星社”和“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对团结各

军进步青年军人，实行国民革命，反对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维护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发挥了重要作用。

4.开展强有力的战时政治宣传工作。周恩来不仅十分重视军队政治工作，尤其注意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伟大作用。认为要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必须军民通力合作。战时政治宣传工作是他在中国建军史上的创举，对于激励革命军士气，瓦解敌军，实现军民合作，取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援，保证战争的胜利，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东征军出发前，周恩来亲自作动员，使军队明确东征的目的意义和职责使命。同时，政治部印制了大批《告东征军将士书》、《告东江各界人民书》、《安民布告》等文件，散发孙中山、廖仲恺画像、革命军照片、各种革命传单、标语、小画报等宣传品。组织了强大的宣传队，对革命军、民众以及敌军开展宣传工作。第一次东征时的宣传队是由军校抽调24名东江籍同志及在广州农讲所抽调20多位学员组成的；第二次东征时建立的宣传总队（原163人属第一纵队，后扩大至三个纵队共237人，分三个支队）直属总政治部领导。据当时第一支队的统计，共召开军民联欢大会61次，对民众演讲878次，对友军演讲61次，散发了大批宣传品；对敌军则散发传单和对俘虏作宣传，收到良好效果。

为了动员民众支援东征，周恩来每到一地，都利用各种机会（如座谈会、军民联欢会、迎军大会、追悼东征阵亡将士大会等）向民众宣传。两度东征，周恩来在广州、

石龙、东莞、博罗、惠州、海丰、揭阳、河婆、棉湖、潮州、汕头、五华、兴宁、梅县等地，都曾多次发表演说，催人奋起。东征军所到之处，都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援。东江工农群众自愿为东征军作先锋，作向导，供给情报，担任运输，送水送饭，救护伤员及配合打击陈炯明军队等。这是东征迅速取得胜利的重要原因。连蒋介石也说：“得以克复潮汕，乃非战功，实得各界各同志相助之力为多。”

5. 制定并严格执行革命军纪律。周恩来认为，自觉遵守革命党的纪律，“这是革命最重要的一个原素”。除军校的纪律教育外，他在第一次东征时就为东征军规定了“不拉伕、不筹饷、不用军用票、不强占民房、公平买卖”等纪律；在军队胸章背面也印着“爱国家、爱人民、不贪财、不怕死”的口号；又特编《爱民歌》，有：“行军先要爱百姓”，“莫踏禾苗坏田产，莫打民家鸭和鸡”，“军士与民如一家，千万不可欺侮他”等句子，生动地体现了周恩来建立热爱人民、纪律严明的革命军队的思想。

官兵们树立了守纪律、爱百姓的思想，因而军行所至，秋毫无犯，深得人民拥护。

6. 关心伤病员和抚恤阵亡将士。周恩来把做好这件工作作为激励士气的一项重大措施。

在两次东征中，周恩来领导“抚恤东征阵亡将士委员会”工作，负责调查各阵亡将士及其埋葬地点和家属情况，给予抚恤。及时组织召开“追悼东征阵亡将士大会”，使烈士的革命精神化为革命军英勇奋战的动力。

周恩来严格要求政治部工作人员，做党员和革命军人的模范。他自己正是这样的楷模。不仅不避艰险，奋战于枪林弹雨中，从战场上下下来后仍孜孜不倦工作深夜还不休息。1925年9月，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后，在广州文德东路文德楼住在一间十来平方米房间里，陈设十分简朴。这同当时国民党官员们的奢华形成鲜明对照。他平易近人，十分和蔼可亲，大家都愿意接近他。由于他处处以身作则，因而赢得了全军上下的崇敬。这也是政治工作得以产生巨大效力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评价这一时期的军事工作时指出：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靠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取得了战胜陈炯明的胜利。于是才有北伐之役。这是对周恩来领导政治部工作的最好评价。

参与领导东征

第一次东征的战幕于1925年2月3日揭开。10日，东征联军控制了广九路全线。陈炯明部退守龙岗、淡水之间，共约2万余人。这一带地势险要，过去粤、湘、滇等军与陈炯明作战，曾在此丧师而回。这次，右路军快速突进，于13日打下龙岗，进至淡水城郊。守城敌军为马雄韬旅等部约4000人。淡水城地势险要，且有坚固的防御工事。

当时黄埔校军中的多数人都还是初次参战，但士气很高。大家都跃跃欲试。为了确保战斗的胜利，战前，周恩

来要求各级党代表加强政治工作，激励士气，身先士卒，奋勇作战。特别要求共产党员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拂晓前发起攻城战斗，周恩来亲临前线，鼓舞士气，指挥作战。攻城部队按计划分工，粤军第二师攻城之西北，叶剑英率部勇猛攻城，许济旅攻城之东北，教导团攻城之东南。当冲锋号角吹响，党代表、共产党员带头，冒着枪林弹雨，冲向城脚，架梯爬城。营党代表蔡光举被打穿肚子，壮烈牺牲，队员们前仆后继，无所畏惧。共产党员、排长江世麟、刁步云等在登城战斗中英勇牺牲。他们的模范行动，振奋着全军士气。在各攻城部队协同猛攻下，在15日上午8时即攻下淡水城。此役击毙敌旅长，俘虏千余人，缴枪2000多支。

当天下午4时，洪兆麟率同李云复部数千人赶来增援，企图反攻。东征军退出城外击退敌人。

首战淡水，黄埔校军英勇顽强，打破了陈炯明的作战部署，为第一次东征的胜利进军奠定了基础。苏联顾问罗加觉夫将军曾称誉“可与苏联红军媲美”。此役初试锋芒，打出了军威，显示了政治工作的巨大威力，树立起共产党和政治部的威望。

淡水之役后，右路军于20日在羊塘围歼灭了洪兆麟的主力部队。26日，陈炯明从汕尾逃往香港。右路军在沿途百姓支援下，势如破竹，于3月7日克复潮汕。

时林虎倾其精锐刘志陆、王定华、黄任寰等部1万多人，从兴宁、五华分两路抄袭革命军后路，企图消灭革命军于揭阳、普宁之间。

3月5日、6日，周恩来率政治部工作人员先后进驻棉湖镇和揭阳县城，立即抓紧开展政治宣传工作，亲自召开座谈会，接见学生群众和各界代表，发表演讲，宣传国民革命和东征的目的意义，号召民众参加革命，支援东征，产生了很大影响。新成立的揭阳县政府亦配合组织民众运输粮弹，选派向导，协助战勤。

3月12日，敌军右路前队抵鲤湖，左路前队抵红湖（距棉湖五华里）。3月13日晨，东征军许济部进至塔头攻敌左侧，教导二团攻鲤湖之敌，教导一团攻击正面和顺之敌。

是日上午8时，教导一团（约1200人）与敌王定华、黄任寰部约8000余人展开了空前的激战。周恩来、蒋介石、加伦将军以及刚从广州到前线慰问东征将士的廖仲恺，都亲自在前线督战。战况惨烈。一团官兵在革命精神的激励下奋勇作战，敌死伤枕籍，一团伤亡也很严重。仅第一梯队便有48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牺牲。全团9个步兵连长，阵亡6人，受伤3人，其中亦多为共产党员。

周恩来在敌人倾泻的弹雨下，镇定自若，与指挥部同僚商议破敌之策，在火线上指挥作战，激励士气。一团官兵一直坚守着阵地。下午2时许，许济旅和教导二团先后赶来参加战斗。至下午4时左右，终于把绝对优势的敌人打垮了，取得了第一次东征的决定性胜利。

棉湖战役，教导一团以千余之众独挡7倍于己的精锐之敌。当时加伦将军曾盛赞说：“棉湖一战的成绩，不独在中国所少见，即世界上亦是少有的”。“有这样好的军

队，中国革命可以成功”。各方人士都说：“周恩来领导的政治工作，确实是做得很出色的。”

棉湖战役后，右路军于18日晚占五华，20日攻下兴宁，23日克复梅县。陈炯明残部逃往闽、赣边。至此，第一次东征取得了胜利。

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虽参加东征联军，但早已心怀叛志。当右路军进军之际，杨、刘按兵不动，密约林虎袭击革命军后路。之后又勾结北洋军阀，在英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企图夺取广东全省政权。

面对杨、刘叛乱的严重局势，中共中央决定：“中央委员谭平山同志，并指定技术委员周恩来、罗觉同志，会同粤区书记及鲍同志5人，组成临时委员会，指导广东一切实际工作。”临委经研究，决定采取全面秘密部署，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迅速歼敌。具体分工由周恩来负责发动黄埔校军和联络友军，谭平山负责团结和发动国民党左派力量，杨殷、刘尔崧等负责发动铁路、邮电工人，切断叛军交通、电讯，以配合各军的军事行动。

5月21日，右路军奉广州革命政府之命，由潮梅回师广州，平定杨、刘叛乱。

6月2日，周恩来在回师广州途中，作了《军队中政治工作》的报告，精辟地论述了军队的性质。指出：“军队不是阶级，是一种工具”。“压迫者拿这个工具去压迫人……但被压迫阶级也可利用这个工具去反抗他们的压迫者，推翻压迫者的势力。”报告特别针对帝国主义收买军阀压迫中国人民的实际，强调组织革命军队的重大意义，

明确指出：革命军是解放被压迫者的武力，“是实现我们的理论的先锋”。阐明了革命军同军阀军队的本质区别。这实际上是对革命军平定杨、刘叛乱的有力动员。

6月4日，为加强讨伐杨、刘的宣传工作，在周恩来主持下，政治部以伤病出院的黄埔学生30多人组成宣传队，委派共产党员李之龙当队长，并亲自指挥这个宣传队。6月10日，又将滇、桂军中起义归来的学生组成“特别武装宣传队”，专任对滇、桂军的宣传工作，委李之龙兼任队长，率队赴省河一带宣传，瓦解敌军。在此期间，周恩来还通过“青年军人联合会”在滇、桂军中开展工作，使桂军军官学校的全体干部、学员起义，加入了黄埔军校。这些积极措施，对于瓦解杨、刘叛军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加以粤汉、广九、广三的铁路工人和邮电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起来罢工，使杨、刘无法集结军队。6月12日，回师部队与杨、刘叛军在广州近郊的白云山、瘦狗岭、广九路一带激战。周恩来参与领导战斗，鼓舞革命军勇猛杀敌。经过20多小时战斗，全歼叛军。广东革命政府转危为安。

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所属各军统一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周恩来被委为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一师党代表（后为第一军副党代表）。

东征军回师过程中，许崇智和蒋介石同陈炯明旧部妥协，以允许林虎、洪兆麟“投诚”为名，把潮梅交还林、洪管辖。但林、洪所部仍奉陈炯明为总司令，毫无归附国民政府之意。而且在潮梅派款勒捐，横征暴敛，摧残压迫工会农会组织。9月15日，陈炯明在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

支持下，委刘志陆为总指挥，纠集 3 万余人，以“讨赤”为名，出兵东江，企图进犯广州。

9 月 27 日，国民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委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周恩来为总指挥部总政治部主任。于 10 月 5 日出师，分左、中、右三路纵队进军。周恩来、蒋介石、加伦将军等随中路第一纵队行动，领导全局。

第二次东征的关键战役，是攻下素称“南中国第一天险”的惠州城。惠州后枕东江，前临西湖，三面环水，城高而坚。惠州县志称：“铁链锁孤身，飞鹅水上浮，任凭天下乱，此地永无忧”。时惠州守敌为陈炯明第六军军长杨坤如部，约 4000 人。并筑有各种复杂的防御工事，企图凭险顽抗，固守待援。

10 月 12 日，第一军占领惠州城郊飞鹅岭后，四面包围惠州城。13 日上午开始攻城。由于蒋介石采取冒险强攻的战术，至下午 5 时，连续五次强攻都未能奏效，部队伤亡惨重。第四团团团长刘尧辰、副营长谭鹿鸣（共产党员）等均在攻城战中阵亡。不得不暂停攻城。

这时，蒋介石情绪沮丧，认为一开始就损伤过大，太不合算，主张放弃进攻惠州，改道前进。参谋长胡谦也说：“历史上从来没有以肉击石的”，力主放弃攻打惠州的作战计划。为此，指挥部展开了争论。周恩来坚决反对这种意见，认为攻下惠州是这次东征胜利进军的关键，对整个战局影响甚大。大多数人都赞同周恩来的见解。接着，周恩来又亲到飞鹅岭阵地观察地形，然后同苏联顾问及各位指挥官一起分析攻城受挫原因，提出了新的攻城方案。他

说：“瓮中捉鳖，鳖会咬手，在瓮的三面打击，留一面让鳖爬出来，捉鳖较容易。”就是说，围城部队只打三面，让出一条路给敌人逃出，然后聚而歼之。打法是：用教练机（当时广州只有教练机）携带手榴弹指示目标，炮击杨坤如的指挥部和机枪阵地。以减少进攻部队的牺牲，且较有把握取胜。指挥部经过讨论，采纳了这个新方案。

10月14日午后2时，再次发起总攻。周恩来亲自在前线指挥，重点攻击北门，集中火力摧毁城垣工事。攻城部队即按计划攻击前进。但是敌人侧防机枪火力极为隐蔽，爬城部队仍难于接近城墙。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发动共产党员组织敢死队。团党代表蒋先云、张际春、傅维钰、王逸常等，分别在所属各部组织、发动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带头参加。蒋先云亲自带领敢死队，冒着弹雨，强行架梯登城，他指挥战士与敌人展开肉搏，自己身上多处被刺，流血不止，仍坚持战斗，奋勇当先。攻城部队缘梯登城，蜂拥以赴。惠州战斗，敌人虽然没有象原来预料的那样从城内逃出，但由于攻城部队的勇敢和战术运用得当，天险惠州终于被攻破了，为第二次东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当年第一军的苏联顾问切列潘诺夫，在《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书中写道：“惠州要塞实际上是共产党人拿下来的，他们的意志比攻不破的城墙还要坚硬。”

惠州下后，周恩来、何应钦率部乘胜东进，26日进占揭阳县河婆镇（今属揭西县）。

此时，刘志陆、林虎的主力近万人集中于华阳（属五华）。10月27日，东征军第三师师长谭曙卿未探听虚实，贸

然命令所部向华阳前进，致陷入优势敌军包围的危境中。

10月28日，何应钦、周恩来，得到第三师在华阳失利情况的报告，决定驰援华阳被围的第三师。

林虎等因华阳偶胜，转而以全力分三路夹击河婆的东征军。东征军就在河婆、华阳之间，与林虎部展开了激战。

是役，林虎、刘志陆所部主力七八千人被消灭。同日，洪兆麟率李云复、谢文炳部向河婆袭击，亦被东征军第一团击溃。至此，中路之敌即已解决。

11月4日，周恩来率政治部工作人员抵汕头，受到汕头人民的热烈欢迎。码头欢迎者数万人，沿途巷路为之塞。

与此同时，第二、三纵队也胜利地实现了作战部署，消灭了各路敌军。被陈炯明军阀盘踞的东江，从此遂告平定，为时仅1个月。

在平定东江后不久，南路军阀邓本殷亦被国民政府讨平。多年来四分五裂、纷乱扰攘的广东，获得了完全的统一，国民革命的根据地得到了巩固。

二、致力发展中国共产党

中共中央召开的“四大”及“四大”前后的两次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都强调了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为了斗争的需要，“要健全党的组织，积极发展党员，提高党员素质”。周恩来在执行这一决定的过程中，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抓紧发展党、团组织

在这个期间里，中共党组织基本是处于秘密状态，共青团组织则是半公开的。周恩来既抓党、团的组织建设，同时又抓紧国民党的改造和发展国民党左派的工作，可以说是三管齐下。

早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时，周恩来就积极地在左右派的激烈斗争中，发展中共党、团的组织。黄埔军校到1924年底，有党、团员五六十人，到1925年1月，有党员43人。周恩来到校后，直接领导中共黄埔军校特别支部，在其他同志的积极配合下，通过共产党员公开和秘密的活动（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以国民党员的名义公开活动，以及组织党的外围组织“火星社”和公开组织“青年军人联合会”，并通过这两个组织的活动），大力发展了党、团组织。到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黄埔军校公开的中共党员已发展到320人（秘密党员尚不在内）。他和全体共产党员，遵守军校的规章制度，以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远见和模范行为给军校以影响，对军校的创立和发展，作了特殊的贡献。

两次东征中，1925年2月27日夜间，东征军攻占海丰县城。周恩来进入驻地后，即与彭湃、谭平山作出留彭湃在海丰县迅速建立中共海丰特别支部、迅速恢复共青团等群众组织等六项决定，并把东征军中的共产党员吴振民、李劳工等多人，留在海丰协助彭湃开展工作。当海丰团支部恢复时，周恩来亲临指导，并推荐彭元岳为海丰团支部

书记。不久，团员发展到30人。第二次东征到海丰时，又把海丰的党组织改为海丰地委。在周恩来、彭湃等人的部署和推动下，海丰、陆丰的各项工作都打下了扎扎实实的基础，为后来进行三次武装起义、建立全国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打下了基础。

1925年10月14日，东征军攻占惠州后，周恩来率政治部人员在惠州府督办西华厅住了3天，进行了大量的群众工作。出发前他找政治部搞宣传工作的肖隽英（肖鹏魂）布置任务说：惠州是战略要地，需要发展我们党的组织和开展工农群众运动。你是客家人语言能与当地群众相通，留下你在这里开展工作较合适，以后广东区委将会派人与你联系和指导工作。10月下旬，全国总工会和中央农民部派阮啸仙和陈国钧果然前来惠州指导，肖隽英也由团转党，负责发展党、团组织，建立工会、农会、新学生社等方面的任务。到1926年3月，惠州已发展了党员40多人，团员五六十人。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惠阳县委，肖隽英任书记。同年7月，又建立了广东区委惠州地委，朱祺为特派员，肖隽英为书记。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惠州地区的革命工作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

在梅县地区：第一次东征时，周恩来随军在五华、兴宁和梅县等3个县留驻了1个多月。他指示古大存，从改组五华国民党县党部入手，然后发展党、团组织。在这段工作基础上，1925年11月，建立了中共五华县支部，党员20人，宋青为书记，古大存负责军事。1925年4月20日，周恩来率政治部人员乘船从兴宁前往梅县。在梅期间，他

“每天都与政工人员深入学生群众中去宣传三大政策和国内外形势”。随同他前往开展工作的有东征军中的共产党员洪剑雄、金佛庄、李之龙、麻直、罗振声、黄锦辉等多人。他们特别注意在青年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不久，组织和发展的新学生社，成立了梅县共青团支部，播下了革命的种子。梅县的进步学生纷纷成立“东山中学学生救国团”、“梅州师范革新社”、“广益中学反宗教同志会”，以后又联合组成“革命青年团”。共青团支部、新学生社以及革命青年团的成员，成为后来梅县地区创建和发展党、团组织的基础力量。第二次东征后，于1926年春创建了中共梅县支部。1个月后，党员便发展到80多人，各区、镇都建立了党、团组织。梅县支部还派出古柏、蓝胜青、肖向荣往兴宁县做发展党、团组织的工作。到1927年5月20日，梅县地区的共青团员已发展到800多人，分布在梅县、兴宁、五华、平远、蕉岭等县。

在潮汕地区：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后，就有潮州的“青年图书社”，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和进步的思想文化。1921年和1922年，先后建立潮州和汕头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后来由于陈炯明军阀势力的统治和摧残，潮汕党、团的组织发展不起来，少数党、团员只能处在秘密状态下分散活动。1925年3月，东征军进占揭阳县城后，他就在揭阳的学宫召集了有秘密党员和共青团员等骨干参加的座谈会，强调指出：不久就要筹建国民党县党部，你们要发展大学（即共产党员）和小学（即共青团员），特别要在工人、农民中发展。并动员成熟的加入国民党，左右

革命力量。要争取先机，不然，右派势力大了就不好办。周恩来在揭阳驻留一个星期，积极开展群众工作，造成了大好形势。在这个基础上，经当地同志的努力，共青团揭阳县支部就在1925年5月初成立起来。同年11月，第二次东征后，也是在周恩来的指导下，建立了中共揭阳县支部。到1926年春，揭阳县的党员已发展到100多人了。

1925年5月21日，东征军返穗平刘、杨之乱，周恩来特意把军中的共产党员鲁易留下，配合地方党组织，在陈炯明军阀势力重扰潮汕时，能继续通过各种形式，坚持斗争。到7月初，团员已发展到32人。8月13日正式成立共青团汕头地委，下辖3个支部，团员共39人。

1925年11月4日，周恩来在第二次东征中率政治部人员到达汕头市，立即把成立中共汕头地方的核心组织，加强党的领导，当作首要任务来抓。随即打电报给中共广东区委，建议加快组织建设的步伐，并指名要求调赖先声（即赖玉润）来汕开展潮梅党的领导工作。不久，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派赖先声、蓝裕业、丁愿、郭瘦真、杨石魂（已在汕头）等五人，在汕头组成中共潮梅特别委员会（后改称汕头地委），指定赖先声为书记，马上开展工作。在中共潮梅特委和后来的汕头地委领导下，潮汕各县、潮梅海陆丰各县，都先后在1925年冬和1926年春，建立了党的组织，大力发展党员，积极开展各项革命活动，为后来革命形势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汕头市没有成立中共汕头市委，而由汕头地委直接领导，建立了海员、铁路、建筑等18个党支部，到1926年10月，全市有组织的

工会会员达3万余人。

毗邻汕头市的澄海县，在第一次东征时，已经有共产党员朱叟林、蔡作楷、李春蕃（即柯柏年）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杜国庠、王鼎新等人，开始开展进步活动。第二次东征后，周恩来先后派邓颖超和政治特派员、改组国民党特派员多人，同时还通过驻澄海的第三师第七团党代表蒋先云到澄海开展工作。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李春蕃，也被派回澄海，这时他以澄海中学教师的身份带领了澄海中学学生骨干20多人，专程前往海丰县参观农民运动，使学生们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回来后工作积极性更高了。所有这些，给澄海的党、团建设打下了很好的基础。1925年11月，成立了共青团澄海小组，1926年1月，成立了中共澄海县支部。同年5月，党员发展到70多人，11月发展到170多人，建立了20多个支部。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时，1927年4月15日，澄海县党、团组织，联合国民党左派，领导了全县声势浩大的武装暴动，坚持了两个多月，给反动派以沉重的打击。1927年8月，澄海县的共产党员，曾下降到80多人，但是到了同年11月，又恢复到170多人，1928年1月则增加到280多人。广大党员领导革命群众，英勇地投入土地革命战争。后来，澄海县的党组织，一直坚持到全国解放。

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党员

周恩来在潮汕等地区的建党活动中，非常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时机，不遗余力地“宣传主

义”。

周恩来到黄埔军校时，开始是在第一期学生中讲政治经济学，接着担任军校政治部主任，在军校中广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由他主持的军校政治训练时，他在“政治教育各科内容提要”中，关于第九科“社会主义”就这样提示：一定要研究欧洲自原始共产主义……进化到“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应当站在革命的观点上去分析社会主义进化的原因和结果。并且分析各派社会主义的利害得失。此外，政治部鼓励学生购买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作为课余读物，以增长见识，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政治部还经常聘请著名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来校当教员或作报告。黄埔军校的“火星社”和“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宣传教育活动，对党、团的理论学习和青年军人革命人生观的形成，也起到良好的作用。上述这些有力的措施，大大提高了黄埔军校中党、团员的政治素质，使之成为军校学生中的佼佼者，从而在整个军校人员结构上占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周恩来在潮汕等地区，同样是利用一切阵地和机会，“注意于宣传主义”。

1925年3月8日，在揭阳县城时，他主持制订的《军队经过地方政治工作方案》中，就把“在汕头办党报”，列为一项重要内容。只是由于回师广州平刘、杨之乱，办报计划才暂时搁置起来。第二次东征，周恩来到达汕头市后，主持东江各属行政公署工作，在百废待兴，头绪纷繁之中，仍念念不忘办报一事。他派李春涛，张亦文两人，

在《平报》的原址上创办了《岭东民国日报》。李春涛是彭湃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同学，两人共同创建了《赤心社》，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1921年李春涛回国后，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极力支持和热情讴歌彭湃领导的海丰农民运动。

周恩来十分重视解决《岭东民国日报》在创办中的困难，他以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和东江各属行政委员的名义，一次拨足开办经费1万大洋和固定按期拨给月费3千大洋。同时，还从各方面抽调一批得力人员，充实到报社中来。从而，保证了该报于1926年1月20日顺利问世。周恩来特别注意这家报纸的政治方向。办报伊始，就同李春涛详细研究了这个问题。在周恩来的关怀下，李春涛团结全体工作人员，努力经营，把《岭东民国日报》办成了大革命时期蜚声海内外的很有代表性的进步报纸。特别是她的《革命》副刊，每周一次固定登载宣传共产主义的文章，如：全文发表了马克思的《一八四八年六月巴黎无产阶级的失败》，介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目达34种之多，连续报导纪念列宁逝世的消息，同时连载了李春蕃的译作——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家报纸还以生动的笔调，大量发表从事工农运动的经验。和反帝反封建的形势和动态，有力地推动了当时岭东地区的国民革命运动。

针对东江各地党、团组织新建立的情况，周恩来指示开办了各种训练班，抓紧对党、团员进行政治教育以提高党、团员的素质。第一次东征到达海丰县后，他和澎湃、谭平山研究决定4月20日在海丰，由有实践经验的彭湃

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抽调一批党、团员参加学习。第二次东征后的1926年1月，中共潮梅特委按照他的指示，在汕头市罢工委员会址开办了“特别训练班”，“训练‘两校’和比较进步的同学”30人（其中党员10人，团员20人），主要内容是党的基本知识、当前的政治形势和总的任务，党在现时的方针政策和策略原则等。周恩来亲自为这个训练班讲了《世界大势》这一课。周恩来回到中共广东区委工作以后，仍然十分关心东江地区的大局，他和陈延年商量后，于1926年7月，派罗明到汕头举办“东江农工运动人员宣传员养成所”。这个养成所由汕头地委主持，来自各地的学员近两百人，不少是党、团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学习时间一个月，开设了9个专题，其中第4专题是社会发史，第5专题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与《农民运动》（由彭湃、林甦主讲），第6专题是《工人运动》（由杨石魂、陈振韬主讲），第7专题是《国共合作和共产党的建设》（由汕头地委书记赖先声主讲），第8专题是《共青团组织和宣传工作》（由团地委书记伍治之和党员黄连渊主讲）。通过这个养成所的学习，凡是表现好的，都被吸收为中共党员，这个养成所不仅对提高党、团员素质取得很好的效果，同时继续促进了东江的革命运动。

汕头市的震东中学，是一所革命学校，校长马庆川是国民党左派。有许多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在这里工作或学习。1927年1月，这所学校成立了“震东中学社会科学院”，在它的第7门《社会主义》课程中，有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史、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资本论》入门、列宁主义、新经济政策等内容。彭湃、杨石魂、杜国庠、廖伯鸿、李春蕃等党内外知名进步人士都分头在这里任教，李春蕃在《岭东民国日报》发表的译作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就是在这里工作的成果。这所学校的教育训练，大大有利于提高党、团员的思想理论水平，培养了许多革命骨干，彭湃的夫人许玉馨烈士就曾在这里得到学习和提高。但是，这座革命学校如果没有周恩来的直接关怀，是办不下去的。因为当时广东是全国革命的根据地，要从各方面支援各地的斗争，人民的税务负担很重，行政经费很困难，东江地区的军队，曾经三个月没有钱发军饷。“东江教育方面，以前省政府总共每年只津贴4000元，这儿多年连一笔津贴都领不到了”。震东中学也由于经费困难到了极点。报告汕头市政厅后，又迟迟不给解决，在面临停办的情况下，该校负责人马庆川向周恩来写了报告。1926年1月26日，周恩来指令汕头市政厅拨给5000元，解决了震东中学的大困难，使它能够在“宣传主义”方面继续发挥作用。

三、主持东江行政工作

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胜利后，广东革命根据地基本统一。但由于广东幅员广阔，交通不便，加以兵战连年，兵匪充斥，所以，国民政府在肃清东江之后，决定在广东设立东江、北江、南路、广州、西江、琼崖六个行政区，

分设行政公署。1925年11月21日，周恩来被广州国民政府任命为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其职权范围是：“（一）督率所属各县县长处理地方行政事宜；（二）对于所属各县县长得先行任免，再行报告于省政府。”周恩来被任命为东江行政委员后，因军事时期的行政事务，实际已由东征军总政治部负责，故他仍以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的名义，主持东江行政工作。翌年1月31日，东征军总指挥部撤消，他于2月1日正式宣誓就职。他宣布东江行政公署的施政宗旨是“如何扶助人民求得幸福”。他说：“扰乱中国的两个障碍物：一个是国际帝国主义，一个是国内武人政治。我们民众要期统一与和平，须要打破这两个障碍物”。明确提出了扫除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反动统治的奋斗目标。

在主政东江时期，周恩来日夜操劳，费尽心血，功勋卓著。

革除积弊 任人唯贤

在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陈炯明统治下的东江，洋人把持海关权、税务权、教育权，大批洋货涌入，国货日衰，军阀柄政，卖官鬻职，盛极一时，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富庶的潮汕平原，城乡破产，盗匪如毛，乞丐盈路，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面对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统治下的社会积弊和人民的痛苦，周恩来一主政东江即开始清除社会的积弊。

一是解散军阀时代贿选的旧议会，还政于民。在军阀

统治时代，军阀政府实行的是帝国主义、军阀、土豪劣绅、买办阶级和官僚政客五位一体、互相勾结的独裁统治。他们打着“民权”的招牌，贿买选票，包办议会，压迫人民。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周恩来明确指出：陈炯明统治时代的县议会，集合一般劣绅做议员，按月支薪。革命军把它取缔了，县议会解散了。因为“他们所讲之民权是假的”。那一般人都是只拿薪不做事的。党政府之下的民权，是大多数人，而不是少数劣绅的……只给反帝国主义及军阀的个人和团体的”。民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

二是查禁烟赌，为民兴利。在陈炯明统治下，惠、潮、梅处处烟馆林立，城乡赌场比比皆是，因嗜吸鸦片、赌博成性而倾家荡产者，不计其数。周恩来除发表查禁烟赌布告外，还采取禁种罂粟、稽查贩卖烟土、查封烟馆、赌馆等措施。

周恩来采取坚决而强硬禁烟措施，使盛极一时的吸毒之风有所收敛，受到进步人士和广大民众的拥护。

三是收回教育权。

帝国主义“利用枪炮兵舰做后盾，来侵略我国以取得传教权，同时兼占了教育权”，又用教育进行传教。“基督教在华教育调查团”在报告中说：“现在是巩固在华基督教之最好时机，将来使中国成为一个基督教徒的国家的，就是从此等学校出来的男女们”。因此，他们拼命在中国办学校。当时，基督教在我国办的“大中小学共计有7281所，学生人数214254人”。潮汕中学学校有10余所，

女学9所，教会学校5所。这些学校同时又是传教的机关，“强迫学生读圣经和祈祷礼拜”。要摆脱外国奴化教育，就必须收回教育权。

1925年12月1日，周恩来以总政治部主任名义，函达汕头各有关单位，请他们派人参加收回教育权委员会成立会。

12月2日下午2时，汕头市收回教育权委员会成立。周恩来主持了会议。会议根据代表的意见，规定《汕头市收回教育权委员会组织大纲》。

随后，汕头市政厅向五所教会学校发出命令：一、把学校校园和教堂隔开（当时教会学校多是教堂和学校相连）；二、学校须向官厅注册，受教育行政机关之检查；三、教会学校校产属我国的收回自办，属外国的应由中国人任校长；四、一切课程须照本国学制办理，不得教学生祈祷和读圣经等等。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汕头及东江各县的教会学校先后收回自办，树全国收回教育权之先声。

四是究办贪官污吏，为民除害。

这一斗争的帷幕，是从枪决杨占鳌的枪声中揭开的。

杨占鳌原系潮梅军司令部副长官。第一次东征军回师广州后，他留守汕头，第二次东征胜利进军时，陈炯明部队节节败退，杨占鳌乘革命军尚未抵汕之机，擅委各县县长及汕市厅长等缺。革命军入汕后，还私自委任庵埠警察区长，“得利甚多”。事经周恩来侦查确认后，将杨占鳌卖官案件，报道总指挥部批准，并于12月6日将杨占鳌押

赴汕头市华坞路执行枪决。接着，周恩来又把卖官和贪污有据的饶平县长陈无那、澄海县长林贤缙、揭阳县长曾靖圣、普宁县长方芝庭、潮阳县长孙家哲、惠来县长陈公任等扣留法办。

饶平县公安局长李次虞到黄冈催讨军饷，竟要黄冈区区长负担轿费；在查办抢劫案时，索取贴办费600元。事被告发后，李次虞也被扣留查办。

在周恩来主持下的东江政府雷厉风行，执法如山，使贪官污吏惶惶不可终日。有的（如汕头市代理市长陈箇民）畏罪潜逃，有的则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从而使社会风气有了好转。

在惩治贪官污吏的同时，周恩来大刀阔斧地调整各县署官员，大胆地把一大批思想进步、有才干的人提拔上来，安排到适当的工作岗位上。经周恩来任命的27位东江县、市长中，国民党左派占大多数，其中较著名的有揭阳县县长陈卓凡、潮安县长刘侯武、兴宁县长罗师扬、五华县长温其藩、梅县县长江董琴、陆丰县长林修雍等。

经周恩来委任的一批国民党左派县长，在刷新政风，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26年2月1日，周恩来宣布就任东江行政委员后，一改过去的陈章旧法。在新设立的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公署内组织了一个新的工作班子。东江行政公署的职员，从秘书长、委员随从书记、科长、科员到司书，共31人，机构十分精干，有利于消除政权机构的官僚作风。

为使人民“了解政府政策”，“求人民与政府真正融

洽合作”，周恩来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征求交换意见。新建立的东江各属行政公署一开始就与各阶层人民密切结合在一起，以崭新的姿态出现。

动员人民议政参政

周恩来还针对当时广东革命政府从省到县仍然推行行政长官独任制，广州革命政府中，右派、军阀、官僚仍然占相当大的势力，地方机关还残存不少旧官僚等问题，着手改革东江行政公署的政权体制：取消行政委员独任制，代以行政会议的形式，让首席行政长官与下属官员及农工商学妇女等人民团体的代表，“齐集一堂，共论革命治理”。

1926年2月6日，周恩来以行署名义致电通知东江各县（市）长、各教育局长及农工商学妇等组织各派代表一人，参加东江行政会议。此外，还有恽代英、邓颖超、刘尔崧、杨嗣震等著名共产党员，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会议。他要求大家事先认真调查、讨论，多提切实意见，让人民代表把下层人民的意见充分反映上来，直接同群众商量、讨论、决策政府大事，并以此作为人民参政的第一步，屏弃“一纸公文”发号施令的旧衙门作风。周恩来还打算从那次会议以后，“革命之普及，地方之建设，人民之福利，以及各项行政方针，均由此会议议决而执行”，一反旧政权行政长官独行专横的统治形式。这说明，周恩来的最终目的，是要把行政会议这一形式固定下来，使它不仅成为一个议事会议，而且成为一个决策机构，为人民政权

建设进行了初步的尝试。

2月22日，东江行政大会在汕头市外马路岭东商业学校开幕。周恩来主持了这次会议，与会代表124名。

大会选举了绥靖委员何应钦、东江行政委员周恩来等7人为主席团成员候选人。这7人中，除何应钦、范其务外，其余的不是共产党员，就是群众组织领袖和左派县长。会议还通过组织了“东江行政大会审查报告委员会”，分设政治、军事、党务、教育、民政、农工、商务、财政、妇女等9个股，各股主任除1名不明身份外，其余有5名是共产党员，3名是国民党左派。

2月23日，周恩来在大会上作政治报告，深刻论述当时国际、国内、广东的政治形势，指出：英、美、日、法的在中国“捣鬼”，“压迫至于极点”；“中国的买办阶级，不是中国的商家”，“有一部份的买办阶级”，“甘为帝国的走狗”。最后，周恩来再次强调：“（一）肃清奸商、买办、贪官污吏；（二）惩办贪官污吏”。

会议在六天半时间里；共有95名人民群众代表在会上报告，最大限度地听取来自各方面的意见。东江行政大会收到提案及计划书297件，报告书及调查表254件。与会代表认真讨论了交通、建设、商务、生产、治安、警政、农工教育等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的重要议题。经过审查报告委员会的归纳，整理，提交大会表决，结果通过了93件议案，其中由代表提案议决的有67件，由代表报告后议决的有26件。这些议案，充分反映了人民的意见和要求，充满着除旧布新，振兴中华，造福人民的精神。周恩来亲自主

持的东江各属行政会议十分重视人民的作用，一反数千年来历代官府鄙视人民的传统观念，把人民群众提到历史主人的地位，开拓了东江革命政治之新纪元，在中国政权建设史上写上了新的一页。东江行政大会的规模和成就，在当时是十分引人注目的。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以《东江行政会议纪略》为题，详尽地报道了这次会议的情况。

1926年3月17日，周恩来乘“卢山丸号”轮，由汕头返回广州，“报告东江行政会议之经过”，并将有关提案呈送广州国民政府，经批准后，即付诸实施。如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于5月7日发出批第三〇六号文件，批准了“东江各属行政教育议决案”，并通知国民政府教育委员会，“准如所议办理”。这样，就使有关“学校推行新教制，推行国语”、“按照学生将来职业上之需要，加授农商等课”、“学校应许学生参加社会运动之自由，及参加校务”、“实行收回教育权”等发展教育的议案合法化，对东江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

周恩来在辞去东江行政委员职务回到广州后，专门给党内同志讲了东江行政公署情况，总结了党内第一次搞政权工作的经验教训。周恩来主政东江，是我党第一次掌握政权，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四、发展工农运动

潮梅海陆丰地区的工农运动，兴起于五四运动前后，

在彭湃领导的海丰农民运动影响下，农会和工会组织都曾发展。后来遭到军阀陈炯明的镇压。周恩来两次东征到潮汕，特别是在主政东江期间，采取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推动了工农运动蓬勃发展。

推动工农运动的开展

第一次东征出发前，周恩来和陈延年就与彭湃研究，决定组织海陆丰地下农会。发动农民策应东征。组织向导、侦察、慰劳、运输队等，还组织了30多人的武装先遣队，扰乱陈炯明后方，配合东征军作战。

1925年2月27日晚，东征军进占海丰。28日，周恩来与彭湃、谭平山研究决定：留彭湃在海丰领导各项工作；立即恢复农民协会等各种群众组织；从校军中抽调吴振民为驻海丰特派员，办理党务和协助农会训练农民自卫军，并调宛旦平、陈烈等为军事教官协助训练；从海陆丰抽调一批干部到东江各县去开展工农运动。

3月2日，海丰人民召开迎军大会并宣布恢复县农民协会，各乡农民到会3万多人。周恩来在会上盛赞彭湃领导农民运动的工作及海丰人民对东征军的支援，给海丰人民以极大鼓舞。随后，海丰农军训练所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相继开办，培训了一批骨干派到新区开展工作，其中象陈振韬、陈魁亚等不少人，成为潮梅地区出色的工农运动领导人，对工农运动的开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随着第一次东征的胜利进军，工农学生运动迅速发展。“五卅”消息传来，潮梅各县、市工农商学各界纷纷集

会、示威，声援上海工人，强烈抗议帝国主义暴行。

在周恩来留下的共产党员鲁易（7月后调任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杨石魂等一批骨干的领导和推动下，“汕头各工会对外罢工委员会”成立，团结各界人民，参加了举世闻名的省港大罢工。

7月23日，罢工委员会宣布对英帝国主义经济绝交，严密封锁香港，使原来来往港汕的船只由121艘降至24艘，英轮完全停航，给英帝国主义以政治上经济上严重打击。

7月31日，周恩来出席了省港罢工工人第六次代表大会并作《政治报告》，高度赞扬了工人阶级反抗帝国主义的壮举，并对潮梅工农支援东征的重要作用予高度评价。

第二次东征胜利，周恩来于11月4日抵汕，看到工人们坚持罢工，表现很坚强，非常高兴。把封存的同济医院拨作罢工工会会址和工人纠察队宿舍，拨出几十条枪武装工人纠察队，以加强港口封锁。

1925年11月21日，周恩来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后，设署汕头。把“扶助农工”作为革命政府施政的一项根本政策，大力发展并强固工农团体，东江、潮梅的工农运动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是月底，周恩来以总政治部名义发布通令：“凡农工团体，均应一律切实保护，并得充分发展，以符本党拥护农工之原则”。

12月初，周恩来电请广东区委迅速建立起中共潮梅特委。为了加强党对工农运动的领导，又成立了工人运动委

员会和农民运动委员会。1926年1月初，广东省农民协会潮梅海陆丰办事处成立，以彭湃为主任。周恩来针对汕头市原有各行业工会组织互不统属、组织不纯的情况，委托杨石魂筹组汕头市总工会，以整顿组织，统一领导。

1926年1月4日，汕头船工郑丁、郑灶驾艇载两名日本人前往搭乘日轮。日本人搭船不付钱反将郑丁打伤，将郑灶打落海中溺毙。加上当时日本驻兵我东三省等原因，汕头各界人民非常愤慨，遂于16日集会抗议。周恩来亲自到会演说，严厉谴责日本帝国主义暴行。並派人向日本驻汕领事馆交涉，提出惩凶、赔偿损失、向汕头市民和国民政府道歉，担保在汕日侨不再有野蛮举动等五项条件。日领事竟蛮横抵赖。汕头各界便于27日宣布对日罢工，迫使日本领事馆接受五项条件，给汕头省港罢工工人和人民群众以巨大鼓舞。

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伺机破坏汕头罢工，1926年1月间，在右派工贼的挑拨下，汕头市接连发生三起工人、工警冲突事件，尤以联安工会捣毁海员工会省港罢工办事处一事影响最为恶劣。“香港政府借此以破坏罢工，日领事因之而提出警告……贪官污吏，奸商买办，威然异动，造谣中伤”。广州国民政府和省港罢委均致电周恩来查询。

周恩来为避免被敌人所乘，使工人联合一致对帝国主义斗争，一面禁止报界再作扩大风潮的报道，一面亲自召集汕头各工会代表80余人及市政厅长、警察局长、署长共百多人的会议，演说四小时，“动以联合救国大义”，使“与会者皆感动”。同时改组了为工贼把持的联安工会

等。从而，促进了工人队伍的团结，纯洁了组织，有力地支持和维护了省港罢工，粉碎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阴谋。

1926年2月25日，周恩来以东江行政公署名义，电慰省港罢工委员会，赞扬罢工工人“不惜巨大牺牲”，坚持反帝国主义斗争所作出的贡献，赠给“反帝国主义先锋”的锦旗，并表示：“本署同人，愿作诸君后盾，坚持到底，以争最后之胜利”。汕头罢工一直坚持到1926年10月整个罢工胜利结束。

汕头市于1926年5月1日正式成立汕头总工会，到10月召开第三次工人代表大会时，有组织的工人已由原来7000多人增至3万多人。潮汕各县也相继成立了县总工会或“总工会筹委会”。

“三·二〇事件”后，潮汕工农坚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方向，坚决反对右派势力，积极参加巩固北伐后方的斗争，还组成3000多名工农运输队支援北伐。打击了右派，推进了国民革命。

在农民运动方面，第一次东征军克服潮梅，普宁县农民协会即告成立。地主豪绅为了推翻农会，一面勾结县长，一面鼓吹宗族主义同农会对抗。周恩来以总政治部名义派人弄清真象后，即令《岭东民国日报》发表文章，驳斥谣言，指出这场斗争是农民反抗地主封建压迫的阶级斗争。给予普宁县农民以坚决的支持。迫使地主豪绅接受了向农民协会赔偿损失的条件，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

在第二次东征的胜利进军中，周恩来于1925年10月22

日到达海丰，立即恢复农会。并赠送400多支枪给农民自卫军，使海丰农民迅速成为配合东征军作战的重要力量。在五华，古大存领导的农民自卫军积极参战，起到很大作用。在东江潮梅工农的有力支持下，东征军迅速荡平陈炯明军阀势力。

地主豪绅为了破坏农会，唆使爪牙混进农会或组织假农会；买办阶级也收买工贼挑起事端，企图分裂工会。右派的“孙文主义学会”也从中挑动。

周恩来采取果断措施扫除障碍。1925年底，周恩来查明汕头《平报》右派记者邱誉（邱誉田）发表破坏国共合作、攻击革命政府和工农运动的反动报道，即下令逮捕。1926年1月，又查明惠来县反动分子何贺，组织假农会和“农民自卫军”，分遣劣绅，滋扰四乡，横行霸道。就立即电告广州国民政府，取缔假农会，并逮捕何贺，另委革命同志去主持。1月22日，电令解散兴宁县由官僚王霭君等违章组织的“农民协会”和“农会倡办处”。潮梅海陆丰农会办事处亦通告各县农会注意严密组织，防止坏人混入。另外，周恩来还改组了一些被工贼把持的工会组织。从而，粉碎了反动派的阴谋，推动工农运动健康发展。

1926年2月1日，周恩来在招待汕头各界代表会上发表施政演说，在讲到工农政策时，进一步指出：“各县人民所组织的团体，如真为人民谋福利的，当力图其发展”。“工会如为少数贵族所操纵，图谋个人活动，也要取缔。”“农民方面，政府当助其组织”，以“造成革命之中心”。强调工农团体应当为反帝反军阀、并谋取工农自身的利益

而斗争。为东江、潮梅工农运动制定了指导方针。

随后，东江各属行政会议作出了保护和发展工农运动，取消各县民团局并接收其枪弹服装，组织农民自卫军等决议。接着，中共潮梅各级党组织和农会均选派一批党团员和农运骨干为特派员，深入农村，发动群众，组织农会，开展农民运动。

在这期间，周恩来还紧紧依靠地方党委和彭湃、杨石魂等工农运动领袖，积极培养干部，并同国民党左派紧密合作，实现“扶助农工”政策，这样，潮梅海陆丰地区工农运动便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下，农民反对地主豪绅把持乡政，清理公款，废除苛捐杂税和封建陋规，开展“二·五”减租等，搞得轰轰烈烈。农民在斗争中得到了实际利益，参加国民革命的积极性更高了。农民协会会员发展很快。以澄海县为例，1926年3月参加农会的有2000多户，全面开展减租后，到10月增至1.8万多户，到1927年1月，更猛增至3万户，全县90%以上农村都建立了农会。是年3月，潮梅海陆丰召开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时，已有会员27.14万户，60多万人，占当时全省农会会员的一半以上。彭湃在《会务报告》中说：“就全国全省来说，东江农运算顶好。”

发展工农武装

在周恩来的决策和大力扶持下，潮梅海陆丰的工农武装得到迅速发展。

1926年3月，周恩来回到广东区委工作。7月，他和

陈延年特派罗明(后为中共汕头地委书记)到汕头开办“东江农工运动人员宣传员养成所”，参照广州农讲所办法，培养了二三百名工农运动骨干，适应了北伐和发展工农运动需要。

然而，国民党新右派却日益背离孙中山的政策，借口北伐，发布限制工农运动的命令，连示威游行，都在禁止之列。

中共潮汕党组织遵循周恩来所确定的方向，坚持共产党的正确主张和孙中山的政策，继续把工农运动推向前进，特别是在广东革命根据地受到危险威胁，工农群众受到摧残的时候，工农武装起而自卫。

1926年八九月间，陈炯明在香港受英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指使，自任“讨赤军总司令”，派遣余党潜回东江各县，勾结地主豪绅、民团土匪，扰乱北伐军后方，摧残农民协会。当时国民政府因防军兵力单薄，这时农民自卫军“天天在同土匪搏战”。实际担任了海陆丰的防务。他们与防军合作，使陈炯明勾结的逆党不能在他的老巢起事”。

福建军阀周荫人数次进犯潮汕，防军兵力不敷调配，农民自卫军积极配合作战。饶平县上饶区农会，也组织了“农军助战团”配合防军，于10月上旬打退田宝琴旅进犯，使潮汕转危为安。

尽管工农武装在为国民革命牺牲奋斗，国民党新右派勾结豪绅、工贼残害工农的惨剧却有增无已，还攻击工农运动“超过国民革命的范围”。而陈独秀等也叫喊工农运动“过火”，甚至要工农解除武装。

这时，周恩来、陈延年等广东区委领导人，愈益看到党掌握武装和发展工农武装的极端重要性。1926年10月，周恩来、陈延年明确指示汕头地委书记罗明：“要着力加强工农组织和工农武装力量”，“要敢于打击地主民团的武装”，“要防止新右派搞突然事变”。11月，又从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中抽调60名共产党员分赴广东各地，加强工农武装的组织和训练，其中到东江地区17人。李运昌（原名李芳歧，现中顾委委员）被委为潮梅海陆丰农会办事处农军部主任，以统一领导各县农军，并在各县普遍建立“模范队”作为常备武装。

12月，周恩来针对当时形势，在《人民周刊》连续发表《现时政治斗争中之我们》等三篇文章，申明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立场，驳斥了各种反动谬论，坚定地维护工农利益，支持工农运动。

周恩来指出：“我们共产党领导工农参加国民革命，其目的是打倒国外帝国主义和国内半封建势力，其要求不能超过民主政治的范围。但当着资本家压迫工人谋生活改善的正当要求，或是地主联合一切旧势力摧残农民谋解放的运动时，共产党必须站在工农群众方面，并为解除工农的痛苦奋斗到底。”这“并非超过国民革命，而实是推进国民革命”。

蒋介石制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广东“四·一五”），潮汕地区澄海县工农武装于4月15日率先举行暴动，举起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旗帜，继之遍及潮梅、东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工农革命斗争。

五、建立和巩固以国共合作 为基础的统一战线

统战工作，是周恩来大革命时期在潮汕进行革命活动的主旋律。他不但代表中国共产党人与国民党人精诚合作，胜利进行了黄埔建军，以及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一系列战争，而且亲自兼任国民党东江党务组织主任。在改组、建立东江各级国民党部中，他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关于扩大和巩固左派，争取中派，揭露右派，集中力量同右派斗争的策略，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为实现与我党的最低纲领相一致的国共两党共同政治主张——反帝反封建而奋斗。

恢复、改组国民党党部

东江地区的国民党组织，是孙中山于1921年5月5日在广州就任大总统后，才筹备建立的，但大部分被官僚、豪绅所把持，名存实亡。陈炯明背叛孙中山，并被逐出广州，盘踞东江后，惠（阳）、潮（汕）、梅（县）各级国民党党部，实际上已被摧残殆尽。

为了复活东江国民党组织，1925年2月底，国民革命东征军攻下海丰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任周恩来为东江各地党务组织主任，并授权“该各团、营、连、排之党代表，由组织主任周同志分别函派为组织员”。

周恩来受命后，除在东征军中的团、营、连、排党代

表及军队政治部中抽调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委派为东江各县、市国民党党务组织员外，还从中共广东区委、团广州地委及海陆丰派遣大批干部，分别任命为国民党党务组织员、政治部特派员，分赴各地，开展工作：

博采民间舆论，考察地方党务情形。从第一次东征到第二次东征，周恩来每到一地，都派员深入民间，听取群众意见，考察各地国民党党务方面的状态：是否有组织；有多少国民党员；各地人民及国民党员对该地党部负责人有什么看法；是否有摧残党部、禁止入党等现象存在。周恩来还规定各特派员、宣传员到各地后，定期函报或回政治部及时汇报情况。经过调查，搞清当时东江国民党党务状况是：一、陈炯明军队为害地方，手段极其残暴。各级国民党部几乎全部被破坏，其主要骨干，大部遭通缉，并逃跑出洋隐避，人民对陈军“极其愤懑”。但原有旧国民党员大部分仍有恢复党部活动的愿望。二、由于反动军阀的反宣传，大多数人对国民党的党义不了解，不知道国民党是什么政党，为什么要加入国民党。三、有的地方党部组织涣散，派系斗争严重，争权夺利，名存实亡。四、个别地方还视国民党为非法。如潮州省立金山中学校长黎贯自任事以来，严厉压迫学生，有学生谈及国民党者尚受禁止，若谈要加入国民党更是极力压制。因此，在4年中，潮梅地区“无一点党之基础”，“没有造出党的人材”。

派出特派员、组织员，着手组织、改组东江国民党党部。针对东江国民党党务情形，周恩来作出当务之急的两

项决策：党军所到之处，立即派员对当地国民党党务，“予以相当援助”；派出宣传队、演出队、开军民联欢大会、办报纸、开设书报流通社等形式，灌输进步舆论，回击“反国民党之反宣传”。

2月21日下午6时，第一次东征攻下白芒花。翌日校军本部在白芒花小学休息，周恩来亲自带人到平山调查、宣传。24日，即派王伯苍到平山组织党部（3月12日，平山国民党党部组织就绪）。3月2日，又派吴振民留海丰、颜国璠去陆丰办理国民党务及宣传。

3月19日，攻下五华县城后，又委派了五华县党部筹备员。

3月23日，周恩来派方临川（共产党员）为普宁、揭阳一带国民党党务特派员；鲁易、杨石魂（均为共产党员）为国民党潮梅党务特派员，负责整顿、改组潮汕、梅县一带的国民党组织，并调查人民疾苦。

对于潮安县国民党党部的组织工作，周恩来尤为关心和重视。4月上旬，就函令黄埔军校政治部干事潘学吟，“与各组织员帮同办理”潮安县党部之组织。并任命潘学吟为潮安县党部筹备处主任，解决了潮安国民党部内部派系斗争问题，成立新的国民党潮安县党部。

重整旗鼓，大力开展群众工作，把工农基本群众和青年学生吸引到国民党中来。第一次东征所到之处，虽陆续建立了国民党党部，但由于时间仓促，人材缺乏，相当一部分党部的权力，仍被封建、官僚遗老把持，不能把国民党的组织很坚固的建筑在民众之上，以致自东征军回师平

定刘、杨之乱后，陈炯明率逆军一来，已建立起来的国民党的组织活动无形销灭。

第二次东征入汕后，周恩来再次以东江党务组织主任的身份，重整旗鼓，着手恢复国民党党务。他派任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到各地任改组国民党特派员，如把共产党员李春蕃（柯柏年）派往澄海，共产党员文农到潮阳，团地委委员吴梦龙（吴华胥）至惠来等。这批特派员到各地后，深入了解民情，认真宣传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使民众懂得国民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建立共产党、共青团的地方组织；恢复工会、农会，发展工农运动；打击地主、军阀、豪绅残余势力；大量吸收工会、农会会员和青年学生加入国民党，壮大革命力量，全面推动国民革命。

整顿国民党组织 发展进步力量

通过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组织、发动，大大改变了国民党在东江民众心目中的形象，组织迅速扩大。但也有不少投机者认为时机已到，纷纷乔装打扮，拼命钻营，想入党捞官做。这一新情况，引起了周恩来的警觉。他决定对东江各级国民党党部进行一次全面组织整顿。

1925年11月23日，潮梅海陆丰国民党代表大会在汕头召开。会议作出了严审、限制劣绅、土豪、地主、官僚入党的决定。

正当潮梅海陆丰国民党代表大会开幕当天，国民党右派邹鲁、谢持、林森、居正等在北京碧云寺召开会议，通

过了开除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党籍等非法决议。这些“西山会议派”的非法活动，激起了全国国民党革命派党员的群起反对。共产党更是站在反对西山会议派斗争的前列，中共中央曾发出《中央通告第六十五号》，指示各地号召国民党各级党部“声明此次北京会议无效”。11月26日，周恩来在潮梅海陆丰国民党代表大会上作《关于党务经过的报告》，代表潮梅海陆丰2万余国民党员，痛斥西山会议派，提议开除他们的国民党党籍。

周恩来主持召开的这次潮梅海陆丰党部代表会议，提出了新形势下国民党组织的纯洁问题，旗帜鲜明地反对国民党右派，这对于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会后，周恩来运用会议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发动东江各级国民党党部认真做好改组、整顿工作，清除国民党右派和军阀官僚反动残余，大量吸收工农、青年学生加入国民党，让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站在统一战线的中心地位。据当年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务月报》记载：国民党汕头市党部执行委员会曾“滥越职权”。国民党潮梅特别委员会便在省党部第廿次会议上提出应予惩戒。根据潮梅特委的建议，省党部当即决议，派何应钦、周恩来、江董琴、赖先声、刘尔崧五人为“汕头市改组委员会委员”。周恩来在接到广东省党部的命令后，立即与各改组委员一起，成立汕头市党部改组委员会。会上，大家分析了市党部“组织不健全”，个别执委“滥越职权”等问题，选举共产党员、中共潮梅特委书记赖先声为改组委员

会常务委员，李世安为秘书，共产党员赵慕儒、廖其清、伍治之、刘锦汉，国民党左派马庆川及杜国英为干事，每位干事分别担任汕头市党部属下各区分部的改组任务。

在改组过程中，周恩来团结改组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着手解决汕头市党部及各区分部中的国民党右派势力盗用执行委员会的名义，滥越职权的问题，把窃取常务委员要职的张凌云等国民党右派清洗出汕头市党部，并开除张凌云的国民党党籍，“淘汰反动及不革命之分子”2600多名，发展新党员200余名。改组后组成的汕头市党部第二届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共产党员占半数以上，常务委员及组织、宣传、工运、妇女等部的委员，均由共产党员担任，共产党员站在统一战线组织中的中心地位。

澄海县的国民党组织，原来成分非常复杂，党部大多数为右派所把持。潮梅海陆丰国民党代表大会闭幕后，周恩来任命共产党员李春蕃（柯柏年）为澄海特派员。李春蕃以大会精神为指导，着手做好发展进步力量，清除右派势力的工作，把工作重点由学校转移到农村，发展农会，壮大左派阵营，利用日益扩大的左派势力和右派斗争，迅速扭转了澄海的革命形势。整顿后的澄海国民党党部有国民党员2200余人，其中站在共产党方面的农民1400余人，学生300余人，工人200余人，中立商人百多人，反动的只有百余人。象1928年5月10日《中共澄海县委致广东省委报告》所指出的那样，那时由于“我们农运日益发展，群众日益多，力量日益扩大，造成左派的势力

和右派的斗争，结果把一切右派分子滚蛋打倒……在职员方面，执、监委员我们亦占过半数，所以那时国民党的工作简直是我们做的。”

1925年冬，潮梅海陆丰已有国民党员2万余人。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周恩来在潮汕的革命活动，是周恩来伟大一生中一段重要的发展时期，也是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一页。他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不但巩固了国共合作，推动了国民革命，而且为潮汕的党和人民培育了优良的革命传统，留下了许多有益的经验，是毛泽东思想宝库中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总结、继承和发扬。

周恩来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战线的形成

潘 合 定

周恩来长期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工作。在革命实践中，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制定正确的战略，机动灵活地运用斗争策略，团结多数，孤立少数，在争取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勋劳卓著。

一、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1935年12月，党中央在陕北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并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随即毛泽东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的报告。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会后，中央红军渡河东征，周恩来被留在后方，受党中央、毛泽东的委托，领导和主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第二次国共两党合作之前，国共两党的接触始于1935年底。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不断加紧，民族矛盾上升，中日战争不可避免。蒋介石除寻求英美帝国主义

的保护之外，也想改善同苏联和中共的关系。初期国民党寻找关系和我党联系是采取多渠道进行的。

第一条渠道是国民党指派驻苏联大使馆武官与我党进行会谈。1935年秋，国民党派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回国述职。蒋介石认为可以利用苏联政府坚决支持中国抗日的立场，同苏联签订对日军事同盟条约，以牵制日本进一步侵略。由于时机不成熟，未成功。蒋介石为达到同苏联签订军事同盟条约的目的，也作出改变对中国共产党态度的姿态，期望中共从中促成，从而将日本侵略矛头引向苏联和削弱中国共产党以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在此背景下，1936年1月，邓文仪给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写信，希望国共两党派代表举行一次会谈。此信立刻得到代表团的同意，随即在中共代表处举行了会谈。参加这次会谈的有3人：王明、潘汉年和邓文仪。会谈开始，我方阐述了“九一八”以来中国共产党所倡导的一系列联合抗日主张。经数次会谈，邓文仪对中共提出的联合抗日原则表示了赞同，还表示他愿亲自到中共苏区进一步谈判。1月23日潘汉年起草了保证邓文仪去苏区安全问题给蒋介石的信。其信内容如下：“邓文仪先生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中正与中国共产党驻国际代表团接洽共同抗日救国事，除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原则外，并愿赴川陕苏区亲见中国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总司令朱德谈判抗日救国合作具体办法。关于邓文仪先生至苏区及红军防地之日起，迄离开苏区及红军防地之日止，邓先生之行动自由及身体安全之保障，我代表苏维埃政府毛主席及红

军总司令负完全责任，此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人民外交部副部长潘汉年1月23日”。同日，中共代表团又以王明名义向中央写了如下报告：“泽东、玉阶、稼蔷：自我中央及苏维埃中央政府八月一日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宣言及几次通电发表之后，深得全国各方之同情与响应。南京军事委员长介石先生于本年1月曾派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为代表亲与弟及汉年面谈数次，表示同意我们所提出之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原则。惟对于抗日救国之具体合作办法有待于蒋与诸同志直接商洽，故决由邓君与汉年同志亲赴南京与蒋面商，并言定再由南京同去苏区与诸同志协商抗日救国的合作具体办法。”尔后邓文仪、潘汉年相继回国。

第二条渠道是寻找中国共产党北方组织联系。开始是曾养甫找到谌小岑，通过翦伯赞找到吕振羽（中国北平大学教授中共北京市委领导下的职业大同盟书记）。吕随即向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长周小舟汇报。1935年底，中共北方局和北平市委决定派周小舟和吕振羽去南京与曾养甫会商。这一次会谈，我党向国方提出了四点主张：（一）立即发动抗日战争；（二）开放民主自由；（三）释放政治犯；（四）恢复民众组织活动。国方则向我方提出：（一）要我党帮助他们与苏联联系；（二）要中国红军改编，苏维埃改制。不久，中共北方局又决定派周小舟与吕振羽再次去南京。这次去的时间是我红一方面军东征开始之时。根据刘少奇的指示，他们带去了毛泽东、周恩来署名的信件和文件，以表示我党的主张和真诚合作的愿望。国方则表

示了四点：（一）由他们改编红军；（二）取消苏维埃；（三）邀请我党领袖以个人资格参加南京政府；（四）要我出兵蒙古，进攻满洲。这两次会谈的情况由北方联络局负责人王世英于3月底到山西前线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汇报。

第三条渠道是打通与中共中央的直接联系。这一条渠道是通过左派人士宋庆龄等人的帮助实现的。宋庆龄一贯坚持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反对内战，不畏时局险恶，不怕受迫害，与我上海地下党和中共代表团一直保持着联系。看到国民党内一部分人态度的变化十分高兴，乐于促成。1936年1月宋找到原中共上海中央局领导人之一的董牧师和张子华，要他们将一封重要信件送到瓦窑堡面交毛泽东、周恩来。委托其将国民党谈判条件报告党中央。同时，还将刚从苏区抵达上海受她保护的刘鼎介绍给周继吾等，嘱其带往陕北。2月27日，董牧师化名周继吾和张子华途经西安到达瓦窑堡，使我党了解到南京各派对抗日救国的态度。3月4日，中央经研究，决定向国方提出会谈的五项原则：（一）停止内战，全国武装不分南北，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和经济上实行初步与必要的改革。上述条件交周继吾立即带回南京，同时带去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给曾养甫和谌小岑的回信。张子华则暂留陕北。3月下旬，有毛泽东、周恩来参加的晋西大峪郊政治局会议，就国际七次代表大会决议和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问题进行讨论，并听取了张子华和王世英等的汇报。这次会议对国民党的动向进行了深刻的研究和分析。（一）认为在抗日救国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国民党内部起了分化，尽管基本政策未变，但策略上有所变化，从不与中共打交道到主动联系是一个明显的变化；（二）肯定了我方交给周继吾带给国民党的五个条件是正确的必要的；（三）同时指出，要做到蒋介石根本转变反共政策，还需经过长期艰巨的争取和斗争。5月15日，周恩来给谌小岑信，告之我方对会谈的意见和条件，已交周继吾带去，并说：“愿兄能推动各方，共促事成”，“倘愿惠临苏土，商讨大计，至所欢迎。”不久，我方收到5月15日谌小岑致周恩来答复信，信中说：“兄与毛彭二先生致曾养甫先生大札，5月初又得上海转来手书……目前南京当局自审其在国际上之地位，对于国防政府与联军之组织在表面上势难赞同。”从而拒绝了我方之条件。从中看出，促使国民党政策的根本转变，还需长期斗争。

此后，根据中央决定，和国民党的谈判统一由周恩来负责，各地所成立之联络局（起统战部职能）只进行迎送联络，不负谈判之责。

二、推动西北大联合

为了促进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促使国民党政策的根本转变，在8月10日中央会议上，周恩来指出必须要有几个大联合，即西北的大联合，少数民族的联合，蒙苏的联

合，红军的联合。他认为西北大联合是全国大联合的枢纽。为实现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周恩来亲自部署以下工作：

（一）加强对东北军的工作。瓦窑堡会议之后，中央成立了东北工作委员会和白军工作部，积极开展对东北军上下层统一战线工作。周恩来派张浩驻庆阳，专门负责西线的东北军工作，同时又派朱理治以中央特派员的名义驻陕甘省进行东北军工作，并指示要动员陕甘的群众起来进行东北军工作。日本侵占东三省之后，东北军广大官兵离乡背井，深感亡家亡乡之苦，被蒋介石驱使进攻红军，经过多次交锋，尤其是劳山战役中伤亡惨重。不少官兵感到他们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而打红军是没有出路的。在我军的正确俘虏政策的感召下，东北军被俘军官高福元自告奋勇出来表示愿为两军联合抗日牵线搭桥。经过高福元的沟通，我方代表李克农在洛川和张学良、王以哲进行了第一次会谈。在联合抗日问题上双方取得了一致意见。为了加强合作，共同行动，4月，党中央决定派周恩来为我党全权代表到延安与张学良、王以哲举行正式会谈。关于我对东北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的情况，1936年7月2日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写之甚详，报告写道：“去年10月11日粉碎东北军对陕北进攻的战役中，共消灭了他整个6个团，打死他两个师长，大批优待与释放俘虏官，并发送抗日救亡统一战线的各种宣言书信的结果”，不久“即得到反映：由一个释放的俘虏团长高福元带来了东北军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愿与我们谈判的回答。当时由彭德怀同志派遣李克农赴

洛川与张学良、王以哲见面。”报告又说：“张学良左右围绕着一批革命左派分子及上海革命左派……对张起了很大作用，逐渐减少了张对蒋的幻想与对苏及我的怀疑”。“2月以后，红军东征，更提高了他部下的兴奋。”又称：“张对反蒋联共联俄已下初步决心，因此，决意找我负责人谈判。4月中旬，我派恩来在肤施（注：即延安，下同）与张秘密谈了一整夜。”从而达成以下协议：1. 双方认为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是唯一出路；2. 赞助红军开赴河北前线作战；3. 双方均派代表赴苏联系，中共代表可由张学良保护出国；4. 完全同意停止内战，并确认红军的抗日行动有利于全国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发动。还有互相通商、互派代表问题也达成了一致意见。为了加强双方的联系，张学良点名要刘鼎留在他身边工作，专门与我联络。东征回师后，周恩来再次到肤施与张学良进行第二次会谈，此后，我与东北军的关系更为密切，凡与国民党会谈的情况与蒋介石压迫东北军进攻红军的情报均互相通报。

（二）争取西北军。西北军是一支有革命历史的军队，共产党员南汉震、申伯纯、许权中等均在该部工作过，在一片白色恐怖的日子里，能够保存一部分党的力量，在国民党部队里是不多见的。4月5日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西北军工作方针的报告，指出西北军与东北军有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错误政策的可能，而且这种可能还可以推广到陕甘以及宋哲元部队中去。形势的发展完全证明了周恩来估计的正确性。

我对东北军、西北军成功的统战工作，为开展西北抗日大联合，迎接全国抗日运动的新高潮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推动各方逼蒋抗日。国民党虽然拒绝我方关于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提议，但并没断绝和我党的联系。相反，从书信和代表之间的往来均有所加强，继3月会商之后，又有几次往来，而交换的意见亦有所进展。根据此情况，8月10日和8月25日举行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着重总结了瓦窑堡会议以来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所取得的成就和确定今后方针。会议对国民党蒋介石作了深刻分析，指出国民党内部是复杂的，而分化正在加剧，蒋介石代表英美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在全国抗日运动高涨的形势下，他要抓抗日旗帜，以平息全国人民的愤怒；另一方面又坚持“剿共”政策，与日妥协，因此产生抗日与“剿共”不可调和的矛盾，而表现于严重动摇之中；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和全国人民反日运动的高涨，有逼蒋改变政策的可能。为此，中央决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以国民党为主，并发出一系列指示。8月12日毛泽东等发出《关于今后战略方针之建议》，首次确认“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同时规定了红军的自卫原则：他不来攻，我不去打；他若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请求议和；对其挑衅，实行“先礼后兵”的政策。8月25日，我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敦促国民党政府改变历年来的对外妥协对内压迫的反动政策。并郑重宣言：“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

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并严正宣布：“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建立之时，苏维埃区域即可成为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9月1日，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9月17日中央又发出《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现在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继续增长，国民党及其南京政府发生分化与动摇。“国民党南京政府内外政策的摇摆不定，其言行的自相矛盾，与其各派间关于抗日问题上的争论，明显的表示出它现在是在动摇的中间。在日寇继续进攻，抗日救亡运动继续发展，国际形势新的变动等条件之下，国民党南京政府有缩小以至结束其动摇地位，而转向参加抗日运动的可能。”

上列指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促进国共合作的原则和方针。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周恩来安排了几方面工作：

（一）派潘汉年去西安与张学良会谈。潘汉年于1936年3、4月间由莫斯科回国，转经香港、广州、西安，8月上旬回到保安，参加了8月1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报告了他在莫斯科与邓文仪会谈的情况，对于共产国际与国民党的情况和态度了解甚详。张学良对国际态度甚为关心，因此，周恩来派他去西安，以便和张学良商量如何以

国民党为重心共同进行工作和打通苏联关系以助推动西北大联合，以及请张学良去南京进行和平斡旋等问题。

（二）力争国民党派正式代表来苏区谈判。根据中央和周恩来的指示，8月11日潘汉年以个人名义给邓文仪写信：“文仪先生：阅报悉，大驾已返本国，弟在目前亦返部队。前在莫谈双方停战共同抗日救国问题，当时未得具体办法。此次归来，弟将贵方意见报告诸负责同志。一致认为目前日寇策动内蒙汉奸，积极侵犯我绥远宁夏，际此国难日紧，双方立即停止战争继续巩固国防与抗日救亡刻不容缓，甚愿先生来前线继续谈判。事关民族存亡，想贵方不致继续置之不闻不问也。书不尽言，佇候驾临。”由于CC派内部矛盾，以后仍由曾养甫出面与我联络。

（三）加强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加强对地方实力派和国民党内一部分倾向抗日分子的工作。8月14日毛泽东给刘少奇电，指示“必须向宋哲元及二十九军继续工作。”同日，毛泽东又给李允生电，指示对宋子文、孔祥熙等“欧美派冯玉祥派覃振特别是黄埔系中之陈诚胡宗南须多方设法直接间接找人接洽”。还指示由周继吾专管欧美派的工作，多和宋庆龄等联络。7月30日，周恩来指示加强联络局工作，尤其是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大城市应引起特别注意。在党的安排下，派张金吾到宋哲元部联络，派上海联络局李元生到四川刘湘处联络，派周怡到湖南何键处联络，派彭雪枫到山西阎锡山处联络，以便协商共同逼蒋抗日。在派出代表的同时，毛泽东、周恩

来、林伯渠分别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苏维埃中央政府给全国知名人士和实力派领袖人物写信，晓以民族大义，以促进抗日大业的实现。9月1日，周恩来亲笔致信陈立夫、陈果夫，指出“近者寇入益深，伪军侵绥，已成事实”，“两地危亡迫在旦夕”，希望二陈向蒋介石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9月22日，周恩来又致信蒋介石，讲明“大敌在前，亟应团结御侮，自相砍伐，非但胜之不武，抑且遗祸无穷”，如蒋介石决心变更自己政策，我党将随时派遣负责代表与之协定抗日大计。在加强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加强了下层统一战线的工作。7月，中央决定白军工作部由周恩来亲自负责。

（四）主持和国民党第二次交换意见。8月底张子华带着国方的密码和谈判条件以及7月19日曾养甫给周恩来的信到达保安。中央和周恩来研究后立即作了答复，仍派张子华将书面意见带去广州。9月初，张子华离开保安，9月20日抵达广州，当即会见了曾养甫，面交了我方之意见。其内容为：第一，日寇进攻甚急，我方愿以全力为助，希望守方坚持民族立场，不作任何丧权让步。第二，我方首先执行停止对国民党军队攻击，仅取防御方针，等待和议谈判集力抗日。第三，欲图和议谈判早日实现，请蒋暂时以任何适当名义停止军队进攻，以便开始谈判。主要目的是实现第一步目标，订立停战协定。在这次交换意见中，国民党方面也提出了四条：（一）共产党公开活动。（二）苏维埃继续存在。（三）苏区派代表参加国会。（四）红

军改名，照国民革命军编制及待遇，但不变原有人员。对此四条，我党表示可以作为谈判的起点，同时以实际行动表示了诚意。10月15日，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单方面发布停战令，命令红军一切部队停止对国民党军队的攻击，并派潘汉年去南京与国民党负责代表会谈。

四、对蒋介石军事进攻进行自卫还击

（一）11月9日潘汉年抵达南京，旋即与陈立夫举行会谈，并向陈立夫递交了我党拟定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根据协定草案的精神，潘汉年阐述了我方之基本立场，即要求国民党实行武装抗战，保卫全中国领土与主权。实行全国各党派各界各军抗日救国联合战线，依据民主纲领建立中华民主共和国。具体要求是：双方停止内战，划定红军抗日根据地；在不变更共产党在红军中之领导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实行统一指挥和编制，红军担负一定防线与战线；废除国民党政府限制民主权利之法令，实现民主；停止反共，一致抗日，等等。陈立夫代表蒋介石对我作了如下答复：（一）既开诚合作，就不好有任何条件；（二）对立政权必须取消；（三）目前只保留3万红军，师长以上领袖一律解职出洋，党政干部可按才分配南京政府服务。

11月12日，潘汉年将这次谈判结果报告了中央，分析现在南京内政外交非吃紧之时，“谈判恐一时难于成功。”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下，我方表示了严正立场。不同意所提条件，并指出红军仅可在抗日救亡前提下承认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但从蒋介石答复条件看，这次谈判不仅未取得进展，反而大大后退，局势变恶，埋伏杀机。

（2）对蒋介石军事进攻给以坚决回击。11月25日，日本和德国、意大利两个法西斯国家签订防共协定，一面加紧对中国的武力侵略；一面对蒋采取引诱政策。蒋介石产生了严重动摇。曾向日表示允待三个月内肃清共军，以代替中日防共协定，希日本勿扩大绥远事件为条件。10月16日蒋介石飞抵西安，拒绝了张学良的和平斡旋。17日续去太原，22日又飞西安。调集了30个师的嫡系部队云集平汉和陇海一线，一部分则开进陕西，胁迫东北军。并用飞机监视东北军向我苏区进攻，企图迫我就范。蒋介石这种错误政策引起一部分爱国人士的不满。张学良乘蒋介石于10月29日到洛阳之机，再呈书蒋介石要求改变政策，遭到蒋的训斥。张十分不乐。立即写信给前方的王以哲，令其东北军勿轻举妄动，不理蒋介石向苏区进攻命令。11月，红军集中于定边县，决定打击进攻苏区的胡宗南部队，周恩来亲临前线指挥。我军于11月18日和21日在山城堡地域连续打了两仗，连战皆捷。消灭敌人一个旅和击溃两个旅，取得了军事上的重大胜利。我军事上给蒋以打击，目的仍是逼蒋抗日。11月26日毛泽东给彭德怀电中指出：“我之政策一方面从人民从反蒋军阀从国民党内部造成运动，一面红军消灭蒋军双管齐下迫蒋妥协。”山城堡战役后，毛泽东、

周恩来发表告胡宗南军官佐士兵书，并释放大部被俘官兵，我党这种团结御侮，以抗日大局为重的政策，在胡之部队中产生了广泛影响，赢得了广大官兵的同情。

但蒋介石仍不放弃武力。12月4日又杀气腾腾飞到西安，向张学良、杨虎城施加压力。威逼张、杨说：如不“剿共”则将东北军和西北军调离陕西。12月8日，张学良再次向蒋介石哭谏，又遭蒋介石拒绝。12月9日，西安学生为纪念“一二九”一周年，遭特务镇压。12月12日午夜，张学良、杨虎城断然扣押蒋介石及其随行人员。12月13日，张学良、杨虎城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同时派出代表去新疆、山西、广西、四川等省向当权人物解释：表明对蒋介石“兵谏”，是为了促其反省自咎，改变其内战政策，实现抗日救国。

（五）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以“兵谏”形式遽然爆发，但实际上事出有因，决非偶然。它是灾难深重的中国30年代社会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华儿女对敌寇深入国土要求抗日的反映。正如事后（12月18日）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中所指出的那样：“蒋介石在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氏在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这一震惊中外的重大事件一发生，张学良、杨虎城的义举立刻得到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12月12日晨3时，张学良、杨虎城将这一事件迅速通

知我党。党中央认为，这是一次革命行动，没有外国背景，事关国家命运，务必全力支持，决定要周恩来去西安。当天中央为事变发出数电：一是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建议“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以保卫西安，预防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的进攻。并告知准备派周恩来去西安协助。另外分别给北方局刘少奇和上海潘汉年电，指示动员地方实力派及国民党内抗日分子及知识界知名人士起来拥护张杨的革命行动，召集抗日救亡代表大会，讨论抗日救亡方针，不咎既往，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创造条件。12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又致电张学良、杨虎城，表示“全部红军与全苏区人民坚决赞助二将军领导之革命事业”，并建议：立即宣布抗日援绥联军之组成；联军应集中于西安、平凉与敌决战；东北军、十七路军、红军联合起来。12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呼吁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以期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革命政策等五项主张。

12月17日，应张杨的请求，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抵达西安，受到张学良的热情欢迎，并下榻于张公馆，随即和张学良会谈。接着又和杨虎城会谈。达成和平解决事变方针。这时在扣押中的蒋介石的态度也由强硬变为缓和。同意书写了停战令。张学良、周恩来协商后，采取两条措施。第一，释放蒋鼎文持停战令回南京，以阻亲日派的进攻，争取时间向各方协商；第二，如果南京停止向西安进攻，可以保证蒋介石的安全。12月18日周恩来致中央电，

提出我们应取在坚决防御下，坚持抗日动员，争取同情，分化南京，孤立汉奸，缩小内战的策略方针。中央同意周恩来所提出的方针。19日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指出要“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经过周恩来的说服工作，和平解决事变时机趋向成熟，但释蒋条件颇费周折。周恩来综合了张杨八项主张和各方意见为六条。19日，我接共产国际复电，赞同和平解决事变及在六个条件下释放蒋介石。23日24日，张杨二将军与宋子文会谈，后宋美龄亦参加，周恩来代表中共出席。首先周恩来提出中共及红军六项主张：“子，停战，撤兵至潼关外。丑，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寅，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卯，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辰，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巳，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六条的核心是停止内战，联合红军抗日，改组南京政府，共产党公开等内容。24日晚，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蒋在客观形势面前，不得不作出承诺。12月25日，毛泽东给彭德怀、任弼时电说：“转变整个局势的方针，是我们提出的，谈判结果，蒋与南京左派代表完全承认”了。至此，西安事变得和平解决。十年内战终于停止。这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斗争成果，也是周恩来坚韧不拔、不懈斗争的业绩，这些光辉业绩，不少记录于党的文献里。

五、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完全实现

如果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是时局转换的枢纽，是蒋介石被迫走上抗日的第一步。但要使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变为现实，还需促蒋走第二步。为了有准备的与国民党进一步谈判抗日问题，1937年1月24日19时，周恩来于西安致中央电，提出与国民党谈判方针：（1）可以服从三民主义，但放弃共产主义信仰，绝无谈判余地。（2）承认国民党在全国领导，但取消共产党绝不可能，唯国民党如能改组成民族革命联盟性质时（蒋在西安有改组党之意），则共产党可整个加入这一联盟，但仍保持其独立组织。（3）红军改编后，人数可让步为六七万，编4个师，每师1.5万人。（4）红军改编后，拒绝国民党组织。（5）苏区可改为特区。周恩来的建议体现了马列主义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成为以后我与国民党谈判的基础。1月25日中央关于与国民党谈判方针复周恩来的电报中说：完全“同意你24日19时电”。根据上述方针，2月初，周恩来同顾祝同、张冲等举行会谈，周恩来首先阐述了我党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和周恩来1月24日致中央的电报精神，提出四条保证，同时向国民党提出五条要求。在红军编制上必须保留5万人至6万人。开始谈判比较顺利，周恩来亲自将谈判结果归纳出方案。后贺衷寒参加，对方案要求修改，提出将红军人数减为3万人，取消政治工作人员，国民党方派遣副佐人员，分割苏区隶属各省等。对此，周恩来表示强硬的原则立场：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中共为国家民族利益计，联合抗日，让步是互相的，如以收编对之，绝难再谈。并向中央建议，大的原则问题必须找蒋介石谈判解决。尔后，周恩来深入国统区，与蒋介石进行了面对面的四次会谈，取得了圆满结果。

（一）3月下旬，周恩来来到杭州和蒋介石举行第一次会谈，在周恩来有利有节的说理斗争之下，蒋介石不得不同意我方最低方案，容许红军编制4万余人，设总指挥部，国民党方面不派副佐及政工人员，苏区不分割等。对这次会谈，4月5日，周恩来亲自起草了给共产国际的报告，摘录如下：1.蒋介石承认我们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2.承认由于国共分家致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局面。3.要我们不必说与国民党合作，只说与他合作。4.要我们商量一永久合作的办法，恩来答以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一个最好办法。他要恩来赶快来商量与他的关系及纲领问题。5.关于具体问题，他认为是小节，容易解决。他说国民党大会、国际会议在几个月后召开，我们可以参加。行政区要整个的，须我方推荐一个南京方面的人来做正的；副的以下均归我们，并由我们自己干，他不来干涉。军队人数不同我们争，总司令部可以设等。谈判取得进展。

（二）6月周恩来去牯岭与蒋介石举行第二次会谈，继续讨论两党合作及红军编制、边区人选等。经过数日谈判，蒋介石表示了如下态度。1.为统一，国共两党合组国民革命同盟会。同意制订一个共同纲领，他作主席，有最后决

定权。2. 共产党发表一个对外宣言。政府在宣言发表之后，即发表3个师番号，人数可容45000人。3. 共产党的代表可参加国民大会和国防会议。4. 在狱中的共产党员，可以分批释放。5. 其他党派不谈合作问题，由中央收容。6. 边区政府派正官长。从上述条件看出，对我仍严格限制，由于两党组织原则及红军编制与边区政府等问题不能同意，尤其是指挥与人事问题，与蒋争论很久不能解决。经宋子文、宋美龄、张冲往返磋商，仍不能解决，蒋仍坚决主张设政训处指挥。周恩来只好回延安，静观时局变化。同时，为再次会谈作准备：由周恩来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由吴亮平根据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第一次国共合作宣言起草了《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并经周恩来精心修改，其主要内容包括：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民权自由，保证人民自由，实行民生幸福；建立国防经济及国民革命同盟会；不干涉两党事务，两党均保留各自组织之独立性等。

（三）7月中旬，周恩来去庐山与蒋介石进行第三次会谈。同去的有博古和林伯渠。会谈仍是红军改编两党合作等问题。同时带去了关于国共合作宣言和两党合作共同纲领等文件。蒋介石本提议共产党与他个人合作，目的在于控制我党和割断我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我则以共同纲领对之，纲领不仅大大限制了他的最后决定权的范围，同时要求他发扬民主、改善民生、实行全民抗战等。蒋看后无理可对。此后放弃谈党的合作问题。但仍坚持不同意

已答应过八路军设总指挥部的这一条。

（四）8月9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与蒋介石举行第四次会谈。在此时期，由于局势急变，日本帝国主义先后发动芦沟桥事变和上海八一三事变，抗日烽火燃遍全国各地，人民轰轰烈烈的抗日怒潮势不可挡。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等的力争下，8月22日南京政府迫于形势，发表了红军改编命令，9月22日公布了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创建 根据地的前前后后

田 酉 如

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创建根据地，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从1931年，党中央确定在山西建立工农红军，开展游击战争起到八路军3个师的主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向华北敌后实行战略展开，以山西为发展北方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创建抗日根据地，前后共经历了近7年时间。

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建立工农红军、 创建根据地的尝试

山西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中国共产党对在山西发展革命力量历来都是重视的。早在党的创立时期，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高君宇，于1920年夏回到家乡山西，在省会太原开展革命活动，成立了太原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山西点燃了革命的火炬。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高君宇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受党的派遣，于1924年5月回山西建立共产党组织，在太原建立了山西第一个党小组。在第一次大革命

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各地领导了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并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帮助国民党在山西建立了组织，召开了中国国民党山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山西省党部中担任了组织部长、工人部长、农民部长、商业部长、妇女部长等职。国共合作在山西实现，推进了山西的革命运动。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山西的统治者阎锡山紧紧追随叛变革命的蒋介石，在山西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农村，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统治。但是由于受“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党组织并没有扎扎实实地在农村开展工作，而是又到城市中去组织暴动。两次行动，都遭到失败。山西的共产党组织再次遭受到严重破坏。由于新建立的中共山西省临时省委没有放弃在城市开展冒险斗争的战略，1928年底山西省的共产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山西的革命斗争处于低潮。

1928年12月中旬，中央军委书记、中央组织部长周恩来代表中央到天津，传达党的六大精神。在顺直省委扩大会议上，号召大家在“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指导下，争取群众，发动斗争，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在天津期间，周恩来对山西的革命斗争形势进行了了解。1929年3月25日，他亲自起草了中共中央给顺直省委汪铭的信（即《周恩来选集》上卷中的《在白色恐怖下如何健全党的组织工作》一文）。信中强调指出，采取中央派人去各省恢复被破坏的共产党组织的做法是不妥的，应是在下

层组织已经建立起来，工作已有开展，然后才能由此种下层组织成立上层组织。山西目前可不成立省委，先着手于地方工作的恢复和建立，从太原、阳泉、绛州、榆次、河东诸地等中心区域做起。恢复工作要求从建立党的基础做起，在这一艰难困苦的工作中训练我们的战斗员。根据这一指示信的精神，山西省各地基层组织陆续恢复，党的工作在困难的条件下一步一步地恢复和开展起来。

1930年9月下旬，在上海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会议通过的《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案》中指出：应当坚决的“从发展新的苏维埃区域和土地革命运动的斗争里，发展更广大的农民武装、游击队和游击战争，适当的去创造新的红军；应当对于兵变给以正确的领导，并且在适当的条件之下组织士兵暴动，使他们的发动，的确能够削弱反动军队，而加强革命的武装势力——和工人农民以及红军的斗争联系起来。”

新的中央认为，蒋、阎、冯中原大战后，山西各种矛盾激化和山西地方群众斗争的形势有利于发动武装暴动，应把山西作为中国北方革命的重点。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在山西实行革命兵变，建立工农红军，创造苏区，将山西变成江西第二。为加强山西的工作，北方局先派有兵运工作经验的刘天章担任山西省委书记。其后，又派谷雄一担任山西省委委员兼军委书记。

此时，我党在山西各支国民党军队中，已经有了一定

的工作基础。党的工作开展的比较好的有在太原大营盘驻扎的商震部的军官教导团，有近百名共产党员；在汾阳驻扎的冯玉祥的军官学校，有200余名共产党员；在平定驻扎的高桂滋部队中，有近60名共产党员；此外，还有驻太原北门外李服膺部、驻运城的宋哲元部、驻晋城的孙殿英部等国民党部队中，也有共产党员在其中活动。这些部队中的共产党员，许多担任着中、下级军官的职务，掌握着一定的兵权，联系着相当数量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

刘天章、谷雄一到山西后，加强了在国民党军队中的党的工作。到1931年4月时，山西省委领导的共产党员发展到268人。在太原，共产党员已发展到105人，共青团员发展到31人。

为了加强在山西开展武装斗争，经刘天章同中共陕北特委联系，陕北特委派有军事工作经验、参加过1927年清涧起义的阎红彦和白锡林等来到山西。

在刘天章进行以上工作的同时，谷雄一利用曾在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军官教导团任过第三中队区队长职务（在此期间发展一批共产党员），积极在该团和高桂滋驻平定的十一师中开展活动。准备组织兵变。

在平定县驻扎的高桂滋部队中，共产党员赫光1926年就来到这里，发展了一批秘密党员。在24名党员中，有20名担任着该部队的中、下级军官职务。当时山西政局混乱，部队的给养没有保障。军官盘剥、打骂士兵，内部矛盾异常尖锐。由于共产党员的宣传，许多士兵和下级军官向往红军和苏区。为了加强高桂滋部中党的工作，中共山

西省委从山西军官教导团中抽调了马芳庭、牛清玉、吴耀礼等共产党员去到该部。以后，又派马芳庭到高桂滋部队工作。不久，高桂滋部中的共产党员发展到60余人，在团、营、连军官中，都有共产党员。

1931年1月，中共顺直省委派贺昌、薄一波到太原，听取了山西省委关于举行兵变的准备工作的汇报，根据山西共产党组织在全省各地的工作和在国民党部队中开展工作的情况，同意举行兵变。顺直省委决定，山西省委改为山西特委，刘天章改任特委组织部长，原省委组织部长阴凯卿担任了特委书记。刘天章实际上仍负责全省党的工作。

1931年4月24日，中共山西特委和中共太原市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集中力量在中心城市和厂矿发动群众开展政治经济罢工运动；开辟与发展中心区域如晋中（太原周围、正太路沿线）、河东、晋北、晋西农村的工作；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区；加强在阎锡山、冯玉祥部队中的工作，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加紧兵变工作，以瓦解反动军事力量，将其转变为工农武装队伍。

1931年5月初，山西特委召开了军事会议。根据中央军委统一规划，决定把高桂滋部的两个团拉出来，组成红军二十四军；策动山西军官教导团和李服膺的步兵十七团起义，组成红军二十五军；把晋西的“武装土客”争取过来，在吕梁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会后，山西特委首先在吕梁山区以“武装土客”为基

础，创建游击队。5月，中国工农红军西北游击大队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在汾阳、中阳和孝义交界处的楼底村（现名西泉村，属孝义县）宣告成立。这支游击队人们习惯上叫晋西游击队。队长拓克宽（又名拓荒），政委黄子文（又名黄成章），副队长阎红彦、吴岱峰，参谋长杨仲远。下辖两个中队，分别由阎红彦、白锡林任中队长。游击队内建立了党的总支部，由杨仲远任书记，阎红彦任组织委员，黄子文任宣传委员，拓克宽任军事委员，白锡林为候补委员。党总支部为游击队最高权力机构，重大问题由党总支部决定。游击队成立时有30余名队员。

晋西游击队成立后，从楼底村转移到西宋庄（在今交口县内），以此为基地，扩大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到8月已发展到100多人。

1931年9月，敌人1个步兵师、1个炮兵团和地方武装万余人，发动了对晋西游击队的“围剿”。晋西游击队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于9月初，西渡黄河，与中共陕北特委取得了联系，改为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陕北支队。10月，与刘志丹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会合，以后成为红军第二十六军的一部分骨干力量。

1931年7月4日午夜，在刘天章、谷雄一的领导下，响起了平定兵变的枪声，高桂滋部队的1200余名官兵举行起义。经中央批准，编入中国工农红军，为第二十四军。谷雄一化名苏亦雄，担任军政治委员，赫光担任军长，窦宗融任副军长，刘明德任参谋长，刘子祥任政治部主任。红二十四军下辖两个纵队。部队经过整编，在孟县上社镇

歼灭了伪团队。原拟在五台山建立革命根据地。后考虑到这里是阎锡山的老家，驻军战斗力也较强。改在山西与河北交界处的太行山中的河北省阜平县创建革命根据地。红二十四军于7月17日攻入阜平县城后，阜平县的地下党积极配合红二十四军开展活动，发动群众参加工农红军。7月25日，红二十四军和中共阜平县委在该县旧衙门大院召开劳苦群众代表大会，参加者达1300多人。大会宣告中华苏维埃阜平县政府正式成立，并选举牛清玉（化名牛曦）为政府主席，刘应融为副主席。会上当场焚烧了地契、帐簿和文书，宣布旧政府的章法和法规一律无效，契约全部作废。

红二十四军和阜平苏维埃政府为了保卫和发展革命根据地，会后进一步健全了县政府，成立了工会、农会、农卫队、教育委员会、邮政委员会、商会、锄奸团等组织，建立了农村苏维埃政府，组织了地方游击队，办起了小学和夜校。与此同时，派人到阜平城附近的农村阶级社会状况进行了调查，为发动农民平分土地做准备。对于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恶霸地主、敌军头目，及时进行了镇压和处罚。

红二十四军的创建和阜平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引起了北方敌人的惊慌。8月初，国民党新编陆军第一师奉张学良之命“围剿”红二十四军。红二十四军领导人轻率地相信了敌人的诈降信。8月9日，政委谷雄一、副军长窦宗融同阜平苏维埃政府委员刘维康、李兰英等到王快镇去受降时被敌人拘捕。8月11日，军长赫光、政治部主任刘

子祥等 8 人又到阜平城西附近的法华村去接见“改编”的部队，除一人冲出外，其余皆牺牲。

敌人出动千余人围追向灵邱县转移的红二十四军。红二十四军从灵邱跨越晋北 9 县，在河曲县和保德县之间西渡黄河，进入陕北榆林地区。由于失去主要领导人，整个部队在陕北失散，一部分人后来参加了陕北红二十六军。

我党在山西创建红军，开辟革命根据地的工作，历时年余。虽然失败了，但却是一次极有意义的尝试。山西的共产党员逐步认识到从城市工作向农村工作转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摸索和积累了改造旧军队，建立工农武装和在农村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的经验，为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山西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

红军东征，在山西创建 根据地的斗争

“九一八”事变之后，日寇侵略中国的步伐日益加快，中华民族处于空前严重的危急关头。但是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却采取对外不抵抗的政策，对内继续加紧“剿共”和镇压抗日群众运动，激起了全国各阶层、包括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的反对，全国范围内出现了抗日反蒋斗争的高潮。在蒋介石重兵的“围剿”下，红军被迫长征。为了挽救中华民族的危亡，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8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于毛儿盖召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重申北上的方针，提出“迅速的形成为中国西北部以及全中国的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心。”9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在甘肃迭部俄界（即高吉）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了向抗日前线前进和建立模范的抗日苏维埃根据地的方针。10月，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明确提出：“目前反日讨蒋是党的主要任务”，红军要到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山西等地，“配合中国反日群众和反日游击队义勇军，共同实行对日直接的武装抗日神圣战争收复失地。”指示信强调指出：“党决定实现抗日讨蒋的任务，总的策略方针是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联合一切抗日讨蒋的力量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消灭蒋介石。”

在上述策略方针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在山西开展了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工作。当时山西统治者阎锡山从政治、经济、实业等方面，整顿建设山西，并重新整编扩大了晋绥军。经过4年的整顿建设，到1935年9月，在山西已积累了近亿元的官僚资本，修建了同蒲铁路南段大部；开矿山，办工厂，使山西的军用、民用工业自成体系；整顿了山西银行，掌握了全省金融。在群众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的情况下，为了控制和利用群众，从1932年起，阎锡山陆续组织起一批为他所用的官办群众团体。1935年底以前，是阎锡山官办的各种群众团体异常活跃的时期，也是阎锡山称山西为“模范省”时期。

1931年山西共产党组织被破坏后，1932年3月，中共河北省委决定重新组成中共山西特委，由栗志周（又名栗再温）任书记，恢复党的组织。山西特委根据山西阎锡山返晋后出现的新情况，采取新的斗争策略。乘阎锡山组织群众团体之际，大力发展群众革命组织，开展革命活动。山西的群众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但由于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影响，山西特委过分强调斗争，到1933年春，山西的共产党组织再次受到破坏。在这以后，即由王伯唐（又名王继尧）以中共太原市临时工委书记身份，领导山西党组织在困难条件下坚持斗争。1934年11月，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山西工委，直属中共中央上海办事处领导，王伯唐任书记。王伯唐接受前几年斗争的教训，把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结合起来，成功地领导了太原学生1934年暑期的反会考斗争。一批共产党员以学者身份到山西，秘密进行活动。

对于山西的这种斗争形势，中共中央一直十分关注。1935年10月下旬，中共中央以红军名义起草的红军和晋军组织“反蒋抗日民主联合战线”建议书送到太原。

这时，阎锡山正在按照蒋介石命令，积极派晋绥军到陕北协助张学良部“围剿”陕北红军。对红军发出的建议书没有任何反映。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声援，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高潮。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

议,批评了长期以来存在于党内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正确制定和阐明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了“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和“扩大红军”的方针。决议指出:为执行以上方针,“第一方面军行动部署之基础应确定地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之上,并把‘打通抗日路线’作为中心任务,拿‘巩固扩大现有苏区’同它密切的联系起来。具体步骤,即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去。”这样,山西被我党确定为创建根据地的重点省份。

在山西独揽大权的阎锡山同日本侵略者的渊源很深。华北事变后,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逐步掀起高潮。阎锡山对于群众抗日救亡运动采取镇压政策,使太原的学生爱国救亡运动遭到挫折。阎锡山与土肥原贤二进行秘密谈判,同意日本方面提出的在太原、绥远和大同设立日本特务机关的要求。我党通过多种渠道同其联络,但阎锡山拒绝同我党我军合作。中共中央下决心以武力到山西打开局面,开辟创建根据地,打通抗日路线。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渡河东征。1936年1月15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彭德怀发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1月31日,毛泽东、周恩来在陕北延长县召开中共中央军委军事会议,研究讨论

了红军东征的战略方针和军事部署。会上，毛泽东指出，过河之后，我们首先要在吕梁山区建立根据地。这样，进，可以到抗日的前线，以山西东部、河北西部和平汉路两侧为依托，开展活动。而目前在河北的阜平、高阳、蠡县已有我们的游击队，可以互相配合，壮大革命力量，扩大统一战线，扩大我党的政治影响，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退，则有陕甘苏区作支撑，把革命大本营放在陕北，养精蓄锐，以待时机，挑起救国救民的重任，完成中国革命的大业。会议正式决定组成“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团”，由彭德怀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总政委，叶剑英任总参谋长，杨尚昆任总政治部主任。下辖左、中、右三路大军：红一军团为中路军，红十五军团为右路军，红十五军团的红二十八军为左路军。2月20日，东征红军强渡黄河，突破阎锡山河防部队的防线进入山西，并于当天发起进攻。红一军团在中阳县三交歼晋绥军一个营后，占领了留誉镇（今属柳林县），红十五军团从石楼县转角、咀头、辛关等地登岸向东进占义牒，直攻石楼城。

红军突然发动进攻，并进入山西向东挺进的消息，使阎锡山极为恐慌。2月22日，急电在南京的晋绥军“剿匪”总指挥孙楚星夜返防，指挥黄河沿线晋西一带的晋绥军阻击东征红军，并将在黄河西岸的晋绥军撤回东岸，参加阻击红军的战斗。23日，蒋介石下令调洛阳、徐州、浦口等国防要地重兵20余万入晋协助晋绥军阻击红军，同时命令东北军、十七路军进扰红军后方。

在蒋、阎军匆忙调集部队期间，东征红军已深入山西 -

境内。2月24日，红军东征总指挥部在石楼西卫召开会议，具体部署红军入晋后在吕梁山区创立革命根据地，开展赤化、扩红、筹款三大工作。会后，在东征红军到达的北起中阳县、南到永和县的大区域内，开始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工作。红军首先在晋西游击队曾活动过的中阳县，派曾任晋西游击队领导的阎红彦同黄石山在三交镇（今属柳林县）成立了“中阳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及工会、妇联、青年团、贫协会等群众组织。开展打土豪、斗地主、分财物、扩充红军等工作。成立了中阳县游击大队，选送了大批青年加入红军。周恩来在三交镇接见了中阳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文才（当地石滩则村人）、副主席黄石山及党支部负责人贺天云等。随同东征红军的中共中央山西地方工作委员会（主任张浩，副主任李富春），配合杨尚昆领导的总政治部，以及从中央党校抽调的60名干部组织的地方工作队，在东征红军所到之地，从中阳、石楼到隰县、灵石、孝义、永和等地展开了创建根据地的工作。以后，随着红军北上离石、临县、兴县、岚县、岢岚、保德，东进汾阳、文水、交城、清源、太原县（今晋源镇、晋祠镇、太原市南郊区一带），南下大宁、蒲县、吉县、乡宁、河津、霍县、汾西、赵城、洪洞、古县、临汾、襄陵、曲沃、侯马、翼城、新降、浮山、稷山等县，发动组织群众的工作在晋西、晋中、晋南各地纷纷展开，使创建根据地的工作逐步开展起来。在这些地区内，相继成立了苏维埃政府，秘密建立了共产党组织，参加红军和地方游击队的青年越来越多，大大壮大了红军的声

势。

3月6日，毛泽东在孝义县大麦郊（今属交口县）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东征红军第一期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毛泽东4月2日在一封致林彪的电报中指出，红军的任务是使一方面军在数月内扩至5万人以上。在华北，首先是在山西经过游击区阶段创造比陕北更大的根据地，建立模范的人民政权，成为号召全国革命的中枢。目前阶段的基本战略方针，是在山西战胜敌人，造成抗日根据地，把山西与陕北联系起来，不但包括晋东南，还包括晋西北、晋西与晋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与敌后游击战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1月版，第108页）。

但是，中共中央关于在山西创建根据地的战略部署，由于情况的变化而未能实施。

在红军进入山西之后，阎锡山电请蒋介石派兵援助。蒋介石乘机派兵进入山西，在太原成立了晋陕绥宁四省“剿共总指挥部”，准备在山西与红军展开一场大战。驻华北的日本侵略军诡称：红军东征对他们是直接威胁。也派人与阎锡山联系，要派兵进入山西攻打红军。日本陆军省并于3月12日起草了《关于防止山西赤化》的命令，要傀儡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派兵到山西，要日本方面向山西提供贷款、武器、弹药，派遣军事顾问，援助阎锡山进攻红军。阎锡山在蒋介石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颁布了《查禁共党入境办法》，在全省范围内疯狂地捕抓杀害共产党员和革命进步群众。如果战事扩大，山西就将成为蒋介石

石“围剿”红军的大战场，和日本侵略者借故侵犯的地区。这样不仅不利于中国抗日力量的团结合作，而且势必消耗红军力量，消耗中国抗日力量，给山西人民带来更大的损失。

其次是我党为团结国内一切力量抗日，正由反蒋抗日向逼蒋抗日转变。从1935年年底开始，国共两党就联合抗日问题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秘密接触。特别是我们党同张学良的联系，在1936年春已有实质性的进展。东征期间（4月9日）周恩来同张学良举行会谈。会谈中，张学良提出把反蒋抗日的口号改变为逼蒋抗日。通过会谈，双方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4月13日至15日，中共中央在永和县赵家沟召开会议，决定“回师西渡，逼蒋抗日”。于5月上旬撤回陕北。

红军东征回师陕北，虽然在山西创建根据地的目标未曾实现，但从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促进全国一切抗日力量的团结合作，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这个大局来看，是一个英明的决策。红军东征在山西播下了革命和抗日的火种，为其后我党与阎锡山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再度渡河东征，到山西创建抗日根据地，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正如周恩来在1935年5月在《东征胜利与我们》的报告提纲中指出的，红军东征“争取了抗日根据地向东扩大的先机”。

统一战线的建立开辟了在山 西创建根据地的良好前景

红军东征回师陕北后不久，即将在东征中俘虏的阎锡山的部下晋绥军三九二团团团长郭登瀛放回去，带去毛泽东1936年5月25日给阎锡山的亲笔信，要阎锡山走联共抗日的路，同共产党合作抗日。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军委华北联络局通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朱蕴山，到太原会见阎锡山、转达我党愿同阎锡山联合抗日的意愿。

1936年5月，朱蕴山以中国民族革命大同盟华北办事处主任的身份，被阎锡山派梁化之从天津邀请到太原，住在阎锡山家中，同阎锡山秘密会见。朱蕴山向阎锡山分析了全国和华北的形势，明确提出阎锡山应走联共抗日的道路。向阎锡山建议：在红军已经撤回陕北的情况下，应取消以反共为宗旨的组织，取消对陕北红军的封锁，组织一个抗日的群众团体，参加民族革命大同盟。阎锡山认为朱蕴山讲的有理，可以考虑。

阎锡山在听了朱蕴山的意见不久，接到毛泽东的亲笔信。如何处置共产党提出的联合抗日的建议，成了阎锡山在1936年夏秋集中考虑的问题。

红军东征军西返后，蒋介石的部队驻扎在晋南一带，与国民党兰衣社和其他势力一起，支持晋南的反阎势力，公开搞“河东独立”运动，策划从阎锡山的统治下分离出

去。这时，日本方面也继续加紧向阎锡山施加压力，要阎锡山在华北同日本侵略者合作。阎锡山同蒋介石、日本之间的矛盾加剧。3月，刘少奇到天津主持北方局的工作。通过多种关系，做阎锡山上层人物的工作。

1936年8月，阎锡山邀请朱蕴山赴太原，再一次听取了由朱蕴山转达的关于共产党愿意同阎锡山联合抗日的意见。阎锡山在几经犹豫之后，表示愿意同共产党合作抗日。他表示：一、同意取消以反共为宗旨的防共保卫团。二、取消对陕北红军的封锁，今后也不再提“剿共”等字眼。三、成立一个以抗日为宗旨的山西自己的独立的群众团体。

1936年9月18日阎锡山在太原成立了牺牲救国同盟会（以下简称“牺盟会”）。亲自任会长。在27名执行委员中，有共产党员、左派进步青年和阎锡山集团中主张走联共抗日道路的人上多人。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成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在向党内发出的《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中，提出我党“立刻准备派代表出去，或接受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到苏区来，以便进行谈判。”并要“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从8月到9月，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接连向同我党有各种联系的国民党要人写信，力促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形成。在上述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在联共抗日方面采取了三项重大的行动。

第一项是邀请当时尚关押在北平草岚子监狱山西籍有名的共产党员薄一波回山西，并允许薄一波带领一批共产

党员和进步青年到山西，在牺盟会内工作，在山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第二项行动是1936年10月，阎锡山同张学良一起坐飞机抵洛阳，当面向蒋介石“进谏”，劝其实行联共抗日的政策。

第三项行动是发动绥东抗战，令驻守在绥远省的三十五军军长、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向日本侵略者支持的伪蒙军发起进攻。阎锡山为了表示对绥东抗战的支持，拿出87万元的私款做为援绥款。绥东抗战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信心，尤其是推动了山西的抗日救亡运动，使山西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

西安事变后，我党实行联蒋抗日的政策。中共中央代表彭雪枫同阎锡山的代表梁化之通过秘密谈判，达成晋陕通商与我方在山西设立电台的协议。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前，山西的抗日救国运动已经大规模地开展起来。阎锡山在山西停止了捕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陆续释放了在押的包括王若飞在内的共产党员、红军和进步人士，停止了反共宣传。中共中央北方局又向山西增派了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和大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进步青年，在薄一波领导的牺盟会及开办的军政训练班和民训干部教练团中工作、学习。在这一时期，全国有22个省、市和华侨青年4000余人来到山西，大大壮大了山西的抗日救国声势。牺盟会的组织发展到全省城乡广大区域，大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担任了牺盟会的各级领导。同薄一波同时到山西的张友清，担任了中共山西省工委书记

记后，利用山西出现的大好形势，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使多次遭到破坏的山西共产党组织，恢复和发展起来。在北方局的领导下，山西的共产党组织彻底摆脱了“左”倾路线的束缚，适应抗日救国形势的要求，进入了大发展时期。正如刘少奇在评价这一时期的工作时指出的：

“这些成绩，为党与八路军在华北抗战创造了比较顺利的工作条件与发展条件。”（《刘少奇选集》上卷，第251页）

山西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中国军队奋起抗击，开始了全国的抗日战争。

7月28日，阎锡山在给毛泽东的回信中表示：“国事危急，赖非集合全国财力人力，不足以度此难关。愿与先生同赴国难。”7月31日，阎锡山正式通知彭雪枫，可以用红军和中共代表名义公开进行活动。8月18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十项条件给朱德、周恩来、叶剑英的指示》中，要朱、周、叶等在南京参加国民党国防会议的代表向国民党方面提出“第一批出动红军使用区域在平汉线以西、平绥线以南地区，并受阎百川（即阎锡山）节制”等意见。通过谈判，国共两党达成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去对日作战的协议。

为了在日本侵略者进攻华北的紧急形势下迅速部署我

党的工作，北方局书记刘少奇于1937年7月28日从延安赶到太原。随后，北方局其他领导人杨尚昆、彭真、朱瑞、林枫等也到达太原，直接领导山西的共产党组织和在阎锡山上层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为红军再次进入山西，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从多方面进行准备。

1937年8月洛川会议后，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朱德、副总指挥彭德怀、副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从8月下旬开始到9月，八路军陆续开上山西抗日前线。9月5日，周恩来、彭德怀等到太原，当晚赶到晋北崞县雁门关下的太和岭口（今属代县）阎锡山的前线司令部，同阎锡山商谈八路军进入山西后的活动地区、作战原则、指挥关系、补充计划等问题。经过多次谈判，商定八路军到山西后，在晋东北恒山山脉的灵丘、五台地区及河北阜平、涞源地区活动，抗击日军的入侵，开展游击战争，创造以太行山脉为依托的根据地。周恩来还同阎锡山达成了国共联合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动委会）的协议。周恩来、彭德怀同阎锡山的谈判，奠定了国共合作在山西开展抗日斗争，创建敌后根据地的基础。

根据整个华北战局的变化，中央军委在9月17日给八路军的电报中说：“为战略上展开于机动地位，即展开于敌之翼侧，箝制敌之进攻太原与继续南下，援助晋绥军使之不过于损失力量，为真正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广泛发动群众，组织义勇军，创造游击根据地，支持华北游击战争，并为扩大红军本身起见，拟变更原定部署，

采取如下之战略部署：

（一）我二方面军应集结于太原以北之忻县待命，准备在取得阎之同意后，转至晋西北管涔山等地区活动。

（二）我四方面军于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活动。

（三）我一方面军则以自觉的被动姿势，即时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如敌南进，而友军又未能将其击退，则准备依情况逐渐南移，展开于晋东南之太行、太岳两山脉中。

（四）总部进至太原附近，依情况决定适当位置。”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1981年12月版，第83—84页）

八路军在山西的部署改变后，各支战略部队陆续于1937年9月到10月，进入指定地区。首先是一一五师于9月中旬到达晋东北地区，主力在林彪、聂荣臻的带领下集结到平型关以西的大营地区。平型关大捷后，一一五师转回五台县，同在这里的八路军总部一起，准备创建晋东北根据地。

继一一五师出师后，一二〇师于9月中旬到达太原附近。下旬，一二〇师师部率三五八旅到达晋西北的神池地区，三五九旅奉命开赴五台、平山地区，三五八旅七一六团到雁北地区，开始展开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的工作。10月1日，关向应率700余人的工作团到达岢岚地区，然后分赴兴县、临县、静乐、岢岚、偏关、朔县、宁武、忻县、神池、五寨、河曲、保德等县，发动组织群众，进行建党建军和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八路军在山西创建根据地

的工作，最早部署的是晋西北地区。

9月底，八路军一二九师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10月中旬到达晋中地区，主力进到正太路阳泉平定一带。

就在一一五师，一二〇师开进山西时，刘少奇亲自领导北方局、山西省地方党组织在山西开展创建根据地、进行抗日游击战争的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北方局机关到太原后，为加强对山西省地方党组织的领导，北方局派林枫担任了山西省工委书记，同张友清一起领导省工委的工作。北方局还建立了由杨尚昆、林枫、赵林、康永和等组成的高级党团，负责组织山西工人抗日武装。在此期间薄一波根据北方局指示，向阎锡山提出组建山西新军的提议，得到了阎锡山的同意。遂于1937年8月10日以原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各一部组成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由薄一波任政治委员、牛佩琮任政治主任。阎锡山派旧军官担任了各级军事指挥职务，总队长为杜春沂。至10月上旬先后组建起四个总队和工人武装自卫总队（简称工卫队）。决死队以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为骨干，是山西地方武装中抗日热情极为高涨的部队。

由周恩来和阎锡山谈判决定国共联合成立的动委会，经过紧张筹备后，于1937年9月20日在太原正式成立。动委会是一个统一战线性质的组织，由共产党、八路军及晋绥察三省省政府、各军队、各群众团体的代表组成，日常事务由常务委员会领导。共产党方面派出邓小平、彭雪枫、程子华、南汉宸参加领导工作。阎锡山方面派出薄右

丞、梁化之、王尊光、郭宗汾参加领导工作。主任委员经协商由续范亭担任，副主任委员由杨集贤担任。组织部长为南汉宸，副部长为梁化之。宣传部由李公仆、薄右丞分别担任正副部长，两人均未到职。乃由共产党员赵宗复任副部长，实际负责。赵宗复离开后，宣传部、组织部的工作由南汉宸负责。关键的人民武装部由程子华任部长，阎锡山派了郭宗汾任副部长，未到任。动员分配部名义上是山西省政府秘书长王尊光兼任，也未到任，实际由副部长武新宇（共产党员）负责。除奸部长是郭任之。9月下旬，动委会总会派邓小平、罗荣桓、刘奠基为晋东北区特派员，派罗贵波、曾三、张干臣为晋西北区特派员。开始，动委会在晋北18县和察南5县、绥远全省等日军侵占区工作，后随着日军向南推进，工作范围逐步扩大。

8月初，北方局书记刘少奇向各地党组织发出指示信，要求各地普遍发动游击战，加紧统一战线工作。9月下旬，刘少奇为动委会起草了《人民自卫军的组织条例》。10月下旬，起草了《山西农民会的章程（草案）》，为发展人民抗日武装，组织发动农民参加抗日斗争，提出了组织实施纲领。

1937年10月1日，在日军从晋北南下攻取太原的前夕，阎锡山为了适应当时的形势决定将山西全省105个县划分成7个行政区，分块进行领导。每个行政区设政治主任公署，公署的政治主任代行省政府职权，有一定的独立性，可以直接委派县长。第一行政区辖晋东北以五台县为中心的17个县，第二行政区辖晋西北以岢岚县为中心的17

个县，第三行政区辖晋东南北部以沁县为中心的13个县，第四行政区辖晋西北临县为中心的16个县，第五行政区辖晋东南南部以长治为中心的12个县，第六行政区辖晋西以隰县为中心的15个县，第七行政区辖晋南汾河以南的19个县。薄一波根据上级的指示，征得阎锡山的同意，被任命为第三行政区政治主任，率领决死一总队去晋东南，以配合将要到晋东南的八路军129师开辟根据地。根据在山西全省开展游击战争的部署。其他新军（决死第二总队、第三总队、第四总队和工卫总队）在10月份也陆续到达各个地区，参加创建根据地的工作。这样，在牺盟会、新军中的共产党员，随着牺盟中心区、全省行政区的划分和各支新军部队开进各自活动区域，基本完成了分散到全省各地的部署，开始了在全省各地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的工作。

10月8日，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军分会（8月23日成立，朱德任书记，彭德怀任副书记）根据山西全省已经开始创建根据地工作的形势，在《对目前华北战争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中，明确提出：“我们在积极行动中，必须加强对地方群众工作的领导，创造太行山、恒山山脉及晋西北地区的抗日根据地。”（《朱德年谱》第174页）为进一步部署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刘少奇在太原召开了华北地区各地方党委负责人会议，对各地的工作进行了部署。10月16日，刘少奇以陶尚行名义发表《抗日游击战争中各种基本政策问题》，根据洛川会议上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我党的基本方针政策，从理论上阐述了开展游

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的若干问题，为在华北敌后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和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指明了方向，提出了具体办法和政策。

根据当时山西战局和华北战局的发展情况，中共中央已预见到日军将占领太原以至华北。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是：“战略上以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使敌虽深入山西，还处在我们的游击战争的四面包围中”（《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84—85页）。整个华北工作，“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同上，第85—86页）

1937年10月份，中共中央采取两项措施：一是将山西的地方共产党组织，按照将创立的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4块敌后抗日根据地，重新组建了4个省一级的地方共产党领导机关；二是将八路军主力配置于以上4个战略区，同地方共产党组织相配合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

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分别领导落实了以上两项重大组织措施。

一一五师于9月中旬挺进晋东北后，北方局就决定从一一五师调王平、从山西省委调李葆华（当时叫赵振声）、从平汉线省委调刘秀峰，组成中共晋察冀临时省委。一二九师于10月中旬到达晋中平定，北方局决定撤消平汉线省委，调平汉线省委的李菁玉、李雪峰和山西省委的徐子荣，组成中共冀豫晋省委。一二〇师于10月初到晋西北后，北方局委托关向应组建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从

一二〇师调罗贵波、从山西省委调赵秉彝、赵中池、从太原市委调赵林组成。原山西省委由林枫、张友清、张稼夫及从一一五师抽调的黄骅组成，准备随阎锡山总部行动，仍称山西省委。

在太原失守前夕，按照中共中央决定，八路军总部从五台地区南移，在11月7日到达太行山中的山西和顺县石拐镇。太原失守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即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转刘少奇、杨尚昆、彭真，提出在敌向山西内地进攻形势下八路军军事部署，指出：“在华北正规战争业已结束，游击战争转入主要地位”，“分任四大区工作之聂部、贺师、刘师、林师（林师应即移至吕梁山脉须重新部署一番）部署纲领，以控制一部为袭击队，大部尽量分散于各要地，组织民众武装为第一义。”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第374页）根据这一指示，当日，朱德、彭德怀即致电林彪、刘伯承、徐向前，命一一五师直属队和三四三旅于10日开始南进，转移到吕梁山脉创建抗日根据地；一二九师创建晋东南抗日根据地。13日，毛泽东在致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中，再次强调指出：“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同上，第377页）

从1937年11月中旬开始，八路军主力向山西四大战略

区开进，全面展开了创建各块根据地的工作。

一一五师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部约2000余人在五台山地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11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察冀军区，任命聂荣臻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这是我党在华北敌后最早成立的敌后军区。在华北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鼓舞了敌后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军区以五台山为基地，乘着日军向南推进，后方空虚的机会，在晋、察、冀三省边界的北岳区，分兵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的工作。11月13日，八路军总部决定在北岳区成立隶属于晋察冀军区的4个军分区，形成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最初的规模。11月，北方局决定正式成立中共晋察冀省委，调黄敬任省委书记，王平改做军事工作，省委同军区住在一起。军区和省委刚刚在阜平安定下来，日军就于11月24日开始调集两万多兵力，从平汉、平绥、正太、同蒲等铁路沿线，分八路围攻刚创立的晋察冀根据地。军区依靠新组建的游击队，歼敌千余，至12月下旬粉碎了敌人的围攻。在反围攻中，按照刘少奇10月20日给聂荣臻电报中提出的筹建晋察冀边区政府委员会，由宋劭文担任主席的意见，筹建工作紧张地进行。经国民党中央政府批准，在粉碎八路围攻后，于1938年1月11日在阜平召开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15日结束，民主选举出了华北敌后第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合政府——晋察冀边区临时行政委员会（即晋察冀边区政府），推选山西第一行政区政治主任宋劭文为主任委员，盂县县长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委员中还包括聂荣臻、刘奠基（阎锡山山西人民监政会秘

书长）、吕正操（冀中人民自卫军司令员）、孙志远（冀中人民自卫军政治部主任）、李杰庸和娄凝先（均为牺盟会代表）。晋察冀边区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创建阶段工作任务的基本完成。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从1937年10月1日关向应率一二〇师地方工作团到达后，即开始展开。太原失守前，在晋西北14个县中，地方工作团协同当地动委会、牺盟会已组织起万余人的游击队、脱产自卫军，并以一部补充了一二〇师。太原失守后，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指定一二〇师在晋西北长期坚持斗争，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关向应受北方局委托，在岢岚领导成立了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书记赵林、副书记罗贵波。一二〇师从11月起，将主力分散配置在大同、雁门关、忻县、太原以西，北起左云、右玉、清水河，南至汾（阳）离（石）公路的广大地区内。以宋（时轮）支队继续在朔县以北、大同、怀仁以西地区，三五九旅主力分布在雁门关、崞县、忻县以西地区，三五八旅从北南下，到忻县、太原以西、交城以北山区，分散开展游击战争，掩护派出的地方工作团开展工作。在交城以南日军尚未到达地区，地方工作团和一二〇师其他部队同时向南扩展，一直到汾离公路沿线。10月下旬，动委会总部从太原撤出时，征得阎锡山的同意，到晋西北去创建根据地。11月中旬西进到离石，在晋西北、雁北及绥远、察南等59个县陆续展开了活动。动委会是国共合作成立的公开的统一战线组织，为半政权性质的机构，在许多县旧县长逃跑、旧县政府垮台的情况下，实际上代替了政权工

作。在动委会总部驻离石的3个月内，组织了8支游击队，人数发展到8000余人。决死四总队太原失守前，已到临县、兴县、方山一带活动，工卫队到了太原西南至汾阳一带活动。这样，在晋西北地区，由一二〇师主力、动委会组织的游击队和决死四总队、工卫队等抗日部队，形成了创建抗日根据地的主力部队。到1938年2月，一二〇师已由8200余人发展到25000余人。决死四总队在1938年1月扩大为决死四纵队，下辖3个总队。1938年2月下旬，日军集中了万余人分路向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发动了首次围攻，并占领了宁武、神池、五寨、岢岚、偏关、河曲、保德等7个县城，刚刚开辟的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受到严重威胁。从3月上旬开始，一二〇师主力同在晋西北的各支抗日武装部队，包括阎锡山的赵承绶骑兵军和郭宗汾部，相互配合，经20余天的战斗，收复了7座县城。这次反围攻战的胜利，奠定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创建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由一二九师（包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中共冀豫晋省委，同薄一波、戎子和领导的牺盟会、决死队相配合，在太原失守后全面展开。在山西正太路以南、同蒲路以东的晋东南地区，牺盟会的工作开展的比较好。在一部分县的县长不愿担任抗日县长的情况下，征得阎锡山省政府同意，由牺盟会员担任了抗日县长。一二九师师部到平定后，派秦基伟同在榆次八路军办事处的赖际发一起，率教导团一部，到太谷、榆次、寿阳、平定、昔阳、和顺等地，同地方党组织结合，组织游击队，发展地方武装。石拐会议后，一二九师师部进到

太行山中的辽县（今左权县），由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组织部长王新亭、宣传部长刘志坚等，率领地方工作团和步兵分队，到晋东南长治、晋城、沁县、安泽等10余县开展工作。

这时，薄一波率领的决死一总队已改编成决死一纵队，进到沁县。薄一波就任第三行政区政治主任，以沁县为中心，领导第三区13个县的工作。决死三总队在太原失守后不久，改编成决死三纵队，仍由戎子和任政治委员，调董天知担任了政治部主任，在曲沃地区活动。在一二九师分兵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的同时，冀豫晋省委派李雪峰同徐子荣从北往南视察地方党组织的工作。同时帮助各县恢复和组建党组织。到1938年3月底，晋东南地区各县都已建立起县委或县工委，并组建了晋中、晋东南、冀晋（包括冀西部分县）、晋豫（包括豫北部分县）、冀豫特委（山西部分只有黎城一个县），并在沁县成立了省委办事处。

正当创建晋东南根据地的工作全面展开时，日军于12月22日集中了两千余兵力，分六路向活动在寿阳以南的一二九师主力进行围攻。刘伯承师长采用内线作战，外线配合的反围攻战术，仅用了5天时间，就粉碎了围攻，打下了创造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第一块基石。

1938年4月10日，日军以3万余兵力，分九路向晋东南根据地发动围攻。晋东南的抗日部队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歼敌4000余，收复了18座县城后，于4月27日粉碎了九路围攻，保卫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奠定了以太行

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基础。月底，由一二九师参谋长倪志亮兼司令员、师政治部副主任黄镇任政治委员的晋冀豫军区正式成立。

5月4日，张闻天、刘少奇向邓小平、朱瑞、李雪峰并朱德、彭德怀发出《关于在粉碎敌人九路进攻后晋东南工作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在粉碎敌人九路进攻后，晋东南目前的中心工作，应是从事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要省委机关、薄一波领导的第三行政主任公署同北方局驻冀豫晋省委代表朱瑞都靠拢八路军总部。此后，八路军总部由武乡到沁县南底水驻扎，省委也到沁县南底水，同在沁县的第三行政主任公署相配合，开始了巩固、建设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在晋西南地区创建吕梁山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是中共中央改变八路军在恒山山脉集中创建根据地的战略部署时，开始提出部署的。1937年9月17日，毛泽东在改变八路军部署的电报中要四方面军“于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活动”。太原失守的当天，毛泽东在给周恩来及八路军在山西前线的将领的电报中强调指出：“吕梁山脉是八路军的主要根据地，但其工作尚未开始，因此，不但徐旅须立即迅速转移，林率陈旅亦不应在东边恋战。亦以立即开始转移为宜。”“转移后徐旅以汾阳为中心，陈旅以蒲县为中心为合宜，总部宜立即开始西移。”根据这些指示，太原失守前，八路军总部和一一五师就开始向吕梁山进发。八路军总部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率领政治部机关和随营学校于10月下旬即到达汾阳、孝义一带，11月中旬到孝

义县。以兑九峪、大麦郊一线为中心，在吕梁山下的孝义、平遥、六休和吕梁山上的永和、石楼、蒲县、隰县、大宁等八县开展工作。11月下旬，林彪率一一五师师部和三四三旅到赵城地区，1938年1月上旬，罗荣桓率师政治部到赵城同林彪会合。阎锡山令一一五师在吕梁山东边的汾西、汾阳、孝义一带展开工作，未能进入吕梁山。此时，阎锡山的总部从太原已撤到临汾。北方局、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山西省委也随着撤到临汾。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李大章、林枫等领导人都到了临汾。12月下旬，朱德、彭德怀率八路军总部到洪洞，驻扎在马牧村。总部到后，邓小平率政治部机关归还总部建制。在临汾，阎锡山同共产党、八路军关系较为密切，晋绥军在此时士气不振，战斗力也不强。到临汾后，阎锡山开办了民族革命大学，向晋东南、晋南、晋西南委派了一批牺盟会员担任县长，成立了由杨爱源任总指挥的新军总指挥部，将新军决死队扩编为4个纵队，向各纵队发了100万发子弹、200挺轻机枪及其他物资，武装了新军。阎锡山还批准牺盟总会提出的《山西省民族革命十大纲领》公布实行。在临汾、赵城、洪洞一带活动的决死二总队，在1937年11月间扩编为二纵队，人数发展到4000余人。纵队政治委员张文昂，纵队长崔郁，政治部主任韩钧。一一五师师部和八路军总部到洪洞、赵城后，抽调了一批八路军干部到二纵队去，加强了二纵队的政治、军事力量。张文昂兼任山西省第六行政区政治主任，使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在合法的条件下进行。

1938年2月，日军发动晋南战役，于28日占领了临汾。临汾失陷后，阎锡山总部退至吕梁山中的吉县。北方局、山西省委也进入吕梁山中的乡宁，八路军总部东进到太行山中。临汾战役中，一一五师主力进入吕梁山，在孝义兑九峪、楼底、田家铺三次伏击日军，歼敌400余人。3月中旬，一一五师主力在吕梁山中隰县、大宁、蒲县相交的午城地区歼敌千余，取得了午城战役的胜利，稳住了晋西南地区的局势，为创建吕梁山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4月2日，中共中央向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林彪于2月被晋绥军误伤离职）、罗荣桓、杨尚昆发出关于加强晋西南统战工作的指示，要一一五师全面开展晋西南的统一战线工作。根据这一指示，罗荣桓亲自帮助决死二纵队进行了整军，协助第六行政主任公署加强了政权工作和群众团体工作。

5月中旬，杨尚昆、林枫从延安回到孝义县北方局驻地碾头村，在西宋庄召开了晋西南地区党的领导干部会议，会上宣布将中共山西省委改称为中共晋西南区党委，由林枫担任区党委书记。会议还决定成立洪赵、隰蒲、乡吉、中离特委和汾孝中心县委。此后，晋西南区党委同一一五师师部共同领导了创建吕梁山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1938年5月，八路军三大主力部队在山西全省，同地方共产党组织相配合，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晋东北、晋西北、晋东南、晋西南四个战略区内，以共产党、八路军为主体创建起来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支持了山西以至华北的抗战局面，成为我党在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华北坚持持久抗战，发展人民革命力量的落脚点和出发地。以山西为基地创建起来的晋察冀、晋绥和晋冀鲁豫三大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成为全国抗日的重要的战略基地。

从1931年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创建工农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尝试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始，经过1936年红军东征再次创建山西根据地的实践，到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在山西全省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1938年5月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初步建成，前后经历了近7年时间。这一历史过程，不仅反映了我党所走的道路，也说明了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坚持武装斗争，建立统一战线，在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乡村建立革命根据地走以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才能最后战胜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夺取全国胜利。

厦 门 劫 狱

中共厦门市委党史办公室

编者按：1930年5月25日的厦门劫狱，是中共福建省委领导的以营救狱中40余位难友（许多是省委党团领导骨干）为目的并取得完全胜利的一次斗争。对于这次斗争的叙述和认识一直存在着分歧。当年形成的《福建省委关于劫狱工作报告》，记叙了劫狱斗争的目的、组织及行动过程，是一份重要的史料。但是这个报告是在事件发生一个多月之后写的。这时，立三关于《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左”倾错误指示已经下达，因而报告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立三“左”倾错误的影响，其中的一些内容与事实有出入。1987年，中共厦门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对厦门劫狱斗争进行了认真的调查研究，弄清了真象。事实说明：当年为革命利益营救难友而采取的劫狱行动是正确的，经验是可贵的。

1930年5月25日，中共福建省委（机关设在厦门）在厦门领导进行了一次劫狱，救出了狱中40余位同志，自己无一伤亡，这一胜利，在福建革命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章。

一、劫狱的提出与准备

1930年初，在厦门市思明县政府内的思明看守所，关押着我党的许多同志，他们是中共厦门市委书记刘端生、福建团省委书记陈柏生、在国民党厦门市党部工作的共产党员谢仰堂夫妇以及闽西苏区平和、永定、上杭、龙岩等地的苏维埃干部、红军游击队员等共计40余人。狱中的共产党员成立了以刘端生为书记的临时党支部，领导难友开展斗争。狱中部分难友认为，看守所内管理腐败，防范不严，要求省委同意他们越狱。省委对狱中同志的建议作了严肃、认真的讨论，认为革命斗争急需干部，设法营救被囚同志是组织应尽的责任。同时也认识到，厦门是福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一个重要城市，四面环海，敌人控制严密，举行越狱是十分困难的。此时有消息说，看守所内的犯人将被全部解往福州。果真如此，营救工作将会更加困难，情况变得更加严峻。省委在决定劫狱之前，对厦门的地理环境、政治、军事情况作了深入的调查、分析和研究。

首先是军事情况：厦门岛上驻有海军陆战队二个营。第一营驻禾山，离看守所有10多公里，经集合出动到看守所，大约要1个半小时。第二营驻磐石，同看守所相距约1公里，从发现情况、下命令、集合，跑步到看守所，只要30分钟。还有保安队20余人，侦察队40余人，他们在白天都有执勤任务，不容易集合起来；警备司令部有卫队一

个排，其职责是保护司令部，不能调出使用；炮台的炮兵不能用；普通的警察通常不带武器。真正构成威胁的是驻在磐石的一营海军陆战队。

其次是看守所内的情况；看守所设在思明县政府院内，县政府大门口有2个武装门警，院内有一支36人的警备队，除队长佩带手枪外，其余都是单响毛瑟步枪，平时人枪分开，把枪挂在警卫队部的墙上，这是距看守所最近、威胁最大的武装力量。看守所有所长1人，看守长2人，看守6人，另有传达、伙夫、杂役等共20人，只看守长有一支短枪。

从县政府大门至牢房有四道门。第一道门是县政府大门，日夜开着。第二道门是进看守所的大铁门，有卫兵看守，上午8时至下午5时，可以叫开门进去探监，进去后便把铁门锁上。第三道门是木门，平时关着不上锁。第四道门，便是关押“政治犯”牢房的门，经常上锁，不轻易开放，“犯人”与外面的人互相不能越界。

监狱管理平时比较松懈，看守人员警觉性不高，作风腐败，只知敲诈，贪小便宜。犯人的亲友，每逢星期三、六可以探监，允许探监人送东西，也可以直接到牢房的外边同犯人谈话，探监人能把监房里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星期三、六以外的时间，只要给看守人员措点油水，送些礼物，找个借口，加说外地来的，急于回去，也允许探监。

经过调查，情况明了。福建省委经多次讨论，认为劫狱虽困难，但有许多有利的条件，有成功的可能和把握。

于是做出了破狱营救战友的决定。

劫狱的决心一下，省委就开始了各项准备工作。3月底，中共福建省委决定由省委书记罗明、军委书记王海萍、组织部长谢汉秋（谢景德）、军委秘书陶铸和团省委书记王德5人组成特别委员会，由互济会主任黄剑津任秘书长，并组织了特务队和接应队。

特务队由陶铸负责。从闽西根据地调了2名红军战士，共组织13人（后来只确定11人参加劫狱）。现有据可查的，他们是陶铸、王占春、黄琬、林雪榕、白文庆、“客古”和谢××等。

为了对特务队进行严格的政治、军事和纪律训练，特别委员会在鼓浪屿开设训练班，陶铸任训练班主任。训练班于4月中旬开办，课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讲政治形势，由特别委员轮流讲课。参加训练班的除特务队成员外，还有少数可靠的进步青年。讲课内容从当时蒋、冯、阎军阀混战入手，分析当时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的革命形势，阐明蒋介石必败，共产党必胜的道理，使训练班的学员认清形势，提高觉悟，增强斗争的勇气和决心。这一阶段，讲课和讨论结合进行，大约花了2个星期时间。第二阶段是军事训练，由陶铸全面负责。参加者只限于特务队的成员。他们先在室内学习枪枝性能，掌握拆枪、安装、卡膛处理等技术。待队员基本掌握用枪要领之后，陶铸又把队员分成二组，带到山沟里学习瞄准、射击、实弹演习，使队员能灵活、熟练地使用手中武器。

接应队有10余人，大多是进步青年学生和狱中难友的

家属亲朋，他们的任务是准备引导出狱难友到指定地点免致散失。

经费方面，由省委、互济会和难友筹措将近600元，闽西苏维埃政府支持1200元，购卖了8支手枪和一些子弹，使特务队有足够的武器和弹药。

为了熟悉狱中情况，特别委员会和特务队员，每人均以亲属探监的名义去过监狱两次：了解县政府卫队和看守人员的生活规律、人员分布情况，勘察狱中的道路门径，做到对从这条路到那一个门，要走几步路，需要多少时间都了如指掌。

在进行各项准备工作的同时，酝酿、讨论制定了一个周密，严谨的破狱计划，并与狱中难友进行了充分讨论。起初，狱中支部认为特务队没有足够的火力控制狱中警备队，主张打开监狱之后，从看守所的后门出去，因后门一出去就是山，利于分散隐蔽。若贸然从前门出去，遇上警卫队的拦截，有全被打死的危险。特别委员会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从后门上山，虽易逃出监狱，但敌人会凭借他们发达的交通工具，强大的武装力量，将山上的各个路口，以至整个厦门都严密地封锁起来，那时，出狱的同志势必再次被捕。只有以快捷的速度，抓住时机，压制住敌人警备队，将出狱同志撤离厦门，难友才能最后脱离危险。权衡利弊，狱中同志同意了特别委员会的破狱方案。

特别委员会对出狱人员的撤退去向作了正确地选择，对破狱时间作了最后决定。厦门是个孤岛，敌人统治严

密，出狱人员不能在厦门长久隐蔽。特别委员会决定将难友暂时撤退到有革命基础的同安县，然后伺机转移。中共同安县委承担了负责准备船只，在指定时间、地点停靠，以备接送出狱人员到隔海的同安农村隐蔽的任务。

特别委员会还将破狱时间定为5月25日上午9时进行。这天是星期天，敌伪机关放假，国民党军警和看守人员比较松懈。县政府警备队星期天只开两顿饭，9点是他们吃饭的时间。这时人员集中，又与武器分开，战斗力最弱。尤其重要的是，这一天是农历4月27日，按当日潮汛，是退潮时间，船只可以顺潮较快地开出厦门。

二、劫狱的经过

1930年5月25日早晨6时，参加破狱的11名特务队队员，由陶铸负责，检查了枪枝和老虎钳。8时分组到达监狱附近的鸿山寺待命。省委书记罗明和黄剑津驻在琼州会馆，派出交通和特务队、接应队随时联系，掌握行动进展情况，以备万一发生意外，能迅速采取应变措施。

这天是星期天，久雨初晴，正是杨梅上市季节，从镇南关到南普陀、厦门大学的路上，游客特别多。9时前，由团省委书记王德带领的一些家在厦门的党、团员、工人和进步学生，装扮成游客，在“太师墓”至碧山路一带“游逛”。他们的任务是，破狱后如敌人追赶，便装成打架，扭在一起，堵塞马路，阻碍敌人追赶。

9时，破狱第一组队员2人，以找同事为由进入县政

府大门。他们带着短枪和老虎钳，任务是监视办公室和进看守所的铁门，用老虎钳钳断门上的锁头。随后，破狱第二组队员2人又以探监为由进入县政府，他们的任务是监视狱中过道的木门，配合第三组人员行动。稍后，第三组破狱人员也以探监为名进去了。其中1人是龙岩人，名叫“客古”，他头戴草帽，身穿香云纱长褂，手捧着“马玉山饼干厂”制造的饼干桶，腰里也藏着一把老虎钳。任务是到牢房铁门口，要求看守打开铁门，将饼干送进牢内，趁看守检查饼干或开铁门时，由另一位队员把看守打死，这就是发动破狱的讯号。

正当第一、二组队员顺利通过二重门，分别到达预定位置时，在楼下天井里逗留的副看守长卢永忠，对穿长大褂的第三组队员“客古”产生了怀疑，要对他搜身检查。第二组一队员看到情况有变，立即拔枪击毙了卢永忠和另一个企图抵抗的看守李瑞凯。

枪声一响，挑着一担杨梅，停歇在县政府门口叫卖，监视二个门的特务队员谢××立即掏出手枪，打倒了两个门警。装着正在买杨梅的陶铸、王占春随即从装杨梅的箩筐中抽出手枪，率领另外二名特务队员，冲进大门。蹲伏在上庭院右台阶的北边，以台阶为屏障，首先击倒了刚从边门伸出头来查看情况的警备队长吴广成和另一警备队员。同时，用密集的火力，压制住正在吃早饭的队员。使他们无法回警备队队部取枪抵抗。

在第一声枪响的同时，进入看守所的六位队员，立即各负其责，抽出老虎钳，钳断了进监狱的大门和关押政治

犯牢房的铁锁。狱中的40多位难友，随即按三、五人预先编成的小组，鱼贯出狱。一出大门，立即有曾探过监，与难友熟悉、事先约定好的接应队员引路，沿碧山路往南走到尽头，到达打石字堤岸。

在海边打石字堤岸，由中共同安县委从同安准备的两艘载壳灰木帆船，头一天傍晚就已停靠在这里。当出狱同志到达时，在这儿坐镇指挥的许英宗同志随即安排他们搭上帆船，顺着刚刚开始退落的潮水，朝着同安方向驶去，这时大约上午9点半钟。

按照预定计划，接应队队员引导出狱难友上船后，便装成游客，沿原路经镇南关回市区，分散回家。特务队队员大部分散回市区隐蔽。有的把枪支埋藏妥当，换上衣服也装成游客，若无其事地到南普陀等处游玩。陶铸这时在南普陀还结识了一位在政府机关当差的老乡，与他边聊天边观察动静。

载着出狱难友的两只帆船，扬帆向西北驶去，过了鼓浪屿往东转，经过鼓浪屿与嵩屿之间的海面，穿过高（崎）集（美）海峡，开往同安县珩厝和彭厝村隐蔽、休息。然后分批送到闽西革命根据地工作。参加破狱的11名特务队队员，除陶铸、王占春到漳州，黄琬到莆田工作外，其余八名队员也被陆续送往闽西革命根据地参加新的斗争。

国民党当局获悉思明监狱被劫，“犯人”逃跑半小时之后，派出军警占据鸿山寺，宣布全市戒严，切断交通，盘查行人。通知各地侦察、拦截“逃犯”。他们得到报告说，同安县的刘五店与厦门岛的凤头村之间海面，有一只

电船朝东行驶，以为船上是“逃跑的犯人”，随即派步兵和警察乘汽车直奔五通，一面出动巡逻艇前往拦截。待他们赶上电船一查，却是鼓浪屿和厦门的一些阔人在寻欢作乐。他们又派出特务人员，化装成乞丐，秘密到与厦门岛隔海相望的海澄县第五区港尾圩（现龙海县港尾乡）侦察，结果还是一无所获。事后，国民政府行政院以“军警当局事前未能防范，事后未据呈报”为由，对厦门地方军警当局严加处罚，厦门海军司令林国庠被调离。厦门思明地方法院院长邓济安被停职，监狱管狱员兼看守所所长郭佑成被免职。

三、劫狱不是立三路线的产物，而是一次成功的、正确的军事行动

破狱不久，即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了中央。立三路线被纠正后，1930年年底上海党中央派到福建来的同志说陶铸“带队打监狱是立三路线的残余”，把他从省委军委调到漳州。当年中共福建省委在破狱之后，于7月8日向中央的报告（下简称《报告》）也说这次行动是“暴动的演习”，是“在这次革命高潮快到来和统治阶级日益崩溃的时候，无产阶级要起来夺取政权”。文革期间，“四人帮”为了打倒陶铸，硬说“这个事件是完全错误的”，是“立三路线指导下的产物”，强加给陶铸一个“老牌机会主义

者”的罪名。这样，致使长期以来对这一历史事件未能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经过调查研究，我们认为1930年5月25日的厦门破狱斗争，不是立三路线的产物，而是一次成功的、正确的、取得完全胜利的军事行动。

首先，福建省委领导的劫狱目的“纯粹是为了抢救狱中的党、团骨干”。当时主要考虑到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急需更多的干部来领导，在狱中关押的许多同志是省委党、团的领导，是革命工作的带头人。所以，省委研究，一致认为要设法抢救，根本没有搞武装暴动、计划夺取政权的打算。这与立三路线毫无相同之处。

其次，根据调查和当时的历史文件，新闻报导来看，破狱自始至终没有搞城市暴动等“左”的表现。

其三，从调查研究开始，破狱计划制定到破狱行动的完成全过程来看，厦门劫狱是主观符合客观取得胜利的一个范例，而没有丝毫的冒险主义、盲动主义的因素。

破狱计划的提出，是依据于对厦门军事力量深入、全面的调查和科学的分析。这个分析是来自深入的调查，事实是可靠的，判断是准确的。

破狱的准备工作周密、充分，计划制订严密。破狱时间也作了精心、科学的选择。整个破狱计划衔接严密，一环紧扣一环。做到了万无一失的安排。

厦门劫狱斗争是一次有严密的组织，科学的计划，精心准备，取得完全胜利的斗争。它应以劫狱的目的明确，保密工作做得好，调查研究充分，计划周密准确，用人得当，行动敏捷迅速，地方党组织接应好的成功经验而载入福建

党的史册。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

(卢茂材执笔)

闽南国共和谈与“漳浦事件”

中共漳州市委党史办公室
中共福建省委党史委员会征集处

闽南革命根据地，是1932年中央红军攻克漳州以后形成的。1934年8月，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闽粤边区特委。三年游击战争期间，闽粤边特委领导开展斗争，所辖区域包括福建省的平和、漳浦、南靖、龙溪、海澄、云霄、诏安，广东省的潮安、澄海、饶平、大埔，共14个县（全部或局部）。特委下辖党组织有4个县委，1个市工委以及13个区委、240余个支部。武装部队主要有红三团、独立营以及饶和埔游击队，共约1000余人。抗战前夕，中共闽粤边特委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以及全国形势的变化，积极采取行动，力促闽南地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一、闽南地区国共和谈局面的形成

1936年10月，国民党最高当局调粤军一五七师进驻闽南，接替国民党军八十师、七十五师“围剿”闽南红军游击队的任务。粤军一五七师共有两个旅六个团的兵力，师部设在漳州。粤军进驻闽南后，为了一举歼灭闽南红军游击队，他们采取了新的作战方针，把根据地分割成几块，

在地方保安团，地主武装的配合下，以一个团或一个营兵力分别对各块根据地进行“清剿”。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推行“北和南剿”政策，加紧“清剿”南方八省游击根据地。在闽南，粤军一五七师师长黄涛，根据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转来的蒋介石有关“剿灭”南方红军游击队的密电，加紧军事部署，确定采取“剿抚兼施”的计策，以便尽快消灭红军游击队。面对粤军的疯狂进攻，中共闽粤边区特委采取了灵活的战术，不断给敌以重挫，取得了反“清剿”斗争的胜利。

闽粤边区各块游击根据地虽然不断遭受一五七师的进攻，但特委在外患日亟，内战未休的情势下，仍力促闽南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早在1936年初，特委根据全国抗日呼声不断高涨的新形势，在党内首先开展对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意义及方法的学习讨论，克服一些同志的片面认识。在这基础上，把红军游击队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闽南抗日义勇军。并成立了漳州人民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何凌担任总指挥，朱增强为副总指挥，朱曼平为政治部主任，积极开展各种抗日宣传活动。同时，特委向各地党组织发出指示，提出不分党派、职业、信仰、宗教、阶级，大家团结一致，共同抗日。1936年1月间，漳州市党组织还组织全市中学学生举行反日示威游行，并发出通电，要求国民党政府发兵抗日。在农村，各根据地、游击区均成立农民抗日救国会和几千名的农民反日武装，并在小溪、漳州、厦门、诏安、漳浦等县城建立许多群众性抗日组织，

如“学生反日救国会”、“商人缉私委员会”、“教员救国会”等。这些抗日组织和抗日武装的建立，为闽南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1937年初，特委代理书记何鸣率机关人员到了平和县中部的山内地区，从与我方有联系的一个保长那里，得到国民党《中央日报》，从中获悉蒋介石已公开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主张。特委根据这一新的形势，召开会议进行研究。会后，向社会各界发出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拯救中华民族的呼吁。为了早日形成闽南抗日统一战线，特委决定给国民党一五七师和地方当局、国民党各县县长写信，严正申明中共闽粤边区特委和红军游击队的抗日态度。同时，在具体行动上，请与我方有联系的三个保长，从中牵线斡旋，希望尽快与对方接触联系，举行谈判。特委并将这些作法及时向中共南方临时工作委员会作了报告。

1937年3月5日，中共南方临委向特委发来指示信，信中指出：“为要更快的建立反日统一战线，以领导广大民众及各实力走上反日战线，要求红军与粤军联合起来，一致抗日，保护福建或（和）闽南。”信中还批评特委：“你们给他们的信（指一五七师等）太笼统简单，缺乏政治材料和爱国热情的鼓动”。“你们须参考八一宣言及给国民党书，重新起草，并寄各报馆”。信中还特别提出谈判内容，具体是：“一、红军和游击队停止游击活动；二、红军和游击队的名义可以改变为民族自卫军或抗日讨贼军，在抗日行动中可受粤军指挥；三、在未得到中央红

军调动集合命令以前，在原有地区驻守，双方不得侵犯；四、在对日作战进入友军区域，红军给养能得保证，红军不干涉友军地方的一切行政事件，并遵守友军的一切关于社会法制和命令”。特委根据南方临委的指示，于同年4月上旬，在平和县再次举行会议，决定再向一五七师发出呼吁，建议在安全地带进行谈判。这些有效的措施，使得闽南各界群众进一步深刻了解我党抗日主张，扩大了政治影响，对促进闽南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积极作用。

二、闽南地区国共合作谈判经过

1937年4月中旬，在我党的努力争取下，在闽南地区各界人士强烈要求抗日的推动下，国民党一五七师派其平和驻军伍笃祺连长到山内与红军游击队约定谈判地点与时间。经协商，双方决定在山内郭坑村陈天才（中共山内区委书记）家举行首次谈判。一五七师委派平和驻军营长钟定天为代表，并指派连长伍笃祺进行具体谈判，特委决定卢叨（化名王祥）为我方代表。为了及时掌握情况，特委将机关移驻山内。

4月下旬。闽南地区国共首次谈判如期举行。谈判中，我方代表以中共中央发表的宣言为基础，阐明共同抗日的重要性与必要性，提出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取消对我根据地的封锁；红军停止打土豪，但一切经费由国民党政府供给；红军放掉捉来的土豪，国民党政府释放被捕的政治犯；红军改编为闽南人民抗日义勇军；要求对

方给予民众抗日自由，实行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改善人民生活；原苏区根据地行政上由国民党政府领导，但具体管理仍由我方掌握。此外，还提出实行民主政治，优待抗属等条件。一五七师代表也申明他们同意抗日主张，但提出要把红军改编为保安大队。第一次谈判由于一五七师代表缺乏诚意没有达成协议。

首次谈判之后，国民党一五七师亡我之心不死，暗中调遣兵力，向特委驻地山内进攻。特委根据敌我情况，决定分兵三路撤退。何鸣率特委机关部分人员转向大芹山根据地；王胜带两个连向乌山根据地转移；何浚、林平平率部分人员向另一路撤退。在转移途中，何鸣、林路率领的特委机关部分人员在平和白沙宿营时，被一五七师所部抓捕，押往平和小溪镇。后转解漳州一五七师师部，由该师组织训练科长陈藻文负责审讯。何鸣在审问中，大义凛然，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以及一五七师的卑劣行径，声称自己是谈判代表，并大力宣传党的抗日方针政策，积极主张国共合作抗日。

何鸣被捕后，特委采取了紧急措施：指定特委委员、云和诏中心县委书记张敏为特委代理书记，并通电一五七师：宣布何鸣为我方谈判代表，抗议他们破坏抗日合作谈判的行径，全力进行营救工作。同时立即派尹林平到香港，向南委汇报情况。

何鸣的被捕，在闽南引起社会强烈反响，经过我方的不懈斗争，以及在社会各界舆论的强大压力下，一五七师师长黄涛会见了何鸣，并先后释放了林路、何鸣及特委机

关人员。黄涛要何鸣转告特委：双方全部停止敌对行动，合作抗日，红军游击队按指定地点集中训练，归一五七师指挥。何鸣返回后，在特委召开的会议上，介绍了被捕后的情况以及黄涛提出的条件。特委就此作了专门研究，并向南委作了报告。不久，特委接到南委的指示：一、同意特委与一五七师进行谈判；二、我军可以受他们改编，但组织上必须保持独立；三、我军人员一切生活待遇与一五七师相同；四、驻防地区应在我们的游击区。

1937年6月中旬，何鸣、卢叨为特委谈判代表，到了漳州与一五七师谈判代表、师参谋长张光前，参谋处长李宏达举行谈判。谈判中，一五七师代表同意合作抗日，但借口红军游击队留在根据地不能抗日，必须离开。

谈判期间，为扩大影响，特委于6月23日，就合作抗日问题发表《为改编红军一、三支队及漳州人民抗日义勇军告闽南同胞书》申明：“在此民族危机的紧迫关头，无抗日不能生存，无联合不能抗日。”号召：“只有不分党派，不分信仰，废除成见，停止一切内争，集中全国人才抗日，才能挽救国家民族于危亡。”指出：“我们中华民族的复兴是建立于国共合作的基础之上。只有国共合作到底，才能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才能使我们的国家富强隆盛起来。”

为了统一部队思想和作好参加抗战的准备，6月间，特委在平和县高坑陈家祠召开地方区、部队连以上干部扩大大会。会议主要研究讨论三个问题：1. 国共合作抗日；2. 红军游击队改编；3. 部队集中地点。会上，特委向

大家通报了与一五七师谈判的情况。经过讨论，大家对国共合作抗日，部队改编等问题认识基本一致。但对部队集中地点意见分歧，争执激烈。何鸣、吴金主张把队伍拉出根据地，以扩大抗日影响；卢胜、林路、王胜、朱曼平反对将队伍撤离根据地。特委最后同意红军游击队离开根据地，开赴平和小溪。高坑会议告一段落后，何鸣、卢叨又到漳州，与一五七师代表张光前进行谈判。

6月26日，闽南国共双方就合作抗日问题达成协议。主要内容是：一、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和抗日义勇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一五七师指挥；二、中共闽粤边区特委在不推翻现政府方针下，有宣传组织独立自由批评之精神；三、在一五七师防区共同组织与保证民众爱国运动自由，如救国宣传组织和排除汉奸浪人，铲除土劣，禁绝烟赌等；四、停止封锁苏区；五、释放被捕之红军人员，红军所抓之土豪也尽行释放。办法：1、一五七师所捕之红军人员及参加红军组织之民众未判刑的，与红军所抓之土豪尽数于7月15日释放；2、在漳、潮二属所抓红军及共产党工作人员于8月底释放；六、保留红军原有指挥人员及政治工作人员，编配由其枪支人数来决定，编后师部有派员去巡视、检查、帮助之权力；七、红一、三支队及义勇军改编后可先用保安队的名义，直接由一五七师指挥，待闽西南红军改编后，当即编入同一系统；八、伙食标准：暂发给长官每日4角，士兵每日2角，待到达指定驻防地后，即按月发清薪饷，待遇与一五七师相同；九、在未发动抗日战争前，不得调离漳属；十、双方均应遵守双方中

央所谈判的协议，待双方中央政治协定公布后，不合以上各条者得修改之，不够者得补充之；十一、以上各条由签定之日起，双方应即通知双方之各部队，各党部及政府施行。“六·二六”协议的签订，标志着闽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形成，这个协议得到闽南各界人士的欢迎。

谈判之后，一五七师派人送我方代表何鸣等回坂仔村。特委及部队一些负责同志对何鸣同意将部队开往小溪集中持不同看法，何鸣坚持己见。这时南委派来的代表姚铎来到坂仔镇，于是特委当即举行会议，姚铎向南委传达了南委关于“就地谈判，不能离开根据地”的指示。何鸣认为已和一五七师签定“六·二六”协议，而且当前首要问题是抗日，要从闽南实际出发，以争取更多革命群众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姚铎听后，同意何鸣的意见，于是部队继续前进，于6月底到达小溪镇，驻在中山公园附近。

1937年7月2日，部队在小溪接受一五七师点编。对此，许多战士思想不通。特委和部队负责同志对战士作了大量政治思想工作，加深了他们对抗日统一战线的认识，接受了点编。部队改称闽粤边保安独立大队。一五七师发给红军游击队每人一套旧军装，队伍分编为一个驳壳枪连、四个步兵连和队部驳壳枪排，何鸣任大队长、吴金任政训员，卢胜任副大队长，王胜任参谋长。改编后，一五七师所属驻小溪营部和平和县地方商会联合举行欢迎红军改编为国军合作救国大会。会上，双方代表发表了演说。在小溪期间，红军游击队与党领导的芎潮剧社等抗日文艺团体举行盛大联欢活动。

三、关于“漳浦事件”

1937年7月13日，闽南红军游击队在全国抗战全面爆发形势推动下，特委经过激烈争论后，接受一五七师命令，进驻漳浦县孔庙，准备奔赴抗日战争前线。特委对各项工作也作了相应部署：何凌驻漳浦下布指挥；张敏先到云和诏地区布置工作，准备再返回特委；何鸣、卢胜带部队进驻漳浦县城。

红军游击队进驻漳浦县城后，立即组织宣传队上街宣传我党和红军的抗日方针，广泛动员各界人士积极参加抗日救国的斗争，进一步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

与此同时，即在红军游击队进驻漳浦县同一天，国民党第四路军总司令余汉谋、国民党第五军区司令李振球、参谋长郑训晟，奉蒋介石密令，以“纪念第四路军成立一周年”、“慰问驻闽的粤军官兵”为名，到达漳州，策动黄涛采取非常措施，对付红军游击队。余汉谋、黄涛还乘专机抵福州，与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商讨“剿共”事宜。7月14日当晚，余汉谋、张光前等在黄涛家里密谋策划。余汉谋主张用武力消灭闽粤边红军游击队；黄涛提出用包围缴械的方法，解除红军游击队武装。当晚，他们命令驻石码的一五七师团长陈浚带九四二团赶赴漳浦，协助漳浦驻军收缴红军游击队的枪械，并对缴械的场地、方法作了具体布置，即在操场西北方向布置两个营，防止红军游击队向云霄方向突围；对何鸣、吴金另行看管；注意

收集红军游击队的文件图书；并由张光前写好“密令”，大意说，何、吴部受编后，不服从指挥，宣传赤化，行动越轨，奉四路军令，着四七一旅负责缴械。

7月15日，漳浦白区党组织负责人彭德清、特委巡视员朱曼平收集到各种情报，得知一五七师准备要对红军游击队进行缴械。他们立即向何鸣通报了这一消息，并提醒他即采取措施，保护部队，何鸣以为已经“合作抗日”，对方不会采取这样敌对行动，认为情报不确，予以隐瞒。

7月16日上午8时，红军游击队按通知集中于漳浦县大操场。这时，四七一旅参谋主任陈英杰等人走上前，对大家说：现在我们合作抗日，你们刚下山，不懂战斗技术，要训练一下。目前用不着枪，你们先把枪放下，以后再发给你们。大家一听，知道情况有变，立即压上子弹，准备应战。一五七师九四二团团团长陈浚见势，立即指着四周早以布置好的火力，威胁说：“你们看，四周都是我们的部队，枪要不要放下，你们考虑。”随即，又要何鸣对大家生命负责。卢胜与王胜表示要武装反抗，即使有些牺牲，但也可冲出一部分人员，以便重整旗鼓。何鸣对此表示不同意，认为可以通过谈判解决。何鸣在陈浚一再催逼下，对部队讲了话。他首先指责一五七师破坏国共合作，破坏统一战线，要向全国人民揭露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接着又说，现在部队已经被包围了、硬拼损失更大。他说服部队把枪放下，等候中央来处理。说完，自己带头将短枪扔在地上，大家见状，只好悲愤地跟着扔下手中武器。闽粤边红军游击队千余名指战员就这样被全部缴械。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漳浦事件”。

7月16日下午，“漳浦事件”发生之后，在诏安县发生了“月港事件”。新任特委代理书记张敏和云和诏、潮澄饶、饶和埔三县主要领导人等十几位同志被逮捕惨遭杀害。

“漳浦事件”之后，卢胜、王胜等聚集在孔庙秘密商议。要大家加强联系，通知干部、老战士伺机突围，到漳浦溪南根据地寻找党的组织，重建革命武装，与反动派继续开展斗争。并约定了突围的时间、路线和集中地点。当晚，100多名红军游击队骨干先后到达清泉岩一带集中，由何浚、卢胜、朱曼平领导，重建红三团。卢胜任团长兼政委，王胜任参谋长，队伍很快发展到200多人。同时，重新成立了中共闽粤边区特委，何浚任书记，林路任组织委员，朱曼平任宣传委员，卢胜、王胜等任委员。特委立即先后派遣尹林平、何浚再次赴港，向南委报告“漳浦事件”。南委指示他们，在政治上还要坚持统一战线，要求对方放人，交还枪支，继续谈判。军事上恢复部队，解决经济问题。组织上划归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

同年9月间，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派谭震林率一个加强排的武装，到达闽南地区，帮助特委和红军游击队恢复巩固党的组织和壮大武装力量。谭震林在闽南停留了一个多月，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支持下，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此时，又有100多名红军游击队员从一五七师跑回。他们在各地党委的安排下，重新回到了部队。

毛泽东同志对“漳浦事件”十分关注。1937年8月底，

他打电报给张云逸，明确指出，粤军所缴何鸣部的人、枪务须向余汉谋严重抗议，并要他们迅速将原人原枪全数退回。同时，强调指出张鼎丞部与粤军接洽，务须慎重，谨防再上余汉谋的当。张云逸接到电报指示后，即与余汉谋谈判，向其抗议，要其迅速将闽南红军人、枪全部归还。此后，毛泽东同志多次发出电报，指示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向国民党再次提出要求，要南京政府责令余汉谋退还何鸣部的人和枪，不得缺少一人一枪。直至1937年9月下旬，毛泽东又给博古、叶剑英发电，询问他们，何应钦是否已批准将何鸣部的人、枪归还我党，如还没有批准，要他们再次交涉。

在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指导下，张鼎丞于1937年11月15日发表《为闽南红军请命》。指出：“我们尤要求各党各派各界领袖及一切爱国人士主持公道，大家一致呼吁，要求军政当局了结这一不幸事件，停止对闽南现有红军进攻，使闽南红军得以迅速恢复其组织，重新贡献其一切力量，为保卫漳厦，保卫华南国土而奋斗到底。”与此同时，闽粤边特委也于1937年12月25日发出《为反对内战告全闽南各界同胞书》，严正申明我方“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坚定立场，宣布“我们的口号是：

- （一）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们团结起来！
- （二）反对保安队进攻闽南人民抗日义勇军！
- （三）实现国共合作，巩固闽南国防前线！
- （四）肃清一切汉奸亲日派！
- （五）誓为保卫漳厦流最后一滴血！

（六）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经过我方多次交涉，终于排除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不得不下令归还我方300多枝枪，同时，闽粤边特委又继续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不久，闽南重新形成了国共合作、对日作战的新局面。

1938年1月，根据中央的指示，闽南红军游击队300余人改编为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一营，四团团长卢胜，副团长周桂生，参谋长王胜，政治处主任廖海涛。一营营长池义彪，教导员廖成美。1938年3月上旬，部队从龙岩白土出发北上皖南，开赴抗日前线。

闽南国共谈判的经验教训十分深刻。中共闽粤边特委在谈判之前，根据全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为建立闽南地区抗日统一战线作了不懈的努力，他们的方针、政策，符合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顺应了闽南广大人民守土抗战，保家卫国的愿望。闽粤边区特委和红军游击队是南方八省游击区中最早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其影响是很大的。“漳浦事件”的发生，主要是国民党顽固派亡我之心不死企图利用谈判达到消灭红军游击队的目的。而红三团主要负责人何鸣却对国民党顽固派丧失警惕，存在严重的右倾思想。中共南委的代表姚铎，闽粤边区特委代理书记张敏在重大的问题上不坚持原则，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漳浦事件”发生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就这一问题多次发出电报、指示，并于1937年11月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作报告时指出要警戒何鸣危险（被国民党包围缴械的危险），告诫全党，要吸

取“漳浦事件”的教训，强调在全党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纠正我们党内统一战线中的右倾思想。闽南地区尽管发生了“漳浦事件”，但在党中央正确方针的指引下，终于最后形成该地区的抗日统一战线，使得闽南红军游击队胜利改编北上皖南抗日前线，为革命事业作出了的贡献。

（陈日增执笔）

北平和平解放

平津战役史料丛书综述写作组

北平是我国历史悠久的文化古都，1949年1月31日和平解放；同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北平改名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从此，北京成为全国的领导中心，成为世界瞩目的名城。

北平和平解放前，是南京国民党政府所管辖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所在地，总司令为傅作义上将。华北“剿总”管辖河北、山西、察哈尔、热河、绥远5省^①和北平、天津两市。国民党军和平津地区有4个兵团部、12个军部、42个师，连同地方武装，共50多万人。驻扎在北平约占其中的一半，计有1个总部、2个兵团部、8个军部、25个师，连同地方武装，共25万余人。

从1946年6月开始的我国解放战争，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人民解放军英勇作战，到1948年9月出现了战略决战局面。我军先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平津战役中我东北和华北野战军雄兵百万，首先歼灭了平绥路东段之新保安、张家口傅作义

① 察哈尔省于1952年撤销，分别并入河北、山西两省。热河省于1956年撤销，分别并入河北、辽宁及内蒙古自治区。绥远省于1954年撤销，并入内蒙古自治区。

嫡系主力部队，接着，攻克重兵固守的天津，歼灭蒋系中央军10余万部队，最后会师北平城下。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为使这座文化古都免遭战火破坏，派出代表与傅作义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谈判。傅作义将军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和平建议，率部出城接受改编，完整地将北平移交给人民，这是他为祖国立的一大功劳。平津战役从1948年11月29日包围张家口开始，至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结束，历时62天。我军有4个兵团部、22个纵队参战，共消灭敌人52万人，使华北全境基本上获得解放。

北平和平解放，是我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全国解放前夕出现的一种新形式，即用和平谈判方法，两军不战而使国民党军接受和平改编，使它所占领的地区获得解放。它是人民解放军运用军事打击与政治争取相结合的原则在新形势下的新发展。毛泽东称它为“北平方式”。后来，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之华东、华南、西南和西北举行胜利大进军，又出现了若干和平解放的省、市。北平和平解放为全国之首，是一个伟大创举。

北平和平谈判局面的形成

北平能够和平解放，最根本的原因是敌我军事力量消长的结果。

1946年6月，南京蒋介石政府撕毁国共两党重庆停战协定，发动了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内战，从此开始了我国的解放战争。1946年10月，任绥远第12战区司令长官的傅

作义，执行蒋介石“戡乱剿匪”命令，率部占领了包括晋察冀首府张家口在内的大片解放区领土。从此他当了察哈尔省主席、北平行署管辖下的张垣绥靖公署主任，成为国民党军中“戡乱”得力的一个有名人物。

华北人民解放军根据毛泽东关于不在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战略思想，从张家口撤出后，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先后开展了保北战役、正太战役、青沧战役等，开始扭转了被动局面，争取了主动权。1947年秋清风店战役，全歼敌第3军主力。华北形势也和全国其它战场一样，已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接着，一举攻克石家庄，使华北广大解放区连成一片。1947年12月，蒋介石为挽救华北败局，撤销原保定、张垣绥署，成立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傅作义升任总司令。他统率的军队，成为蒋介石五大军事集团之一。蒋介石虽把军政大权交给傅，但又千方百计地控制他、削弱他。1948年2月，华北“剿总”召开军事会议，傅作义提出有权使用战斗系列中的所有部队，担任“剿总”副总司令兼北平警备司令的军统特务头子陈继尧反对，说中央军^①的使用要通过他，傅系部队的使用也要通过他。两人争吵起来。会后，傅三次电蒋辞职，蒋只好撤销陈的职务。蒋介石要派他的亲信担任“剿总”政工处长，傅坚决拒绝，提名由他的亲信担任。同年10月，蒋介石要调傅的主力出关援锦作战，并要傅亲自指挥，傅不愿担此风险，婉言拒绝。蒋介石只好亲自指

① 国民党军队有中央系和地方系之分，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为中央系，也叫中央军。

挥其嫡系中央军，组成援锦兵团，出关作战。蒋傅虽有尖锐矛盾一面，但在扭转华北败局上，却又是一致的。傅当了“剿总”司令后，千方百计想扭转华北败局，但是国民党政权已经病入膏肓，即使傅作义这样的强将也无回天之术，华北败局再也无法挽救了。

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开始。华北傅作义集团失去东北的屏障和中南的依托，面临我东北、华北野战军的沉重打击，已成惊弓之鸟。是守，是撤（是由海上南撤，还是向绥远西退），还是和？蒋傅因出于各自的利益而各有打算，处于犹豫徘徊、举棋不定之中。11月4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高级军事会议，制定华北是战还是撤的决策。蒋介石开始曾想叫傅率部南撤，以加强长江防线，并委傅以“东南军政长官”。可是傅在会上摆出主战姿态，力陈“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主张万不得已时才撤。蒋介石也怕华北一撤全线垮台，最后确定“固守平津塘，依海作战”的方针。傅作义主张坚守华北有其打算：辽沈战役使几十万国民党精锐部队顷刻瓦解，他看清蒋介石败局已定，共产党胜利不可避免，不愿替蒋介石殉葬；同时，也担心自己的嫡系部队撤退到江南有被吃掉的危险。傅作义估计，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后必然休整，至少要3个月才能入关。如能抓住时机，取得更多的美援，把华北国民党军扩充到100万人，对自己也是一个有利局面。傅作义从南京返回北平后，围绕守、撤、和作了多种部署。他先是向中共中央发了一封电报，表示愿意言和，并谈了他控制的陆空军数量。继之，又通

过民主人士符定一等人到我华北人民政府驻地石家庄，向中共中央转达他言和的意思。这时，傅作义的和平条件是：他和共产党组成联合政府，划平、津、塘、绥、保为和平区，政治双方共理；他的部队暂改称人民和平军，俟全国解放后，军政悉交国家处理。可以看出，傅作义的想法是保存实力，走第三条道路。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傅作义的和平建议是欢迎的。因此，以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名义给傅作义复信，建议他派正式代表前来谈判。同时，也看到“不解决傅的军队，即使占领平津也是不巩固的”。据息，平津敌人还有撤退迹象，如敌撤退对我以后作战不利。因此，决定提前发起平津战役。

这一战役是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亲自组织领导，在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组成的平津战役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进行的。中央军委为平津战役制定了正确的作战方针，这就是将傅作义集团抑留华北，分割包围，就地歼灭；并遵循这一方针，作出了一系列军事的政治的重要决策和部署。1949年11月29日，华北第3兵团突然包围张家口，其意图在于引敌西援，抓住傅系，拖住蒋系，掩护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以便分隔包围平津之敌，断绝其西退南撤之路，达到全歼之目的。“从西线开刀”，这是中央军委、毛泽东在整个战役指挥上的一招高棋。张家口是平绥线咽喉，傅系军队西退必经之路，守军为傅作义嫡系部队第十一兵团部、第一〇五军等部7个师（旅）。该地被

围，傅作义认为是华北部队的局部性行动，急令其嫡系“王牌”第三十五军火速由北平前去增援解围，令第一〇四军、第十六军西调，以确保平张线畅通。傅作义并于11月4日亲飞张家口部署防务。当日他返回北平，发现我东北先遣兵团已入关，直接威胁北平，又急令第三十五军星夜返回。该军在返平途中，被华北第2兵团包围于新保安。在此同时，东北野战军主力，夜行晓宿，经冷口、喜峰口、山海关秘密、迅速入关，突然对北平、天津之敌实行分割包围。自此，傅作义集团被分别包围在平、津、张、新等孤立点内，南撤、西退之路均被堵死。这时，傅作义遂派代表出城找解放军谈判。

北平地下党通过多种渠道做好争取工作

在北平和平谈判过程中，活跃着一支“看不见”的队伍，这就是中共北平地下党。他们紧密配合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斗争，大胆、审慎地对傅作义及其他国民党军政人员进行政治争取工作，充分发挥了“第二条战线”的作用。

北平是个具有光荣革命斗争传统的城市。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就在这里工作过。1935年党在这里领导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945年9月，在中共晋察冀中央局领导下，建立了中共北平市委，刘仁为书记。市委下设学委（学生工作委员会）、工委（工人工作委员会）、平委（平民工作委员会）、铁委（铁路工作委员会）、文委（文化工作委员会）等地下

党的领导机构。不久，随着形势的发展，北平市委撤销，五个委员会直接由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后改为华北局）城市工作部（简称城工部）领导。城工部设在河北省沧县泊镇。北平解放前夕，北平地下党有党员3000人，党的外围秘密组织“民青”（民主青年同盟）、“民联”（民主青年联盟）约5000人。在工厂、学校、报社、铁路局、电信局，以至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等机关，都有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和地下党员。他们领导工人、学生进行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动员大批学生到解放区参军、参政；积极刺探敌情，深入进行瓦解敌人的工作。

对于傅作义的情况，中央军委、平津前线领导人和北平地下党作过多次分析判断。认为，一方面傅曾是抗日爱国将领，同我党有过合作的历史，与蒋介石也有较深的矛盾，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即将覆灭时，有把他争取过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傅作义有一段时间追随蒋介石反共，与共产党兵戎相见，他统率华北国民党几十万军队，非不得已时，不可能转向人民。中央军委决定对傅作义集团在立足于打的同时，积极进行政治争取，力争和平解放北平，以保全北平的文物古迹，减少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为今后在北平建都创造一个好的条件。1948年11月初，城工部部长刘仁向北平地下党学委书记余涤清布置，要他们配合即将发起的平津战役，大胆利用各种关系，尤其是通过傅作义的亲信和亲属，做傅作义的工作。

（一）请刘后同等民主人士劝说傅作义放下武器。刘

后同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思想进步，在甘肃、山西任过国民党要职，关键时刻常给傅出主意，深得傅信任，后因年迈闲居天津。刘仁派人请他出来劝说傅作义保护北平文化古都，走和平道路。刘来到北平后经常和崔月犁（北平地下党学委秘书长）、杜任之（共产党员，华北经济学院教授）、刘学舟（共产党员）等一起研究如何做傅作义的工作。刘在北平80多天，有时面谈，有时写信，不遗余力地劝傅作义罢战言和，人称和平老人。刘多次向傅分析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他说：“国军每战必败，非兵之不多，械之不精”。“国民党已演变至政治无能，经济破产，文官三只手，武官四只脚，国际诟厉，人心思变。本身既不能别开生面，适应历史，再不与中共休战言和，将见其政权之不为土崩，必为瓦解矣。”傅对和共产党言和有种种顾虑：一怕人说他是“叛逆”；二怕蒋介石发觉杀害他；三怕部下转不过弯来打死他；四怕共产党不能谅解他。刘后同——加以解释。何谓“叛逆”？刘后同写信劝傅说：“汤与武王，桀纣臣也。乃伐桀纣，后世不称曰叛逆，而反以圣美之。何为忠者，忠于人民事也，非忠于一人之谓耳。刻国事败坏至此，家室仳离，民生涂炭，民之所欲者和平，政之所需者改造。子能循历史、顺人心，起而倡导和平，天下且将壶浆迎之而不暇，谁复有谓之为叛逆者。事贵从速，不必多疑，时不待人，希予立断。”当然，刘也有某种局限性。他主张傅尽快发通电，认为通电一发，全国响应，可与辛亥革命媲美。他向中共北平地下党转达傅的意见：“倘共方同意，拟划平津察绥保为和平区，政

治双方共理，傅部暂改称人民和平军。俟全国解放后，军政悉交国家处理，傅本身无他希冀也。”^①中共中央认为仅发通电和傅部改名称，是走第三条道路，是不实际的，不能解决问题。劝傅放弃这些意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和平建议。

（二）通过傅冬、李炳泉等共产党员直接间接地对傅作义进行政治争取工作。傅冬，原名傅冬菊，傅作义长女，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天津《大公报》社当记者。1946年傅作义率部进攻解放区，在学校读书的傅冬就写信反对父亲打内战，并常常把人民的苦难讲给他父亲听。傅冬来到北平后，余涤清对她说：“现在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你父亲有接受和谈的可能。希望他放下武器，与共产党合作，和平解放北平。”傅冬把这些话转告傅作义，傅问：“是谁告诉你的？是真共产党，还是军统？”傅冬答：“是我的同学，真共产党，不是军统。”傅又问：“是毛泽东派来的，还是聂荣臻派来的？”傅冬一时答不上来，又去问余涤清，说“是毛泽东派来的”。傅作义说：“可以考虑。”傅冬对他父亲一面从生活上关心，一面从思想上开导，经常谈形势、讲利害，劝父亲不要跟蒋介石走。她及时向地下党学委负责人王汉斌、崔月犁报告傅作义的言谈、神态、情绪变化，由他们通过地下党电台报告北平前线司令部。傅冬为争取傅作义转向人民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① 刘后同：《北京古城和平记略》。

李炳泉，194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傅部所办的《平民日报》社当采访部主任。他是华北“剿总”少将联络处长、傅作义的幕僚李腾九的堂弟。李炳泉常和李腾九论时事、谈形势，使他看清了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和谈是最好的出路，固守是死路一条。李腾九又积极劝说傅作义走和平之路。傅第一次正式派人找解放军谈判，就是通过李腾九和地下党取得联系，由李炳泉偕同一起出城的。李炳泉并以共产党人的公开身份，与傅作义会晤。

（三）地下党还给国民党军政大小头目邮寄散发通令、传单，告诫他们各安职守，不准破坏，并积极策动他们起义。地下党员李介仁亲自策动第九十二军军长黄翔，准备率部起义。地下党员王甦与傅部铁甲总队一大队队长于维哲谈妥，如果解放军攻城发出信号，该大队便从前门车站攻向永定门，配合解放军攻城。地下党员杜任之和进步人士冯汉杰做好了傅部第三十五军副军长兼二六二师师长丁宗宪的工作。丁表示：“总司令（指傅作义）若不走和平道路，只要你们与城外联系好，咱这一师单独起义，打起来，先开城门，迎接解放军进城。”同时，地下党的同志还对“军统”北平站站长徐宗尧做了工作，他答应保护档案，保护政治犯，并交出了敌特潜伏计划和武器器材。北平解放后，敌特破坏活动较少，和这一工作有一定关系。为防止敌人破坏，北平地下党还组织群众护厂护校，并且绘制了北平城防图，交给平津前线司令部作为攻城时的参考。

聂荣臻同志对北平地下党的评价很高，他在回忆录中说：北平的地下党组织，在刘仁同志领导下，为了配合当时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积极进行各种活动。他们利用各种关系，获取了大量的情报，源源不断地供给平津前线指挥部，使我们对敌情基本上做到一清二楚。几十年来，我打过许多仗，能够如此及时了解对方最高指挥官的动态，还是不多的。这些地下工作的同志确实是可歌可泣的。

北平人民渴望和平解放 对傅作义起了推动作用

北平解放的第二天1949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原因》评论中指出：北平能够和平解放，除国民党军队战败，国民党军队中绝大多数不愿打了这些原因外，“北平人民，包括劳动人民、资产阶级及绅士们在内，一齐渴望和平解决，又是一个原因。”

1945年9月，日本投降，北平人民欢欣鼓舞。但后来看到国民党接收大员们贪污勒索，趁机大发国难财的腐败现象，产生了反感。特别是蒋介石全面发动反共、反人民内战，发生了所谓“盟友”美军强奸女大学生的“沈崇事件”后，人民群众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呼声越来越高。当时流传一首歌谣：“想亲娘、盼亲娘，日本鬼子投

了降；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法币贬、物价涨，肥了大官和奸商。割了野草露出狼，反动派的日子不会长。”1948年秋，随着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国民党政府危机四起。此时，北平物价暴涨，黑市猖獗，社会混乱。1948年10月21日，北平《新民日报》刊载：“平市国民学校教员薪俸低薄，物价竟如脱缰野马，旬日来已经上涨七八倍。时届三秋，饥寒交迫，教员等不得已暂向学校请假4日以待命。”北大82位教授也发表宣言，为饥寒所迫，停教三天。当时出版的《观察》杂志写道：拿最高薪金的教授生活都如此之惨，其他人就更加悲惨。“饥饿的洪流吞没了一切。现在的问题已不是吃饱或吃不饱，而是怎么设法不饿死。”在国民党政权将要垮台时，有钱有势的大官要员纷纷抢购黄金、美钞，争先恐后乘机南逃；中下层官员则恐慌、观望、等待，思谋出路；人民群众不满国民党，日夜盼解放。1948年7月石景山钢铁厂工人举行罢工，高喊“肚子饿了，不干了”，迫使工厂当局接受工人提出的要求。电信工人也发动“饿工”斗争，使电信瘫痪。学生接连举行罢课、游行。国民党当局对工人、学生残酷镇压，仅1948年7月5日，用机枪扫射手无寸铁的请愿学生，当场就打死13人，伤百余人，制造了“七·五”惨案。10月下旬，蒋介石来到北平，抛出一个《非常论》，声称对罢工者格杀勿论。北平街头军警到处抓人，打黑枪，杀气腾腾。

1948年12月中旬，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北平。北平人民在过去对国民党政府不满的情绪下，这时生活中又遭到许

多困难，城内粮食日渐恐慌就是一大问题。国民党守军20余万人，吃粮靠空运空投，这怎么能维持长久呢，群众吃粮就更困难了。每天人民解放军虽允许粮商出城用大车购粮，但总解决不了数百万人的吃粮问题。除吃粮困难外，还有几件事困扰着北平市民：一是抓壮丁。国民党军为补充兵员，在城内抓壮丁，弄得青壮年无处躲藏。二是强令居民拆除房屋。凡是西直门、广安门、朝阳门等处城外500米以内的房屋，都要拆光，弄得居民无家可归，无房可住。三是强迫居民修飞机场。除修天坛、东单机场外，又要修第三个机场。四是捕杀人员。国民党特务到处乱抓、乱打、乱杀群众。仅1949年1月5日晚上，就抓走1000多人，激起城区人民的愤怒。

1948年12月中旬之后，北平外围相继解放，石景山、丰台等地各工厂和清华、燕京等学校，工人、学生欢天喜地庆祝解放，与城里形成光明与黑暗的鲜明对比。北平城内人民群众要求保护文化古都，要求和平解放的呼声日益高涨，为和平而奔走的人士越来越多。一月中旬，傅作义召开一个社会名流会议，大家纷纷要求傅走和平的光明大道。著名画家徐悲鸿激昂地讲了保护文化古都的意义。著名教授杨仁楹也说：“内战已给人民造成很大灾难，决不能再打。如果傅先生顺从民意，采取和平行动，我们作为历史学家，对此义举，一定要大书特书。”当时，北平有个“7省市”民意代表团，其中有北平市原市长何思源、康有为之女康同壁等，努力为和平奔走，与傅作义多次面谈。何思源在蒋介石与李宗仁竞选总统时，支持了李宗

仁，被蒋介石免职后住在南京。这次他专程从南京来北平奔走和平。国民党特务在他家安放了定时炸弹。一声爆炸，全家六口一死五伤。何思源负伤后，到医院包扎了伤口，第二天仍和代表团一块出城，到海淀与解放军接洽和平。人民解放军占领石景山发电厂后照常给城里供电，但国民党当局却不让群众用电，让家家晚上燃起灯笼。因此，人民群众编顺口溜说：“家家挂红灯，欢迎毛泽东。”

在北平人民纷纷起来要求傅作义走和平道路的同时，还有一位孔繁蔚老先生自动从济南来到北平劝傅放下武器，不要跟蒋介石走了。

工人、学生的反对，民主人士的奔走呼号，对傅作义走和平道路产生了很大影响。

三次谈判达成协议，北平获得新生

傅作义在辽沈战役的震撼下，就有了和共产党言和的举动，但那时双方虽有某些接触，谈判并未正式举行。一个月之后，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谈判才正式进行。谈判中，毛泽东确定的基本方针是：傅作义必须放下武器，在这个前题下言和。傅作义的方针是：保存实力，走第三条道路。这两条方针，随着敌我力量的消长和中共中央提出的正确的政策而趋于统一。

第一次谈判。

如上所述，傅作义在华北野战军突然包围张家口，傅

系“王牌”第三十五军被包围于新保安，东北野战军主力迅速秘密入关，包围天津，12月14日兵临北平城下的情况下，欲战不能胜、欲守不能、欲逃无路，决定派人出城与解放军谈判。傅要李腾九找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派人和他的代表一起出城找解放军谈判。李腾九找李炳泉和共产党联系。北平地下党决定，李炳泉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同傅作义见面。李来到傅的办公室说：“我受中共北平地下党的派遣来见傅先生，欢迎傅先生作出决断，进行和平谈判。”傅答：“能否由崔载之代表我同你去见中共方面的领导？”李答：“可以。”傅当即要其政工处长王克俊，挑选可靠人员做好秘密出城安排。崔载之是傅部办的《平明日报》社社长，颇得傅信任。

12月15日，崔、李和报务员、译电员等5人，携带电台，乘吉普车秘密出城。^①傅作义让李腾九称病住院，与外界隔绝，专事与崔、李的电讯联络。崔、李出城后遇到东北野战军第11纵队，便向纵队司令员贺晋年、政委陈仁麒说：傅作义很着急，要求与解放军和谈。傅提出的谈判条件是：1、他参加联合政府，他的军队归联合政府指挥；2、在一定的时间内起义，要解放军为他保密；3、要求林彪停止战斗，双方进行谈判。他们又说，14日晚，傅作义还提出：他的军队不要了，两军后撤，谈判缴械，由傅发通电缴械。当天十一纵队即向东北野战军领导人报告了这一情况。东北野战军领导人在向中央军委转报

^① 崔载之、李炳泉出城时间说法不一，这里说的“12月15日”是根据存于中央档案馆的当时东北野战军的电报。

这一情况时建议说：我军攻下北平、天津全歼守敌有绝对把握，谈判以争取他们放下武器为有利。必要时我们可直接主持这一谈判。我们已电告十一纵队，要他们把傅作义的代表护送到三河来与我接洽。

中央军委复电批准了由东北野战军领导人主持和傅方代表的谈判。指出，与傅作义代表谈判，以争取他们放下武器为基本原则。傅主力3个军，1个被歼灭，两个被围于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城内只有他4个师，北平绝大部分敌军及天津、塘沽全部敌军都是中央系，傅作义很难指挥这些军队。我们的第一个目的是解决中央军。你们应该向傅的代表试探，傅是否有命令中央军缴械的权力。如果他没有这种权力，则可向他提出让路给我军进城解决中央军。崔、李所说14日晚傅提出的条件，很可能是因为我军14日突然到了城边，傅仓猝布防不及说出的好听的话，以争取布防时间。其中所谓“两军后撤谈判缴械”，可能就是这个目的。崔这次来谈是一种试探性的行动，如果傅有诚意，他还会派代表出来。

12月17日，崔载之、李炳泉到达三河县境内平津前线司令部驻地。东北野战军参谋处长苏静同他们进行了初步交谈。崔载之说，傅作义同共产党谈判绝非阴谋把戏，过去曾有谈判之蓄意，这次军事情况是直接的推动，愿商谈解决问题之方案。他提出：1、如何能搞到蒋介石一部分飞机。希望解放军放松对南苑机场的控制。2、如何能不经战斗解决问题。为了对付蒋系军队，要求将被围在新保安的第三十五军两个师放回北平。3、在何时机由傅发出

通电，以影响中央军战力，打破过去美拉傅混入联合政府为其建立政治基础的阴谋。李炳泉也说，傅最焦急的是，解放军切断平张线后，他的军队西撤绥远已不可能，在北平动作又感到力量不足，对中央军不能完全控制。

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于19日与崔载之进行会谈。他说，我强大的人民解放军已包围了平、津、张、新，随时可以发起攻击歼灭敌人。但为了保护北平文化古都，为了使人民生命财产免受损失，我们欢迎和平解决问题。只要傅作义将军放下武器，我军将保证他和他的部属生命财产之安全。给傅将军留下两个军，把蒋系部队军、师头目逮捕起来，然后宣布起义。崔将谈判情况向傅作了报告，傅认为北平城内蒋系兵力比他的部队多十几倍，逮捕其军、师军官没有把握。第一次谈判未取得进展。

傅作义在派代表出城找共产党和谈后，和他的嫡系将领秘密磋商和平问题。傅说：“当前形势只有求和是出路，也符合北平几百万老百姓的愿望，但要冒风险，你们跟我走不走？”绝大多数人表示跟他走，并说：蒋介石政权肯定要完蛋，我们不能跟它一起完，应该找我们的出路。

12月22日，人民解放军发起对新保安的攻击，激战11小时，全歼第三十五军军部和两个师。三十五军被歼，傅后悔指挥失策，痛心疾首。第二天，他给毛泽东主席发电，要求重开谈判，组成联合政府。他说：“余绝不保持军队，亦无任何政治企图”。“前曾来电赞同毛

主席新民主主义与联合政府之主张，今后治华建国之道，应交由贵方任之，以达成共同政治目的。”“拟即通电全国，通电发出后，国军即停止任何攻击行动，暂维现状，贵方军队也请稍向后撤，恢复交通，安定秩序，细节问题请指派人员在平商谈解决。在此转圜时期，盼勿以缴械方式责余为难。”与此同时，傅作义密令张家口守军迅即向绥远方向突围。结果，除兵团司令孙兰峰带少数人逃往绥远外，悉数被歼。至此，傅作义嫡系部队主力基本丧失殆尽。

为了打垮国民党反动政权，揭破蒋介石的“和平”阴谋，12月25日，中共中央“权威人士”宣布蒋介石等43人为头等战争罪犯，傅是其中之一。在登载这个战犯名单的同一张报纸上，又登了新华社一条消息，说象傅作义这样的战犯不惩罚不可能，减轻惩罚是可能的，其出路是缴械投降，立功赎罪。但这个暗示未被傅理解。傅本来就有怕得不到共产党谅解的想法，这时顾虑更大了，甚至后悔派人出城和谈，遂令崔载之立即返回北平。

蒋介石对傅同解放军谈判有所察觉，相继派军令部长徐永昌、国防部次长郑介民、次子蒋纬国来平察看，要傅南撤。蒋纬国还带来蒋介石的亲笔信，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要任命傅为“东南军政长官”。傅婉言谢绝。这时，“军统”特务采取暗杀、抓人等恐怖手段，加紧迫害要求和谈的进步人士，搜捕中共地下党员。蒋介石还给守城军以上人员写信，要他们“固守待援”，“做到不成功便成仁”。

傅作义思想斗争十分激烈，心情十分矛盾。他一面下令在城内动工修筑环城马路，在东单、天坛修建临时机场，准备战事。声言要与城共存亡，要把军权交给李文，说自己要赴南京向蒋介石请罪。一面又给毛主席发电报，说他要起义，要公开发和平通电；他不去南京参加蒋介石召开的第二次高级军事会议；准备再次派人和共产党谈判。同时，傅作义约见彭泽湘、张东荪，要他们向中共表示，他无任何要求，只要求给一个台阶下野，并用协商办法处理他的军政权问题。

为了和平解放北平，毛泽东于1949年1月1日电示林彪：新保安、张家口之敌被歼后，傅作义及其在北平直属部队之地位已经起了变化，只有在这时才能真正谈得上傅作义为我所用。因此，你们应认真进行傅作义的工作。你们应将下列各点直接告诉傅作义：（一）目前不要发通电，此电一发，他即没有合法地位了，他本人和他的部属都可能受到蒋系的压迫，甚至被解决；（二）傅氏反共甚久，我方不能不将他和刘峙、白崇禧、阎锡山、胡宗南等一同列为战犯。我们这样一宣布，傅在蒋介石及蒋系军队面前的地位立即加强了。傅可借此做文章，表示只有坚决打下去，除此以外再无出路。但在实际上，则和我们谈好，里应外合，和平解放北平或经过不很激烈的战斗解放北平。傅氏立此一大功，我们就有理由赦免其战犯罪，并保存其部属。（三）傅致毛主席电毛主席已收到。毛主席认为傅氏在该电中所取态度不实际，应照上述（一）、（二）两项办法进行，方合实际，方能为我方所接受。

(四) 傅氏派来谈判之代表崔先生态度很好，嗣后崔可再出城来联络传达双方意旨。惟我们希望傅氏派一个有地位的能负责的代表偕同崔先生及张东荪先生一道秘密出城谈判。(五) 傅氏此次不去南京是对的，今后亦不应去南京，否则，有被蒋介石扣留的危险等等。平津前线司令部立即派李炳泉回城，向傅作义当面转达了这些意见。

为了加速平津问题的和平解决，1月5日，林彪、罗荣桓发表了《告华北国民党将领书》。书中说：“北平、天津、塘沽均已被围，你们的陆上退路已完全切断，从海上和空中纵有少数人逃跑，你们的绝大多数仍无法逃脱被歼灭的命运。现在蒋介石已经自顾不暇，美国也已经无能为力。你们要想待援，是无援可待；要想待变，是越变越危险；要想突围，张家口和徐州的教训，是摆在你们的眼前。你们现在只有一条活路，就是学习长春郑洞国将军的榜样，立即下令全军向本军投降。只要你们保证不杀俘虏不杀人民，并将所有武器资财仓库和驻地工业交通设备，完整无损地交给我军接收，我们对于你们也可以仿照本军对待郑洞国将军的办法，一律宽大待遇，对于你们全体将领官兵眷属的生命财产，一律加以保护。傅作义本人虽然罪为战犯，只要能够迅速率领你们全体投降，本军也准其将功折罪，保全他的生命财产。如果你们同意这种办法，即望速派代表前来我司令部接洽，无论是那一级将领军官的代表，我们一律欢迎。本军总攻在即，务望当机立断，勿谓言之不预。”

第二次谈判。

在人民解放军的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下，傅作义派华北“剿总”地政处长周北峰少将与张东荪一同出城，于1月7日到达蓟县城南八里庄，与平津前线领导人进行谈判。聂荣臻首先与张东荪进行晤谈。张说：傅作义要求平、津、塘、绥一齐解决。军队不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械的方式，采取有步骤地调出城外分驻各地整编的方式解决。聂问张：傅是否还想打下去，或者走第三条道路？张答：我的观察，傅是决打不下去了。原因是他的主力被歼，美援无望，前不久有一批美援经过上海时，被国防部换了一批坏货，傅很失望。城内粮食也不能持久。第三条道路曾经有人活动过，我曾竭力阻止，傅现在已没有这一打算了。我看傅还是想要点面子下台，我称之为光荣的移交。聂又同周北峰进行了晤谈，所谈与张相同。

林彪、聂荣臻将张、周所谈情况及他们的意见，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9日，毛泽东复电指示：平、津、绥、塘均应解决，但平津人民困难甚大，两军对峙，军民粮食均有极大困难，故应首先迅速解决平津问题。可照傅方代表提议，傅方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根据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并由双方代表于3日内规定具体办法，于1月12日下午1时开始实施。平津两处办理完毕后，即可照此办法解决绥、塘问题。复电还指出，对傅方提议，可大胆答应，表示仁至义尽。

收到毛泽东复电后，林彪、聂荣臻立即与周北峰、张东荪举行正式会谈。周北峰又提出将新保安、张家口、怀

来作战被俘人员一律释放，不作战俘对待；军队、行政、文教等人员都给予安排，给予生活出路；对傅所属军政人员已往的罪过不予追究等。

林彪、聂荣臻作了答复。他们说：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区一律解放区化，即傅作义把军队调出平津两城，遵照人民解放军的命令开赴指定地点，用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只要傅作义让人民解放军和平接管平津，允许傅部编一个军，对傅作义不做战犯看待，在政治上给他一定地位，并允许保存私人财产。对张家口、新保安、怀来战役中被俘的傅部人员一律释放，对傅部的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凡愿继续工作的都可以留下来安排适当工作，不愿工作而愿还乡的人员都可以资遣并发给资遣费及资遣证明书，准其返乡，并嘱地方政府对其返乡后不予歧视。

1月10日，双方再次进行会谈，并将会谈的具体条件整理成会谈纪要，林、聂和周在纪要上分别签字。

纪要签字后，毛泽东估计傅方还会有考虑，蒋系军队尤其不愿这样做，他们可能借故拖延时间。果然，当周北峰回到北平将纪要交给傅作义时，傅看后一言不发，只是唉声叹气。傅给平津前线领导人发一电报，说所谈有关部队问题的原则，需缜密计划，妥慎实施。因为部队相当复杂，打通思想及说服工作非仓促可办，故部队出城时间，须视准备工作进行之程度及双方细节问题具体商约定。即派负责代表前往商谈。傅作义这番话反映了他指挥蒋系军队接受和平改编有一定困难，也有等待观望的想法。毛

泽东批准了林彪、聂荣臻的请示，允许天津守敌推迟一天出城，至迟要在13日以前开出城外，否则，将于14日攻津。毛泽东指出：“天津攻克后，傅作义必感恐慌，势必被迫照我意见去做。”一月上旬，人民解放军扫清了天津外围据点，劝告守军于13日13时前开出城外接受和平改编，但为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等人所拒绝。天津是国民党经营多年、耗资巨大、具有现代化坚固设防的大城市，也是解放战争以来，人民解放军攻坚作战中攻击的一个最坚固的城市。无论是傅作义还是天津守军，都估计人民解放军短时间不可能攻克天津，因此对我之警告置若罔闻。他们又一次低估了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力和战斗力。林彪、聂荣臻向中央军委报告说：“天津战斗开始后，至多30小时即可全部解决。”

第三次谈判。

1月13日，傅作义派邓宝珊、周北峰等人到达通县，和平津前线领导人再次举行谈判。邓宝珊是华北“剿总”副总司令，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傅专门把他从包头接来与我们进行谈判。邓、周到达平津前线司令部后，聂荣臻对他们说：由于傅方拖延太久，天津已下令攻击，现傅对津只有下令迅速停止抵抗，对北平应照原改编方案提出实施办法。在谈话中，邓宝珊提出了另外两个问题：“过渡时期，军队改编用人民和平军名义”；“傅拟将华北全部担子交邓负责出头。”为防止节外生枝，聂荣臻当即表示我方不能同意这些意见。

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

声明叙述了南京国民党政府撕毁国共两党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发动内战两年半来所犯下的严重罪行。叙述了在两年半的过程中，歼灭了国民党的主要军事力量。人民解放军无论在数量上、士气上和装备上均优于国民党的残余军事力量，只要解放军再作若干次重大攻击，全部国民党统治机构将归于消灭。声明抨击了蒋介石1949年1月1日提出的、以保存国民党宪法、法统和军队为条件的所谓和谈建议之后，提出了八项和谈条件：申明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

“（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的一切权力。”

1月14日上午10时，人民解放军5个纵队、23个师共34万人，在强大的炮兵、坦克、装甲车和工兵协同下，对天津发起攻击，号称“固若金汤”的天津城防迅速被解放军突破。接着，进行了激烈的巷战。我军只用了29小时，就全歼守敌13万。天津的迅速解放给北平的和平解决加了最后一次“催化剂”。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与邓宝珊、周北峰继续进行会谈，达成了北平和平解放初步协议。

鉴于傅作义在整个谈判中的情况，为了防止出现签约

而不践约的情况，1月16日，林彪将一封以他和罗荣桓名义致傅作义的公函交给了邓宝珊，请邓转交傅作义。这封公函历数了傅作义追随蒋介石打内战的错误，指出他只有放下武器才有出路。公函措词严厉，不允许再借和谈拖延时间。当天，中央军委电示林、罗、聂，指出如果傅作义指挥不了中央系，不履行协议就攻击北平。电文如下：

“（一）积极准备攻城。此次攻城，必须做出精密计划，力求避免破坏故宫、大学及其他著名而有重大价值的文化古迹。你们务必使各纵首长明了，并确守这一点。让敌人去占据这些文化机关，但是我们不要攻击它，我们将其它广大城区占领之后，对占据这些文化机关的敌人再用谈判及瓦解的方法使其缴械。即使占领北平延长许多时间，也要耐心地这样做。为此，你们对于城区各部分要有精密的调查，要使每一部队的首长完全明了，哪些地方可以攻击，哪些地方不能攻击，绘图立说，人手一份，当做一项纪律去执行。为此，你们必须召集各攻城部队的首长开会，给予精确的指示。为此，你们指挥所要和每一个攻城部队均有准确的电话联络。战斗中每一个进展均须放在你们的指挥和监督之下。”

这次谈判后，傅作义信守诺言，认真执行协议。1月17日，苏静随邓宝珊将军进入北平。苏静受到傅作义的热情欢迎。苏静同王克俊、崔载之、阎又文（华北“剿总”政工处副处长）具体协商起草了《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协议分正文和附文两部分。

协议正文规定：

为迅速缩短战争，获致人民公议的和平，保全工商基础与文化古迹，以期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使国家元气不再受损伤，经双方协议，公布下列各项：

（一）自本月22日上午10时起双方休战；

（二）过渡期间，双方派员成立联合办事机构，处理有关军政事宜，组织与人选详见附件；

（三）城内部队兵团以下（含兵团）原建制原番号，自22日开始移驻城外，于到达指定驻地，约一月后实行整编。整编原则详见附件；

（四）移至城外之部队，可携带一星期之补给量，以后由联合办事机构负责补给；

（五）华北总部成立结束办事处。其工作为对出城部队之管理约束，并与联合机构联合办理出城部队之补给事项。其结束之时间，候以上工作逐步移交于人民解放军前线司令部及其补给机构接管完毕为止；

（六）城内秩序之维持，除原有警察及看护仓库部队外，根据需要暂留必要部队维持治安，候解放军警卫部队入城后，逐项接替之，但傅作义先生仍得留必要之警卫部队；

（七）北平行政机构及所有中央地方在平之公营公用企业、银行、仓库、文化机关、学校等暂维现状，不得损坏遗失，听候前述联合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安全；

（八）河北省政府及所谓机构，暂维现状，不得破坏遗失，听候前述联合办事机构处理，并保障其办事人员之

安全；

（九）金元券照常使用，听候另定兑换办法；

（十）军统、中统情报人员停止活动，听候处理。除违背此项命令另有企图从事破坏行为，有确凿证据者依法处理外，一律不咎既往；

（十一）一切军事工程一律停止；

（十二）在不违背国家法令下，保护在平各国领事馆、外交官员及外侨生命财产安全；

（十三）联合办事机构成立后，即释放政治犯。原华北区被俘高级军官于北平交接后一律释放（中下级军官可随时释放）；

（十四）原华北区伤患官兵之医疗，阵亡者之安葬，遗属之抚恤，军眷之安置，在双方协助下仍得由华北总部结束办事处分别妥善处理；

（十五）邮政电信不停，继续维持对外联系（派军事代表检查）；

（十六）各种新闻报纸，仍继续出刊，候后重新审查登记；

（十七）保护文物古迹及各种宗教之自由与安全；

（十八）人民各安生业，勿相惊忧。

协议附文规定：

（一）联合办事机构以7人组成之。解放军方面为4人，华北总部方面为3人。解放军方面为主任，华北总部方面为副主任。解放军方面参加者为叶剑英、陶铸（东北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徐冰（新任北平市副市长）、戎

子和（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长），叶剑英为主任。华北总部方面人员由傅先生指定之；

（二）部队移至城外后，即着手整编为人民解放军。

人民解放军制度包括各点：

- 1、建立政治组织及工作；
- 2、实行官兵平等；
- 3、废除打骂制度；
- 4、执行命令政策；
- 5、服从群众纪律等。

人事方面概由解放军同意任命，其原则如下：

- 1、能力称职，愿意继续服务者，则继续服务；
- 2、能力优异者且可提任；
- 3、不适任者予以调整；
- 4、志愿深造者予以学习机会；
- 5、不愿继续服务者保障其生命财产眷属之安全。如

愿返籍者亦可予以便利；

（三）联合办事机构系临时性质，接交完毕后则一切归军事管制委员会管理。在接交期中，联合办事机构及军事管制委员会均直接归前线司令部指挥，以后由联合办事机构移交前线司令部接收转交军事管制委员会管理之；

（四）前述正文附件各项，除正文第11条、第12条、第17条、第18条系由双方代表协议者外，其余均分别请示平津前线林司令、罗政委、聂司令及华北总部傅总司令同意修正后议定者。

“协议”要点经中央军委审查批准后，1月20日，

陶铸、徐冰、戎子和进入北平市。当晚，傅作义设宴欢迎，并具体磋商了交接工作。

接着，傅作义召集高级军政人员会议，宣布“协议”要点，并作了讲话。他嘱咐大家努力保护公共财物和档案文书，安心工作，准备接管，将来都会有妥善安排工作的机会。大多数人表示赞同“协议”，但也有少数人如丧考妣，痛哭流涕。李文、石觉（兵团司令）提出：他们是蒋介石的学生，和蒋有特殊关系，要带必要的几个师长飞回南京。傅作义事先同平津前线司令部商妥，当即答复：“可以允许，但不得影响部队对‘协议’的执行，你们要带走谁，连同你们两位离开后代理人是谁，请当场指定。”李、石当场写了代理人的名字交给傅作义，后带一部分团以上军官乘飞机南逃。傅作义将“协议”要点正式下达到各部队执行。

1月22日，傅作义公布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实施办法条文。这一天，北平城内广大市民奔走相告，以惊喜的眼光围在每一张公告前阅读条文。各报馆发行的《号外》，很快被抢购一空。长期积压在人民心头的苦闷、恐惧一扫而光，呈现出欢天喜地的景象。人们盼望解放军早日进城，称赞傅作义的和平之举。

22日下午，阎又文代表傅作义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与会者56人，美国新闻处、南京国民党行政院新闻局也派人参加。宣布了《傅总司令文告》，即和平协议。

为了防止出城军队与人民解放军发生误会和冲突，傅作义作了妥善安排，让王克俊对各部队将领做了说服工作，

让他的骑兵 4 师师长刘春芳带头向城外开出，给所有部队有秩序地开出起个带头作用。城内国民党军从 1 月 26 日起，以师为单位向城外指定地点开出，到 31 日结束。此时，傅作义也撤出中南海，回到北平西郊原总部驻地。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北平警备司令部成立，程子华任警备司令兼政委，彭明治、吴克华任副司令，莫文骅任副政委，刘道生任政治部主任。人民解放军担负警备任务的是东北野战军第四十一军（原四纵）。1 月 31 日，莫文骅带领一二一师部队，首先从西直门进入北平市，与原在城内执勤的傅部交接防务。北平城门口，换上了佩戴“平警”臂章的解放军战士，鲜艳的红旗在北平城头飘扬。

中共中央于 2 月 2 日，向林彪、罗荣桓、聂荣臻、薄一波诸同志及东北、华北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发了贺电，热烈庆祝这一伟大胜利。称赞北平和平解放是一个范例。指出陷于四分五裂动摇崩溃境地的国民党反动政府，除了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遵循人民的意志和北平的范例实现真正的民主的和平以外，只有被歼灭。新华社也先后发表了《执行毛主席八项和平条件北平宣告解放》、《北平解放经过》、《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原因》等重要文章，深刻地阐述了北平和平解放的原因、经过及其重大的历史意义，给尚在抵抗的国民党军残余力量指出了光明的道路。

2 月 3 日，这天，北平城沸腾了。从早晨起，人们就一群群一队队地向天安门广场拥去。9 时半，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等领导人走上天安门箭楼检阅入城部

队。前门广场上，欢迎解放军的人群象海洋，各式各样、猎猎飘动的旗帜象翻腾的海浪。人们高举着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巨像。工人、学生、职员、教授都来了。10时，4颗照明弹升上天空，庄严隆重的入城式开始了。人民解放军一路从永定门入城，一路从西直门入城。一支装甲部队在珠市口与群众相遇了。欢迎的行列在左边，部队在右面。人们狂热地招手、呼喊，激动地流下了眼泪。他们跑进了解放军的行列，与战士们拥抱在一起。群众在装甲车上写道：“你们来了，我们很快乐！”“真光明呀！”“同志们！加油呀！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炮兵部队出现了：一门巨大的榴弹炮上，骑着一个小孩，他高举手里的旗子笑着过去了。装甲部队、摩托化警卫部队过来了，一位老人高兴地说：“这口气可喘过来了！”还有的说：“我们老百姓有了这样强大的武装，任何反动派也不敢再欺负我们了。”英雄的骑兵部队，步兵部队过来了，他们被人称作“暴风雨式部队”、“塔山英雄部队”。一位身挂6枚奖章的战斗英雄，被人们热烈地围着、拉着。一位女学生跑上去羡慕地摸摸他胸前的“毛泽东奖章”。这时，欢迎的人们已经站了整整一天，忘记了寒冷，忘记了疲劳，依恋地不愿离开这些英雄。他们与解放军汇合在一起，高唱“我永远跟着你们前进”，昂然通过一向被帝国主义作为禁地的东郊民巷。

2月12日，北平市2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大会，隆重庆祝北平和平解放。北平市第一任市长、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讲话。他庄严宣告：北平市人民政府成立了！

北平市人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权力机构！古都获得了新生！接着，工人代表、学生代表、民主人士代表和解放军“塔山英雄团”代表先后讲了话。他们一致表示要在中共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同心同德，努力奋斗，将革命进行到底，把满目疮痍的旧北平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新北平。

傅作义发表和平解放通电

傅作义将军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将北平完整地交给人民，这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根本的转折点。从此，他摈弃了“戡乱剿共”的错误政策，丢掉了保存实力的不实际想法，转到人民方面来了。但是，他是在急骤的革命浪潮推动下走上这条正确道路的，从政治立场上也真正站到人民方面来还有一个不小的弯子要转，这表现在1949年1月下旬他准备向全国发表的通电上。象傅作义这样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在短时间内政治立场转变不过来并不奇怪。而由于中共中央对傅作义采取了真诚团结的政策，由于傅作义具有爱国精神，在不长的时间内，他的政治立场转变得那样好，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一位国民党爱国将领真诚合作共建祖国的一个范例。

傅作义发表和平解放通电的经过是这样的：

1949年1月27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向中央军委报告，傅作义准备发表公开文告，底稿已经新华社转给中央军委。在这篇文告中，傅不谴责南京国民党政府发动内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也不谈他执行“戡

乱剿共”政策的错误，也不表示他今后愿为人民事业服务，谈的主要内容是为了获致人民公议之和平，为了保护文化古都，他寻求了和平之路。1月30日，毛泽东给林、罗、聂复电，说明我们必须帮助傅作义转变立场的重要性，指出：1月16日用林、罗名义给傅的公函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苏静依照你们的吩咐叫邓宝珊压下此函未交傅作义，是一个失着。为此，必须叫邓宝珊在我军入城的那一天或前一天将此公函交给傅作义，以便新华社于我军入城的那一天将此公函连同宣布谈判经过的新闻一齐公开发表，在入城第二天的北平报刊上登载出来，以利改编其军队，使他不能再发表这类通电。傅如发电，应照李济深等56人对时局声明，及过去吴化文、曾泽生通电的立场（你们将这些文件交给他），公开声明反对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政府，愿率所部听候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今后愿在中共领导下为人民事业服务；并须指出自己过去服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戡乱剿共”伪令，进行屠杀人民的反革命战争，是绝对错误的，是应当受到处罚的，现在愿意痛改前非，将功折罪。邓宝珊接到平津前线领导人要他把1月16日公函交给傅作义的通知后，立即将此函交给傅冬，傅冬又未将此函交给傅作义。1月31日，新华将此公函连同《执行毛主席八项和平条件北平宣告和平解放》的新闻一起发表出来。该公函全文如下：

“傅作义将军：贵将军接受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所谓，“剿匪戡乱”之伪令，率领所部数十万反动军队向着绥远、察哈尔、热河及山西北部人民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发动残

酷的进攻。先后攻占卓资山、集宁、清水河、和林格尔、凉城、丰镇、陶林、兴和、商都、尚义、张北、张家口、宣化、怀来、涿鹿、阳原、蔚县、广灵、天镇、阳高、怀仁、左云、右玉、山阴、延庆、龙关、崇礼、赤城、沽源、康保、宝昌、多伦、化德、涿水、易县、望都、完县、河间、高阳、任邱、安新、雄县、新镇、容城、肃宁、蠡县、博野、霸县、永清、固安、安次、胜芳、古北口、三河、香河、武清、宝坻、宁河、玉田、丰润、平谷、蓟县、遵化、兴隆、迁安、卢龙、乐亭、昌黎、抚宁、承德、滦平、丰宁、隆化、平泉、青龙、凌源、凌南诸解放区名城、重镇、县治及广大乡村。贵部军行所至，屠杀人民，奸淫妇女，焚毁村庄，掠夺财物，无所不用其极。在贵军管辖地区则压迫工、农、兵、学、商广大人民群众，出粮、出税、出力，敲骨吸髓以供贵将军及贵属所谓‘戡乱剿匪’之用。在贵军及贵属统治之下，取消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压迫一切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使其丧失合法地位，压迫青年学生们的爱国运动。贵将军又复下令破坏保定公共建筑及公用物资，炸毁平宁路滦河铁桥，在北平城外平毁村庄，在北平城内逮捕无辜人员，斩伐风景树木，拆毁古迹材料。贵将军及贵属在天津城内外之措施，亦复如此。本军奉命征讨，全为吊民伐罪。贵将军不敢野战，率领数十万军队退入平津，据城抵抗，使两城人民受尽痛苦。本军迭次通知贵将军及贵属，顾念两城数百万人民之生命财产，数千年之文化古迹，国家前途所系之轻重工业及贵属官兵之身家性命，提出和平缴械或出城改编两项办法。

天津方面，市参议会代表出城谈判，本军当即表示欢迎，并提出下列诸点：（一）本军甚望和平解决，以免天津遭受破坏。（二）天津守军应自动放下武器，并保障不破坏公私财产及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三）本军保障一切自动放下武器之官兵个人及家属生命财产之安全。（四）如果守军不愿自动放下武器而欲抵抗到底，则本军将采取攻击行动。破城之日，守军方面诸反动领袖不能按照在小城市及乡村中作战时被本军所俘敌方官兵一样待遇，而将加重其处罚。市参议会代表与本军代表谈判两次，均为天津城防司令陈长捷及62军军长林伟俦所破坏，以致毫无结果。贵将军复于最后时机，命令天津守军坚持匪首蒋介石伪令，抵抗到底。本军迫不得已，乃于本月14日上午10时，开始总攻，至15日下午3时即解决战斗，贵部10万余人全部被缴械，匪首陈长捷、林伟俦等均被俘虏。足证守军之抵抗，毫无作用。现在天津业已解放，人民重见天日，欢声雷动，迎接人民解放军。北平被围业已余月，人民痛苦日益增重。本军一再推迟攻击时间，希望和平解决，至今未获结果。贵将军身为战争罪犯，如果尚欲获得人民谅解，减轻由战犯身份应得之罪责，即应在此最后时机，遵照本军指示，以求自赎。办法如下：（一）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如贵军及贵属能够做到这些，则本军保证贵部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对于贵将军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予以减轻或赦免。（二）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意自动放下

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则本军为保全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做。本军可以允许贵军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上述两项办法，任凭贵将军及贵属自由选择。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1949年1月17日上午1时起，至1月21日下午12时止。如果贵将军及贵属竟敢悍然不顾本军的提议，欲以此文化古城及200万市民生命财产为牺牲，坚决抵抗到底，则本军为挽救此古城免受贵将军及贵属毁灭起见，将实行攻城。攻城时，本军将用精确战术，使最重的打击落在敢于顽抗者身上；而对于不愿抵抗之贵属，则不给任何打击，并予以宽待。城破之日，贵将军及贵属诸反动首领，必将从严惩办，决不姑宽，勿谓言之不预。”

新华社在公布这封公函时作了如下说明：“此公函系于1月16日在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当面交给傅作义将军的谈判代表邓宝珊将军和周北峰将军者。当日邓宝珊将军偕同林彪将军的代表入城联络。傅作义将军即决心接受人民解放军的指示，愿令其所部出城听候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此后数日，又经数度接洽，解决关于双方交接过渡期间的若干问题。傅作义将军于21日将协议诸点（但不完全）经国民党中央社公告，傅部即于22日开始履行协议。至本日（31日）傅部主力移动完毕，人民解放军开始入城接收北平防务。”

傅作义看到登载着此函的《世界日报》后，疑虑、不满情绪顿生；加之，我下层工作人员做了一些不应该做及

不礼貌的事情，如傅作义邀邓宝珊出城午餐，车子被守卫城门的战士阻拦等，使傅作义颇为愤慨。2月3日他给林彪、罗荣桓写信说：“两年半的戡乱战争，是严重的灾难”，“我愿担当错误责任”，“北平和平并不是为了我个人生命财产安全，所以留在北平，正是为了接受贵方的惩处”等等。

中共中央对争取傅作义站在人民方面极为重视，就在傅给林彪、罗荣桓写信的同一天，毛泽东给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叶剑英、彭真发电作了如下指示：在过去的谈判中，傅作义的态度是不对的，此次做得是对的。他的战犯罪，我们已经公开宣布赦免，断不会再有不利于他的行动。他不应当搞什么中间路线，不要发表这种通电，应发表站在人民方面说话的通电，如果他暂时不愿发这样的通电，也可以等一等想一想再讲。以上意见应向傅本人及傅的左右反复说明，特别是对邓宝珊、周北峰、王克俊、阎又文等人，你们要多做工作。入城后，请林彪和傅、邓见面扯开谈一次。

2月4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将傅作义写给林、罗的信转给中共中央，并报告了他们谈话的方针、内容。电报中说，过去对傅作义在军事上、政治上作斗争是正确的，现在应采取团结的方针，我们准备根据这个方针与傅作义谈话。根据傅起草的通电稿情况和他的来信，准备给予劝说、帮助，并指出他思想上的错误。林、罗、聂还提出，在谈判中可否答应在我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时，邀请他参加，或者请他将来参加华北政府或中央政府工作。对

其被俘军官可答应释放，但陈长捷仍须判罪，可缓刑。

中共中央复电同意上述请示，并指出：“依整个形势看，武汉、京、沪、长沙、南昌、杭州、福州、广州，均有按照北平方式解决的可能。因此，争取傅作义站在我们这方面十分重要。”

林彪、聂荣臻、叶剑英等于2月8日在北京饭店宴请傅作义、邓宝珊，并作了亲切谈话。林彪说：北平因和平解决，避免了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使文化古都未遭受破坏，避免了双方官兵的伤亡，替国内树立了北平方式的新榜样。傅作义将军对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是有贡献的，今后应为人民服务，我党愿意与一切党外真诚愿为人民服务的人合作。共产党人绝不采取党员包办方式，而是采取党员与非党员合作的政策。共产党对一切对革命事业有贡献的人，绝不亏待他。我党对傅作义将军今后是采取团结的态度，并愿请傅将军参加华北或将来中央政府的工作，盼傅今后努力勿懈。傅作义也谈了自己的心情，他说，他过去内心矛盾很大，主观上有心替人民做事，而客观上反替有钱人保了镖。国民党实行“戡乱”，进行内战，他是参加了的，他是错误的。在解放军占领沈阳之后，他即认为不能打了，中国的情况变了，共产党变为中国的主力了，中国今后当以共产党为领导了。他今后愿以人民的身份为人民服务。林彪接着说，过去给傅将军的公函是合乎他过去的行为的，最近公布此信，乃是将过去之错误作一结论，以便开始新的合作。我们共产党人政治上任何时候都是清清白白的，明辨是非，既不因过去之错而抹煞今日北平之

功，也不因今日北平之功而含糊过去之错。过去，傅作义曾对人说，林彪、聂荣臻比他岁数小，他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败在他们手下丢人。林彪联系说到傅之失败，并非个人才能问题，东北、华北我军之胜利，亦并非个人才能问题。国民党违反人民利益为人民所反对，故必失败。中共为人民谋利益，得到最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力量不可抑制地增大，故傅将军的失败非因个人才能问题，而系整个国民党反动的结果。聂荣臻就我党的民主政策问题作了说明。叶剑英对傅作义所表示的积极协助共产党接管北平，致以钦佩之意，并谈到自我批评之重要。邓宝珊将军也谈了话，他说，他完全同意这些谈话，今天的谈话把一切问题都谈清楚了，他很满意。2月中旬，陶铸等到西郊傅的住所看望傅作义，并向他和王克俊赠送了《毛泽东选集》及一些有关党的政策的书籍。这些，对启发傅作义的思想都很有帮助。

2月23日，傅作义、邓宝珊偕同阎又文到平山西柏坡拜见毛泽东。当晚，毛泽东亲自到住处看望他们。傅首次见毛泽东主席，当时他着军装、行军礼，气氛严肃，不苟言笑。毛泽东双手握住傅作义的手亲切而又风趣地说：“过去我们在战场见面，清清楚楚；今天我们是姑舅亲戚，难分难舍。蒋介石一辈子玩码头，最后还是你把他甩掉了。”之后，毛泽东、周恩来同傅作义进行了重要而恳切的晤谈。说到对傅作义原有人员的政策时，毛泽东说：我俘虏你的人员，都给你放回去，你可以接见他们。我们准备把他们送到绥远去。”傅作义又说：“给我？我怎么

处理呢？还要送到绥远去，为什么？”毛泽东说：“国民党不是一贯宣布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吗？他们到绥远可以现身说法，共产党对他们一不搜腰包，二不侮辱其人格，可以帮助在绥远的人学习学习，提高提高嘛！”谈到绥远问题，毛泽东说：“有了北平和平解放，绥远问题就好解决了，可以先放一下嘛，等待他们起义。还是以前说的，给你们编两个军。对于你们来说，走革命的道路，要过好几个关，但主要的是要过好军事关。这一关过好了，以后土改关、民主改革，将来还有社会主义关等就好过了。”毛泽东的谈话，使傅作义受到鼓舞，疑团顿消，心情神态马上变得轻松愉快起来，并同周恩来、杨尚昆等领导同志合影留念。傅作义返回北平后，精神焕发，心情欢畅，与赴西柏坡前判若两人。邓宝珊说：“不知毛主席是如何以一席话就能把傅先生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的。”

1949年3月23日，党中央从河北省平山迁到北平，毛泽东在西苑机场检阅人民解放军，傅作义应邀参加了检阅仪式。当他看到受阅部队威武雄壮、用的全是缴获的美式武器装备，感受颇深。后来，毛泽东在香山驻地，又一次接见傅作义，并宴请傅作义和邓宝珊等。3月下旬，原傅作义部被俘的将级人员释放出来，傅作义在西郊住处接见了这些人员，向他们传达了毛主席接见他时的谈话。并说过去我把你们领到错误路上了，由我负责，今天总算是走到正道上来了。使傅作义更为感动的是，中共中央决定，不仅将新保安、张家口、怀来、康庄被俘国民党军官全部

释放，还将天津被俘的军官绝大多数释放，送回北平。

4月1日，傅作义向全国发出北平和平解放通电。通电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毛主席、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及国民党中的爱国的朋友们：

北平的和平工作，自1月22日开始，现已圆满完成。地方未曾遭受破坏，人民的生命财产，没有遭受损失，文物、古迹、工商、建筑，也都得到保全。北平的和平解决，蒙全国各方所称许，认为是实现全国和平的开端。现在当全国和平商谈之际，在这个时候，我愿把我的认识和意见，向全国各方说明。

两年半的内战，我个人内心和行动，主观和客观，是在极端矛盾中，痛苦的斗争着。北平的和平实现，就是由认识到行动，自我痛苦斗争的结果。现在回忆既往，我感觉我最大的错误，就是执行了反动的戡乱政策。我们在实现所谓戡乱的时候，每天说的虽是为人民，而事实上一切问题，却是处处摧残和压迫人民。我们的军队，在乡村是给大地主看家，在大城市替特权、豪门、贪官、污吏保镖。我们不仅保护了这些乡村和城市的恶势力，而且还不断的在制造和助长这些恶势力。种种错误的恶因，反映在政治上，就是腐烂；反映在经济上，就是崩溃；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控制和镇压青年学生的反抗；反映在社会上，就是劳苦大众的生活，一天一天的贫困，上层剥削阶级奢侈淫糜的享受一天一天的增高；反映在外交上，就是依附美国；反映在军事上，就是由优势变成劣势。所有这

些都是因为违反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最后为人民所抛弃。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成功呢？这是因为共产党以工农大众和全国人民利益为基础，在乡村彻底解决了土地问题，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拥护；对城市工商业，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铲除官僚资本，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共产党的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已经得到全国各民族党派和人民的拥护。新民主主义不但科学的解释了革命的三民主义之内容，而且正确的说明了中国革命的去、现在和将来。新时代的民族民主革命，已经不是属于旧的范畴，而是属于新的范畴，必须有工农阶级和代表工农阶级的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证革命政策的彻底执行和革命任务的彻底完成。共产党人既然对于历史有了正确的认识，又有为人民服务的艰苦奋斗的精神，所以一天一天的得到成功。正确的政策是真正和平的前提，也是真正和平的保障。所谓戡乱政策，既然完全错误，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既然完全正确，我们就必须公开反对所谓戡乱政策，真诚的实现和平，不应该再犹豫、徘徊，违背人民的愿望。北平的和平，就是遵从人民的意志和愿望，勇于自觉，勇于负责的认识和行动，符合于正确的政策，符合于毛泽东先生所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这种和平是真正的和平。一切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都应该深切检讨，勇于认错，以北平和平为开端，努力促使全国和平迅速实现，然后国家才能开始建设。今天，中国人民民主事业，是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全国各民主党派，国民党的进步人士，和全国各民主阶层，共同奋

斗。这已经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作义本此认识，今后愿拥护中共毛主席的领导，实行新民主主义，和平建设新中国。

傅作义

1949年4月1日”

全国各大报登载了傅作义通电全文。当时世界和平会议正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傅作义的通电作为大会文件发给了与会人员。

4月2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亲自复电傅作义。复电全文如下：

“傅作义将军：

4月1日通电读悉。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的政策，是完全错误的。数年来中国人民由于这种反革命内战所遭受的浩大灾难，这个政府必须负责。但是执行这个政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文武官员，只要他们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不问何人，我们均表欢迎。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与有劳绩。贵将军复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

毛泽东

1949年4月2日”

双方协力交接城市改编军队

北平解放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做好城市的接管工作。早在1948年底，中共中央就为接管平津两市做了准备。1948年12月13日，中央军委决定聂荣臻为平津卫戍司令、薄一波为政委、彭真为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为市委副书记、北平军管会主任兼市长。12月中旬，彭、叶率3000多名干部进至涿县，用半个多月时间学习党的城市工作方法和政策。12月22日，以平津前线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罗荣桓的名义，公布了解放北平、天津诸城市的《约法八章》。简略地说是：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民族工商业；没收官僚资本；保护学校、医院、文化体育机关、体育场所及其它一切公共建筑；凡属国民党省市县各级政府、机关的官员、警察、保甲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本军一律不加俘虏或逮捕，并责成上述人员各安职守；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本军部队及警备司令部或公安局投诚报到；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城内一切市民及各界人士，均须共同维护全城秩序。1949年1月1日，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良乡宣告成立，于2月2日入城办公，并以主任叶剑英、副主任谭政的名义，向全市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宣布本会为全区军事管制时期的权力机关，统一全区的军事和民政管理事宜。布告重申继续遵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颁布的《约法八章》，仰全市人民同心协

力，为彻底完成军事管制时期的紧急任务及人民民主建设事业而奋斗。

为了妥善处理北平和平解放的军政过渡工作，在过去双方的和平谈判中，傅方提出双方派人成立联合办事机构。这个建议得到中共中央军委的赞同。1949年1月29日，联合办事处正式成立，人员组成如下：

主任委员：叶剑英

副主任委员：郭宗汾（原国民党军华北“剿总”总副司令）

委员：陶铸、徐冰、戎子和、周北峰、焦实斋（原国民党军华北“剿总”副秘书长）

联合办事处成立后，全体委员和工作人员紧张工作，密切配合，为办理交接事宜，做了大量工作。为了防止冒名接管或不按规定手续接管的混乱现象发生，联合办事处规定，在进行接管前，先由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提交办事处会议通过，由联合办事处发给正式介绍信并携带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接管命令，方可进行接管。较大单位的接管，并由联合办事处中的傅方人员陪同前往，交待政策，安定人心。仅月余时间，就接管了全市包括公营企业、国立各院校、博物馆、图书馆在内的近千个单位。联合办事处的工作错综复杂、千头万绪，经过有领导、有步骤地进行，使得金融不乱，物价平稳，水电粮煤不缺，物资仓库没有损失，人民安谧如常。200万人的大城市，能够如此快地交接好，这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联合办事处在交接城市的同时，协助平津前线司令

部，完成了对国民党军 1 个总部、2 个兵团部、8 个军部、25 个师，连同非正规部队 25 万人的改编工作。

2 月 21 日，平津前线司令部、政治部召开改编会议，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陶铸及傅作义将军代表郭宗汾将军等均亲临主持。受编部队师以上军官参加。会议由陶铸致词并宣布了改编方案。此方案由联合办事处和傅作义将军几次交换意见，大家认为合理，并已在受编国民党军兵团一级军官会议中宣布，均无异议。方案规定：“（一）原国民党军华北‘剿总’第四、第九两个兵团部和 8 个军部的三级指挥机构应全部结束，其所有工作人员与直属队分别编入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与各兵团部及各军部，其所属的 25 个师则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师，各特种部队则与解放军的特种部队合编。（二）原国民党部队中的政工人员，愿留解放军工作的，须经过训练，再行录用。（三）原国民党部队各级军官凡接受解放军分配工作的，其本人和家属均按解放军各级干部和家属享受同样待遇。（四）原国民党部队军官中愿意学习深造的，按其工作职务与程度，分班组织学习。学习期间，其待遇与在职干部相同。（五）国民党军官中，愿意回家的，按以下规定处理：甲、回家军官一律按原薪发给三个月薪饷。乙、由平津前线司令部发给车票，在解放区沿途供给食宿（包括其家属在内）。丙、除不许携带武器及公用物资外，一切私人财物均可全部带走。丁、回家的国民党军官，可按其工作职务与需要，酌情带一两名护兵同行。戊、在解放区居住的国民党军官，回家后可

分得应有的一份土地；如其本人系地主家庭，则其土地财产不论已分与未分，均按土地法大纲第八条之规定处理。至其本人，只须今后遵守民主政府一切法令，其过去对于农民的行为如何，一概不加追究。已、回家的国民党军人，一律发给《参加北平和平解放证明书》，以后愿来解放军工作，仍然受到欢迎。”陶铸指出，采取以上措施，是因为参加此次北平和平解放的国民党军官有功国家，有功人民，并且给全国树立了一个和平解决的榜样，所以解放军和人民愿意予以奖励和优待。接着，林彪、罗荣桓讲话，他们说，这次改编不仅仅是改旗易帜，换个番号，而是要使北平原有的国民党军队在实质上成为人民解放军，成为为了人民、解放人民、属于人民的军队，这就必须从政治性质上、思想作风上来个彻底的转变。至于个人的去留，只要愿意进步，愿意参加革命，拥护中共政策的人，一概允许参加工作。最后，刘亚楼宣布了改编部队新的指挥关系与供给关系，并颁发了独立师新番号。当天晚上，平津前线司令部、政治部设宴招待全体与会军官，并演出文艺节目，深夜始散。会后，平津前线司令部奉中国人民解放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宣布了兵团、军、师领导干部的任命，除不愿留下工作者准予回家或休息外，其余任命如下：原第九兵团副司令葛宴春任人民解放军华北第二兵团副司令员。原一〇一军军长李士林是受编部队中最老的一个军长，8个军中只有他和安春山是正军长，其他军长均系代理，任命李为人民解放军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根据傅作义提议，公布安春山另有任用。原一〇一军副军长

张辑戍任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二军副军长。原一〇四军副军长邓世通任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副军长。原三十五军代军长朱大纯任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副军长。原十三军代军长随邦捷任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四军副军长。原三十一军代军长孙子仁任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副军长。25个师的师长，除两名不愿留下工作者外，均为原来的师长。

为使受编部队从政治性质上和思想作风上逐步实现解放军化，平津前线领导机关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团结教育广大官兵完成这一转变。他们从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中，抽调了一批优秀的政工干部，学习了改编工作的方针、方法和政策之后，派到受编部队进行工作。这些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干部，耐心向受编部队的广大官兵讲形势、讲政策，提高大家的思想认识，揭穿某些造谣诬蔑；同时，宣布平津前线司令部的有关纪律，告诫个别表现不好的军官继续安心工作，阻碍工作者一律撤职，对于捣乱者必须查究，杀人者偿命。实行这些办法后，受编部队基本上稳定。在这个基础上，对一部分表现好的军官，继续留在部队中工作，其余军官则集中学习，争取他们转变思想。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绝大多数出身贫苦，被强迫征抓入伍，备受压迫，有着革命要求。对他们进行了两种军队对比的教育，使他们明白了国民党军队是为大地主、大资本家服务的军队，人民解放军是来自人民、为人民服务的军队。在连队中开展了各种民主活动，废除打骂制度，启发士兵自觉遵守纪律。在受编部队中还进行了以诉苦为中心的阶级教育，激发他们对旧社会、旧军队的仇恨。派进

去的干部深入士兵群众，带来了人民解放军爱兵的优良传统。解放军干部进去后，立即抓连队的伙食、卫生，亲自给士兵挑水烫衣服，给不能起床的士兵擦身子、洗衬衣，又请来理发员给大家理发。几天工夫，象叫化子一样的士兵，面貌焕然一新。因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部队要配合中原、华东的渡江作战和解放西北的行动，北平原国民党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师后，只存在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即将士兵分散编入人民解放军。原国民党二〇五师士兵中学生成份约占70%，这个师组成了教导团，经过训练后，争取他们参加人民解放军工作。只有蒋系的两个师表现顽固，抵制改编，则强令放下武器，分散编入人民解放军。

北平和平解放后，傅作义部除开到平郊待编者外，城内还有编余官兵及家属共64700余人。为妥善安排这些人员，成立了人事处理委员会，由人民解放军和傅方派人参加，在联合办事处的协助下，负责安置他们。对于愿意工作和愿意学习的人，分别做了妥善安置。对于愿意回家的发给三个月薪饷及伙食等费用，免费乘车船，并发给携带财物证明和“参加北平和平解放有功，回家后给予土地房屋使能参加生产”的起义证明，让他们返乡。

北平和平解放后双方协力交接城市与改编军队的工作，从2月至4月顺利完成，联合办事处遂告结束。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平政策的胜利，也是傅作义先生及众多的傅方工作人员为人民勤奋工作的结果。

北平和平解放具有伟大的意义

北平和平解放，不仅在当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具体地说，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1949年2月1日，新华社发了一条《执行毛主席八项和平条件北平宣告解放》的新闻，指出：北平的和平解放是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运动中最重要军事发展和政治发展之一。原有国民党反动军队及其军事机关大约20万人左右据守的北平和平解放，是执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主席所宣布的八项和平条件，以和平方法结束战争，为长江以南及其它地方的解放树立了一个榜样。

北平和平解放是人民解放军发扬传统的军事斗争与政治斗争相结合的作战经验取得的新胜利。北平能够和平解放，首先在于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战略指挥高明，在于人民解放军英勇善战，无比强大，这是根本前提。但是，“自古知兵非好战”，“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中国共产党又十分重视对敌军的政治瓦解和争取工作，制定了正确的政策。北平和平解放，使政治争取敌军工作有了新发展，创造了一个战区统帅带领几十万人，接受和平改编，北平不战而获解放这样一个在古今中外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光辉范例和新经验。对敌军实行和平改编，既不同于投降，也不同于起义，是一种新形式。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在5个月之内歼敌3个重兵集团150万人，使蒋介石在长江以北之主力部队基本上丧失殆尽，

剩下的国民党军队100多万人，分布于华东、华南、西南、西北广大地区，已面临着全面覆没的命运。他们的出路何在？是效法“天津方式”全部、彻底、干净地被歼灭，还是走“北平方式”道路，通过谈判，实现和平解放，立功赎罪，得到人民的宽容呢？北平傅作义将军之义举，给他们指出一条弃暗投明的光明大道，这对于后来和平解放长沙、四川、新疆等地，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这是其一。

北平是我国著名的文化古都，用和平方式解决，免遭战火破坏，使这座文化古都完整无损地交到人民手里，为新中国成立后建都北平创造了良好的条件。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老一辈革命家，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迁移到北平，从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开始了由农村包围城市到城市领导农村的伟大转变。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转折。中国共产党中央进入北平后，立即着手筹备，于9月召开了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选举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的领导机构，并于10月1日，正式宣布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布新中国的首都设在北京。北平的和平解放说明中国革命已经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革命历史的新纪元即将开始了。这是其二。

傅作义先生从一个国民党高级将领到成为新中国政府一位高级领导人，它本身就活生生地说明中共中央政策的正确和巨大威力。傅作义率部接受和平改编后，党中央一贯对他采取了团结、信任、委以重任政策。他曾任第一、二、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四届政协副主席，第一、二、

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水利部和水电部部长，绥远省军政委员会主席、绥远省军区司令员等职。鉴于傅作义为祖国解放、祖国统一所作出的贡献，1955年人大常委会授予他一级解放勋章，毛泽东亲自为他授勋。傅作义先生重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识到共产党伟大，社会主义优越，曾希望将来加入中国共产党。不幸，“文革”发生，他的愿望未能实现。1974年，傅作义患癌症，那时周恩来总理刚动手术不久，带病到傅的住所看望。1974年4月18日，傅作义病危，周恩来总理又一次来看望他，并俯下身去对他说：“毛主席叫我看你来啦！说你对人民立了大功的。”翌日下午1时40分，这位爱国将领与世长辞了。周恩来总理主持傅作义先生追悼会，叶剑英致悼词。1985年是傅作义诞辰90周年，全国政协编辑出版了《傅作义生平》。邓小平提了书名，以纪念这位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著名爱国人士。中共中央这一正确的政策，对于尚在台湾和其它地方的国民党人士具有很大的说服力、感召力。它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必将产生深远影响。这是其三。

北平的和平解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革命史上，是极其光辉灿烂的一页。全国人民将继承革命光荣传统，在新的历史征途上，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九五八年八大二次会议

裴 棣

1958年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以下简称八大二次会议），被称作是一次整风的会议，一次反对国际修正主义、反对混入党内的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的会议，一次大跃进的会议。这次大会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从而使“左”倾指导思想在党内取得了合法地位。本文着重谈谈国内建设中“左”倾指导思想发展的问题。

一、会议的召开

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说，经过去年冬天今年春天的大跃进，已经证明了过去三年是个马鞍形。前年是一端，去年是低部，今年是另一端，两头高中间低。有了这个高低，我们的会议好开了。又说，1957年9月八届三中全会给了我们一个鼓励，全党全国人民有了比较正确的方向。我们这个会有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的准备，有去冬今春水利、积肥大跃进的事实，这个会就好开。毛泽东这两段话说明了八大二次会议召开的背景。

所谓“马鞍形”，是八大二次会议前三年经济建设曲折发展和领导核心认识分歧的形象化概括。不过，这是一个被扭曲了的形象。1955年冬季，毛泽东认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右倾保守思想已经解决，提出现在的问题，是要不断地批判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右倾保守思想。为了加快农业和工业的发展速度，1956年初又提出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以下简称“农业四十条”）和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由于不合实际地反“右倾”，1956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发生了冒进。同年5月，党中央改变了片面反对右倾保守的提法，决定采取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这一方针为八大所采纳）。周恩来、陈云根据党中央的决定及时地纠正了1956年的冒进。1957年的经济建设，遵循八大通过的经济建设方针，稳步前进，成为建国以来效果最好的年份之一。但是，毛泽东对反冒进是有不同意见的。经过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党内“左”倾思想日益发展，在9月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了反冒进，重提“农业四十条”和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这两个东西没有写进八大一次会议的文件）；11月提出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随后又召开南宁会议、成都会议等多次会议，继续反“右倾”，批评反冒进，为确立“左”的指导思想，发动“大跃进”作了充分准备。在“左”倾思想的指导下便出现了1957年冬、1958年春的“全面跃进”。三年经济建设的曲折发展，在毛泽东看来，象1956年和1958年那样实行高速度的方针是正确的，形成了经济建设的高潮，是马鞍的两个高部；象1957年那样稳步前进是错误的，造成了建

设的低潮。是马鞍的低部。他认为，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不断地反“右倾”、反冒进，大跃进思想，高速度思想，已经为党的主要领导干部（中央和省部两级）所接受。因此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确认这一指导思想的条件已经成熟。

会议从1958年5月5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组成华北、东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军队、中直和国家机关八个代表团。

刘少奇向大会作了关于党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5月5日），邓小平作了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莫斯科会议的报告（5月5日），谭震林作了关于农业发展纲要（第二次修正草案）的说明（5月17日）。毛泽东在5月8日、17日、20日、23日大会上以及5月18日代表团团长会议上讲了话。会议自6日至22日进行小组讨论和大会发言。周恩来、朱德、陈云等都在大会上发了言。在大会上发言的还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政府各部门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的负责人，地委、县委、工矿企业、农村合作社、学校的负责人等117人，书面发言的145人。

5月23日，大会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决议》、《关于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决议》，并增选了王任重等25名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

二、“左”倾指导思想的几个问题

（一）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充分体现了党中央、毛泽东的“左”倾指导思想。

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工作报告，在说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时，系统地阐述了1955年冬季反右倾以来，毛泽东提出的高速度思想。报告写道：1955年冬，“毛泽东同志及时地提出了号召，要求以更高的速度来代替第一个五年计划原来规定的速度”。“马鞍形教训了党、教训了群众。现在全国的广大群众对于生产的跃进充满信心，而且决心把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继续提高”。刘少奇说：“建设速度的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工作报告还接受了毛泽东关于政治战线上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阶级斗争依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国还存在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等一系列错误观点。所有这些都为以阶级斗争推动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5月17日、20日、23日，毛泽东在大会几次讲话中都谈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问题。他说，这次大会做了认真的工作，制定了我们的路线。七大使全党有了个共同纲领。这次会议我们又制定了个共同纲领：全党团结一致的总路线，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总路线。毛泽东说，我们是世界第一个人口最多的国家，社会主义建设有很大发

展，我们已经看出了前途。早些时候还看不清楚多快、多大的规模，要多少时间可以摆脱落后状态、被动的状态、在世界上没有地位的状态。我们6亿人口的大国，杜勒斯不看在眼里，总有一天我们赶上英国，赶上美国，他才知道确实有这个国家。接着，毛泽东对总路线做了具体分析，他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个提法很好，是新鲜的说法，反映了人民的干劲。干劲各有不同，早就有这个提法，鼓足是个新话。力争上游从前就有了，不是新话，现在有新意。什么叫力争上游呢？从国内来说，无非就是争千斤亩，争四、五、八，争两千斤亩，争出钢的炉数。“农业四十条”现在不要12年了。有些省有些项目3年可以实现，有的省可以一年实现。大体上可在5年内实现四十条，这不是上游吗！不是多快吗！但还要好省。从国外来说，同外国比较，争取7年超过英国，15年超过美国。报纸上宣传还是15年超过英国，这次大会对这个提法有些修改，把“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改成“15年或者更短一些时间内超过英国。”有些项目如煤炭不要7年，2—3年就可以赶上了。从刘少奇的报告和毛泽东的讲话中不难看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实质就是高速度，就是短期内超过英国，赶上美国。八大二次会议闭幕后，6月21日的《人民日报》在《力争高速度》的社论中，把这种精神概括为“速度问题是总路线的灵魂。”

作为一条总路线，理应反映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但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没有达到这个根本要

求，片面强调高速度。高速度思想同毛泽东对三大改造完成后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以及反右派斗争的影响作了不适当的、错误的估计有密切关系。显然，八大二次会议确定的高速度思想，7年超英，15年超美的战略目标，是没有经过科学论证，违反客观可能性的。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道路问题，毛泽东在几次讲话中说，苏联的方法可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有另一种办法，都是搞社会主义。他说，为什么讲十大关系？十大关系就是同苏联比较，除了苏联的办法以外，是否还可以找到别的办法比苏联、欧洲各国搞得更快、更好。苏联是由上而下的方法，我们学习列宁，搞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我们的口号是多些快些好些省些，是不是高明些呢？我看是高明些，我们的共产主义可能比苏联提前到来：我们有了苏联的经验，6亿人口，三个“并举”，群众路线，一个普通的劳动者面目出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我们发展了列宁的民主集中制。整风以后，作到了真正民主，不是假民主，大家敢想、敢说、敢做，连落后阶层也积极起来了。毛泽东说，斯大林的两个口号没有辩证法，技术决定一切，政治呢？干部决定一切，群众呢？列宁是对的，他说“苏维埃加电气化”，这就是以虚带实，政治带业务，苏维埃就是政治，电气化就是技术。政治与技术结婚就产生社会主义，它俩结婚就会生儿子，就产生7年超英国，再加8年超美国这两个儿子，第一个叫超英，第二个叫超美。

在正式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会议上，认真研究

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问题，是题中应有之义。本来，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已经提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照搬苏联的方法，要走适合自己情况的路。八大一次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思想，作了富有成果的研究。八大以后，中央领导人继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很可惜，八大二次会议没有把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和道路的探索继续下去。毛泽东依照老经验，强调的仍然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实践已经证明，用阶级斗争统帅社会主义建设是错误的，不符合新形势的需要。虽然刘少奇在工作报告中重申了一些正确的原则，例如，要严格区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要继续贯彻执行“双百”方针，要正确解决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问题，等等。但是，这些原则都在“大跃进”运动中受到扭曲。

八大二次会议的空气是热烘烘的。代表们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致同意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有的组说：“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赶上美国是完全可能的。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赶，而在于敢不敢赶，主席讲话使我们从思想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速度，必将打破古今中外的一切记录，也将大大超过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速度。”许多代表认为，要实现高速度，必须继续反“右倾”，批判反冒进。他们说，刘少奇的工作报告对右倾保守思想批判得不够，对反“冒进”的思想根源、错误性质和后果论述不充分。有的代表批评反冒进说：“主席的思想是一贯的，但

是从1956年下半年到三中全会期间，主席的思想在中央委员会中贯彻了多少，值得研究。八大的报告和决议中都没有提多快好省和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八大关于二五计划指标的建议也很保守。1957年的计划已经肯定是个保守的计划。”有一位省委书记说，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他把提倡奖励私人开荒、植树、繁殖耕畜、大量养猪、扩大社员自留地、发展个人家庭副业、开放自由市场等有利于发展商品生产，促进农业生产力发展的一些积极的作法，都说成是右倾。虽然毛泽东曾在大会上说，反冒进的问题，1957年6月就已经解决了。但是在这种反“右倾”的气氛下，周恩来、陈云在大会发言中都不得不对反冒进的所谓错误做了检讨。

代表们一致同意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认为它贯串了毛泽东指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和走群众路线的精神。一位省委第一书记说，主席关于建设总路线的一个重要的基本点是要发展工业，必须加速发展农业，所以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农业四十条”。怀疑毛主席的多快好省方针的人，首先就是从怀疑“农业四十条”能否实现开始，怀疑农业发展速度。两年实践斗争证明这种怀疑是没有根据的。他说，总路线的另一个重要的基本点，是发展地方工业，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他表示，他所在的省决心提前3年或5年实现“农业四十条”；争取在5年内使地方工业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到1962年，将比1957年增长3倍多。有些省委第一书记在大会发言中，互相攀比。有的说，在多快好省总路线方针指引下，他们省1958

年近6个月水利工程的成绩就等于1957年的10倍；有的说，他们省“7个月完成的工程等于过去8年总和的4倍”。以此证明总路线的正确性和无比威力。

国务院有几个工业部提出今后5年或稍长一些时间内，我国工业建设的生产水平赶上或超过英国，15年或稍长一点时间，赶上或超过美国。有一个部竟提出，它的工业主要产品在5年内超过英国赶上美国。

文化教育工作也要实现高速度。一位市委第一书记在大会上提出如下的文化革命设想：“15年不但每个专区每个县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在广大乡村中，也都办了大学或专科学校，人民“个个都有较高的科学文化知识，象毛泽东同志曾经预言过的：大家都能够读‘资本论’，大家都懂得高等数学，什么天文学、地质学、农业学、机械学、化学、物理学、电子学等等，都会变为普通人的常识。”关于教育问题，主管的负责人在大会上说：“根据各省汇报，扫盲工作在5个省可以1年完成。全国范围3年可以完成，边远地区（西藏除外）最迟的7年可以完成。普及小学，几个省、市1年完成，全国3年基本完成，边疆地区最迟7年完成。”对照30年后的今天，我国尚有将近1/4的文盲、半文盲，可见上述的设想和目标，是多么不着边际！

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思想在成都会议上已经萌芽，这次会议上又有所发展。有人在大会发言中传达了中央领导人关于共产主义公社的设想。他说：“毛主席和少奇同志，谈到几十年以后我国的情景时，曾经这样说：那时我国的

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的梦想，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果然，这种空想共产主义思想，会后不久就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表现出来。

从以上的讨论、发言中可见，八大二次会议的代表一致拥护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拥护“农业四十条”，呈一边倒之势。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原因是，毛泽东在全党享有很高的威望，代表们认为他提出的路线、方针是不会错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党内政治生活开始不正常了，个人崇拜的气氛，不断地反“右倾”、“左”比右好的舆论，都形成一种压力，使人难以讲真话。代表中许多人是省、地、县的领导人，他们对于群众的思想感情，对于许多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不相信神话般的高速度，并非毫不知情，但是他们不敢讲同“左”的指导思想相悖的话。还有一个原因是，有些负责干部，本身就好大喜功，有“左”的思想；有些人见风行事，上级领导喜欢什么，他就讲什么。在党的“左”倾错误的形成中，上下之间相互影响。上面“左”一分，下面就“左”一寸；下面的“左”，又为中央的“左”倾指导思想提供更多的依据。在八大二次会议的活动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二）再论破除迷信

在毛泽东看来，要实现打破常规的高速度，需要有非常的

思维。因此，他在成都会议上就提出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问题。八大二次会议上又做了进一步的论证。5月8日他在第一次大会上讲话的题目就叫做“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马克思”。毛泽东说，我们有些同志有几怕，其中有的怕资产阶级教授。另外，是不是还有一种怕无产阶级教授呢？比如怕马克思，因为马克思在很高的楼上。在成都会议上我讲过，不要怕，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他脑子里有一堆马克思主义，他写了不少书给我们看。我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当教授，所以就没有读他那么多，读那么一部分基本的东西也就够了。并且我们做的东西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就要出道理，反映到意识形态上就成为理论。不要妄自菲薄，看不起自己。中国被帝国主义压迫100多年，要服从洋人，服从外国100多年，吓怕了，什么都怕。关于不怕资产阶级教授问题，5月18日在代表团团长会议上，毛泽东要求写一个近300年来的各种科学技术发明家的小传。他说，一个人能够发明什么，学问不一定好多，年纪也不一定大，只要方向是对的。他列举瓦特等一些发明家的材料以后说，总而言之，我这些材料要证明这一条：是不是贫贱者最聪明，富贵者最愚蠢，来剥夺那些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的资本，鼓励工人、农民、老干部、小知识分子的自信心，自己起来创造。要少一点奴隶性，多一点主人翁的自尊心。同日，毛泽东在看了一个报告后写了题为“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要求中央各工业交通部门、各大学、各省、市、自治区都要各自收集材料，编印一本书，

说明世界（包括中国）近300年科学、技术发明大都出于被压迫阶级。即是说，出于那些社会地位较低，学问较少，条件较差，在开始时总是被人看不起甚至受打击、受折磨、受刑戮的那些人。他写道：如果能够有系统地说明这一点，那便将鼓舞很多小知识分子，很多工人和农民，很多新老干部，打掉自卑感，砍去妄自菲薄，破除迷信，振奋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创造精神。对于我们7年赶上英国，再加8年或者10年赶上美国的任务，必然会有重大的帮助。5月20日在大会讲话中，毛泽东再次强调上述观点，并提出只有外行才能领导内行，“外行领导内行，这是一般规律。”

用什么态度和方法对待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党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是：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结合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采取这样的态度和方法，革命事业就前进，否则，革命就遭受挫折。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此时此刻，提出“不要怕马克思”、“超过马克思”的口号，而且把它同“破除迷信”连结在一起，是很不郑重的。这样的提法也是不谦逊、不科学的。其结果，助长了骄傲乃至狂妄情绪和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倾向。“大跃进”运动中，发生那么多荒唐事，甚至把唯心主义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当作唯物主义大肆宣传，这是同我们轻视理论密切相关的。

毛泽东激励工人、农民和广大干部打掉自卑感，消除妄自菲薄的思想，教育人们敢于破除迷信，在实践中发明创

造,是一番好意。但是,因此就打击“资产阶级教授”,“翘尾巴的高级知识分子”,则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不能不说是知识分子的极大偏见。在世界科学技术革命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最主要源泉的年代,我们不但不依靠掌握科学技术的知识分子,反而硬给他们戴上“资产阶级”帽子,把他们排斥在现代化建设之外,在这种情况下,企图很快赶上或超过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国家,是根本不可能的。

“外行领导内行”是一个不尊重客观规律的口号。它同毛泽东的一贯主张也是完全抵触的。毛泽东曾多次号召党的干部要成为各行各业的里手。例如,1955年3月,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说过:为了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所以必须对那些钻不进去的人,浮在皮面上的人进行教育,使他们都成为内行。”^①现在,正值党需要极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时候,提出“外行领导内行,这是一般规律”的论点,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毛泽东关于“破除迷信”的讲话,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引起强烈反应。有的组说:“主席的几次讲话,对大家启发很大,这是真正的思想大革命、大解放。要贯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不彻底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是不可能的。”不少领导人都结合讲话精神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有人认为:“当前阻碍多快好省总路线贯彻执行的主要问题是,思想没有大解放,迷信没有打破。”有的组说:“过去我们有自卑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迷信洋人,一是迷信高级知识分子,主席的指示把我们从两个思想中解放出

^①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144页。

来。这就是，一方面要反对民族自卑感，不仅要敢于超过英美，而且也要敢于超过苏联，事实上我国在建设速度方面已经超过上述国家；另一方面，要反对劳动人民的自卑感，近来出现的许多发明和创造都是人民群众创造出来的。”有人批评科学院对资产阶级教授估计过高，迁就太多，对党外资产阶级专家信任过多。有人说，自1953年以来，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强调他们的作用一面多，而对必须改造他们则强调不够，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更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这种偏向。主席指示对知识分子必须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而且把他们放在应该改造、消灭的阶级之内，才又把对知识分子的认识端正过来。有人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用‘洋人’、‘外国’、‘学问’吓唬人，实际上没有什么学问。”

从代表们的共鸣可以看出，破除迷信的号召在党内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虽然毛泽东在论证这个问题的时候说过，不要狂妄，敢想、敢说、敢做，基础是马列主义。但实际上，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必须以当时党中央的思想，即“左”的指导思想为准则，因此，破除迷信便偏离了正确方向。

（三）个人崇拜的发展

成都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个人崇拜问题时曾说过，为什么要崇拜马、恩、列、斯，因为真理在他们手里。八大二次会议上，刘少奇在工作报告中提出向毛泽东学习的号召。5月17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说，昨天有同志讲，“跟上某人走，就不会错”，这个某人就是我毛泽东。我看这个说法不全面。我说是又跟又不跟，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管

是领导人，还是担大粪的，要看真理在谁手里。我们要跟马克思、列宁正确的部分。5月20日在大会上又说，谁有真理，我们就服从他。既然谁有真理就崇拜谁这个命题被一再强调，代表们便就“真理的代表”问题议论起来了。一个组说：“我们衷心地跟着毛主席走，并不是崇拜个人，迷信个人，而是崇拜真理，因为中国几十年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证明，毛主席就是真理的代表。”他们“建议中央作出决定，今后干部学习，必须以毛主席的著作为骨干。”一位省委第一书记说，刘少奇报告中“向毛主席学习的提法不够，似乎还不能完全概括毛泽东同志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贡献。为使全党同志对此有个确切的估计，是否可考虑提‘毛泽东主义’或其他提法。”另一位省委第一书记在总结反冒进的教训时说：“教训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我们坚决执行了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针路线的时候，革命就能取得胜利，反之就一定蒙遭损失。”“经过这次反‘冒进’的反复，也已为铁的事实所证明。”他强调：“要破除迷信，做到解放思想，必须在全党广泛地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几年我们的学习有教条主义倾向，过分强调外国的经典著作，而忽视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这是不对的。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一系列根本理论上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毛主席的著作对于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最好的教科书。”他认为，党内不少人不去钻研学习毛主席的著作，转而“向外国的书本中寻找经验，这当然

是崇拜‘洋人’思想的表现”。“毛主席经常教导我们不要怕马克思，人人都可以做马克思。”最后他建议在全党有组织、有系统地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运动，并坚持下去，成为一个固定的学习制度。一个组的代表在讨论中一致认为：“我们出现毛主席这样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正象当时德国出马克思，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俄国出列宁一样，是完全合乎事物发展规律的。”

八大二次会议对于“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这样一个绝对化的提法，没有表示异议。它对于个人崇拜的发展提供了新的依据。个人崇拜的发展，便利了“左”倾指导思想的贯彻执行。

（四）辨风向和防止党内分裂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能否顺利执行，是否还会出现1956年反冒进和1957年那样的右倾反复？毛泽东深深地思考着。为此，他在会上提出辨风向和防止党内分裂问题。

5月20日，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提出“插红旗、辨风向”问题。他说，红旗就是我们的五星红旗。横竖世界上什么地方都要插旗帜的，是插红旗，还是插白旗？不是无产阶级插红旗，就是资产阶级插白旗。为了插旗子，就要提高嗅觉，辨别方向，看是什么风向。我特别请同志们注意的问题，就是辨别风向，要有辨别能力，不要怕插红旗，那个学校、工厂、连队、机关没有插旗子的地方都插起来。

5月23日的大会讲话再一次谈到这个问题，毛泽东说，我讲的是“插红旗、辨风向”，不是“辨方向”。每个生产队都要插面旗子，看到白旗子把它扯下来，灰旗子也不行，

要请他扯下来，他不肯扯就通过辩论把它扯下来，插上红旗子。风向，东风压倒西风，反冒进的风，是1956年6月开始的。大风是容易知道的，小风不容易辨别，领导干部更加要注意。毛泽东把怀疑或反对高速度的人称作“观潮派”、“秋后算帐派”。联系1956年的反冒进，他说，那时的“观潮派”相当多，中央、省、专、县、乡、社都有“秋后算帐派”。他认为反冒进错误的发生是由于不懂得农民同盟军问题，不相信多快好省，首先是不相信“农业四十条”，不相信农业发展速度可以相当快，可以大跃进。他说，现在的情况好了些，生产大跃进，整风反右派，把那些说农村没有希望，“四十条”不能实现的，一扫而光。但仍有一些“观潮派”、“秋后算帐派”，要有团结有斗争，对他们就要进行斗争，斗争是为了团结，不能不准人家革命。

毛泽东把应付可能发生的怀疑或反对总路线的问题提到了防止党内分裂的高度。5月17日，他说，经过反右派斗争，今后大的问题不会有了，小的问题还会有。有了去年的经验，全党得到了锻炼，“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还要准备对付灾难，世界大战，还有党内会不会闹分裂。

5月20日他在大会上又说，上次讲灾难，是大灾难——战争、分裂。关于对付世界大战，毛泽东说，现在看来，和平可能性很大，战争可能性也有。一打起来，顶多三年，把帝国主义一扫而光。关于防止党内分裂问题，他说，假如有人不顾大局，出现党内分裂，就要乱一阵子。代表，特别是中央委员，都要注意顾全大局。谁不顾全大局，谁就

要摔跟斗。他还指出，在1957年的风浪中，各省的领导机关都出现了党内的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北京的政法部门垮了，文教部门垮得更多，这是政治上的分裂。今后会不会有新的分裂，我看有可能，只要有党就有可能。有人说，听了不舒服。我看讲了，大家就有了精神准备。我们是乐观主义者，不怕党的分裂。现在无事，我们很团结，中央和地方都如此。经过整风、反冒进事件，现在搞清楚了，经过团结、斗争，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5月23日会议结束那天，毛泽东在大会讲话中联系1956年反冒进发生的所谓曲折，再一次谈到世界大战和党的分裂问题。他请大家预料到将来还可能发生曲折，要求大家，各省委、中央都要研究一下。他说，预料到了就不要紧，党内如果起波折，不正确的力量总归要被批评的，正确的力量总归是要胜利的。一半以上的省、市、自治区出了问题，并没有推翻省市自治区党委。在点了一些省委的所谓党内右派分子之后，他接着说，有些省很不少，地委、县委、支部怎么样？多少也有问题。这是阶级斗争的正常现象，这些人必然要混进党内来。

党内认识上的分歧，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正常现象。特别是党在指导思想上、路线上发生偏差的时候，有人提出不同意见，更是不可避免的。党内认识上的分歧，一般来说，决不意味着党的分裂。不应当轻率地给持不同意见的人戴上“观潮派”、“秋后算帐派”的帽子，更不应当用阶级斗争的方法解决党内认识上的分歧。八大二次会议发出的制止党“分裂”的警号，为以后错误的党内斗争埋下

了伏笔。一年以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对党中央的“左”倾错误提出了批评，果然被视为“分裂”行为。1959年8月2日，毛泽东在八届八中全会上说，现在有一种分裂的倾向。这种倾向，我在去年5月党代会上讲了的，我说这个时候危险，一个是国际上的战争，世界大战；一个是在国内把党分裂开来。那个时候并没有显著的迹象，现在已经有显著的迹象，要分裂我们这个团体。彭德怀等人因此被错误地打成“反党集团”。用阶级斗争方法处理党内认识分歧的错误方针，给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

三、八大二次会议之后

1956年八大一次会议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八大二次会议本应在此基础上前进，使党的路线更加完备起来。但是，这次会议没有完成这个任务，反而从八大一次会议后退了，它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党中央当时转发的一个省委《关于传达和学习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情况的报告》，可见这次会议反响的一斑。省委的报告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一定能够用最高的速度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向共产主义迈进。”该省委着重向党中央汇报破除迷信产生的效果：“这次会议（按：省委召开的全体会议）上，首先，大破了农业生产不能高速度发展的迷信，肯定了农业生产可以一翻再翻。”报告说：当前对跃进的认识已经不成问题了，“但

是小跃进还是大跃进，就是增产百分之几、百分之几十，还是一翻再翻的问题，在一部分人的思想上还是没有解决的。怀疑派在这上面作文章。”“会议认为，有些人把农业增产问题，说得那么神乎其神，玄而又玄，是一种很大的迷信……实践经验告诉我们，要使产量成倍地翻，必须措施成几倍地翻，干劲成十倍地翻。”“其次，是继续大破了办工业的神秘观念，肯定了地方工业可以在自力更生为主的情况下大发展……××市的同志在会上发言，他们要在5年之内，钢的产量达到300万吨，超过人口仅次于我国的东方大象——印度，赶上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比较发达的瑞典的水平。”“第三，是大破了对于‘科学技术’和‘科学家、技术人员’的迷信……科学技术并没有什么神秘，自然科学就是生产斗争经验的总结，把我们现在在生产上所干的一套总结起来，有许多就是最新的科学技术，有些还是世界科学技术的尖端（如我国小麦亩产4000多斤）。”省委的报告极力贬低、攻击知识分子：“从这次交心运动中，暴露出这些道貌岸然的‘学者’，有的是对党有刻骨仇恨愿意带着花岗石的脑子去见上帝的顽固分子，有的是一贯崇美亲美的投机政客和实行奴化教育的‘专家’，有的是不择手段弄虚作假骗取名利的大骗子手，有的虽有一些真才实学，但却是以奇货自居，向党向人民讨价还价的贪心分子；具有真才实学而又诚心诚意为劳动人民服务的还是少数……我们决心通过交心运动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贯彻到底，拔掉所有的灰旗、白旗，把工人阶级的革命红旗插遍各个角落（例如大学的各个教研

室，厂矿的各个科室，各个科学研究所和技术推广站等)。”报告还说：“会上有人说‘破除迷信没有底，解放思想没有边’。主席关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指示，正象第一个中子打进了原子反应堆，迅速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连锁反应，产生了巨大的物质力量。”报告提出“在三五年内，可能争取达到平均每人粮食1500斤到2000斤的水平”。1958年7月8日党中央向全国转发该报告时说：“这个报告很好，发给你们参考。”

八大二次会议以后，《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以及各省市的报纸连篇发表《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力争高速度》等一类社论和文章，宣传高速度思想。中央领导人频频视察各地，大鼓干劲。“大跃进”运动便以雷霆万钧之势在全国各条战线全面展开。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从这里拐了一个大弯儿。